○世界史精览○

凯旋门下的失落

——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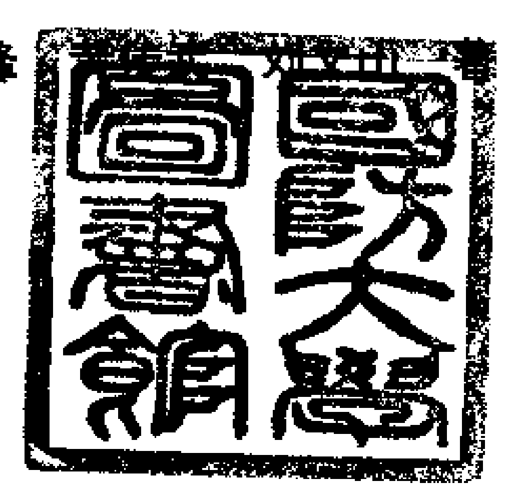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凯旋门下的失落

——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陈贵峰 [illegible]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凯旋门下的失落

陈贵峰　黄传武　刘文山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8.2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6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0.0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不堪一击的“强国”

潘多拉魔盒开启 法兰西大祸临头

公元1939年世界已危急万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就要来临了。陷阱已经布下，恶魔正冷笑着看着猎物走来，一些可怜的政治家竟毫无察觉。

整个30年代，天空就不断出现不祥之云。1938年10月世界各大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宰割的《慕尼黑协定》，英法两国替自己铺设了一条死亡之路。可这个协定的炮制者——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得意洋洋地说：

“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

在同一时刻，在柏林，在罗马，希特勒和墨

索里尼分明都在狞笑。

和平根本不会有保障。1939 年 9 月 1 日凌晨 4 时 45 分，德国法西斯出动了 57 个师，约 150 万人，2000 辆坦克，2300 架飞机，对波兰突然袭击。

德波战争一开始，德军使用大批飞机和坦克联合作战，很快取得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德国成群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对波兰重要机场、交通枢纽进行狂轰滥炸。德国法西斯的“闪电战术”使波兰措手不及，飞机来不及升空就被炸毁，军队来不及集中就被消灭。整师整师的德军坦克成楔形队向前推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由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路集团军群的 36 个师，担任从喀尔巴阡山至上西里西亚一线向华沙进攻的任务。由包克指挥的北路集团军群的 22 个师从东普鲁士波莫瑞地区向波兰腹地突击。经过 7 天激战，南方集团军群突破波兰西部防线，快速兵团迅速推到维斯瓦河和华沙一线，从南面包围了波兹南集团军。北路集团军群占领波兰走廊后，横渡维斯瓦河，从北面包围了波兹南集团军。

9 月 8 日，德军开始向波兰中部和首都华沙

发起了进攻。9月11日，北路集团军群的第三集团军占领距华沙仅30多公里的布勒斯特铁路。南路集团军群的第十集团军的第四装甲师和摩托化兵团的先头部队，于9月11日抵达华沙近郊。9月14日，德军占领了波兰中部地区后，对首都华沙实行了半包围。9月13日，但泽守军投降。9月15日，德军占领卢布林，抵达布列斯特。9月16日，南路集团军群在弗洛达瓦地区与北路集团军群会师，完成了对波兰主力的包围。

9月6日，波兰政府迁往卢布林，通讯被毁，完全失去统一指挥，陷于一片混乱。9月17日波兰政府又逃亡罗马尼亚，9月24日宣布波兰抵抗业已结束。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波兰便宣告覆亡。波兰的迅速败亡固然由于自己的落后，但是波兰的盟友英法在关键时刻的出卖更应该负有不可推却卸责任。

灾难并没有结束，更惨的还在后头。法国运气不见得比波兰好。如果说波兰的灭亡还有情可原，因为波兰本来就是欧洲弱国，她的国民从来就没有大国之民的优越感，但是如果号称世

界一流强国的法国灭亡了，那么做惯了大国之民的高卢雄鸡又作何感想呢？这种滋味只有法国人自己明白。历史却偏偏开了这场苦涩的玩笑。

摧毁波兰以后，德军马不停蹄，兵锋又指向北欧、西欧。1940年4月9日上午4时20分，希特勒政府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丹麦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任何抵抗应该受到而且必将受到一切可能手段的镇压"，并限制丹麦政府必须在一小时内答复。

4月9日5时15分，德军开始侵入丹麦领土，丹麦国小力弱，仅仅一小时后即凌晨6时就接受了德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同意"在德国的保护下维持中立"。德国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哥本哈根。

就在德国入侵丹麦5分钟之后即5时20分，德国政府又如法炮制向挪威政府递交了一份几乎同给丹麦内容一致的最后通牒，要求挪威政府接受"德国的保护"。5时52分，挪威政府答复说：

"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

挪威长期以来一味依靠英法，没有战争准

备，加上装备落后，在德军突然袭击下，显得措手不及。德军只付出轻微损失，就先后完成登陆计划，然后从南到北横扫整个挪威，挪威主力被迫撤入内地。

挪威战斗尚在进行，希特勒就开始准备实施“黄色方案”。在北海至瑞士边境800公里的西部战线上，德国集中136个师，其中包括拥有3000辆坦克的10个坦克师、7个摩托化师，3800多架飞机，分别从三条战线向低地国家扑来。

5月10日凌晨，德国政府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政府同时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德军立即进入这些国家，保证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军队的“入侵”，要求三国政府对德军不要进行任何抵抗，否则，将被“一切可能手段”所粉碎。与此同时，德国出动大批飞机猛烈轰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所有机场，随之空降部队从天而降，占领机场、桥梁和重要战略据点。陆军所有部队潮水般地向北海至马其诺防线发动全面进攻。

荷兰支持了5天，比利时支撑了18天，卢森堡不战而亡。

征服法国才是希特勒的真正目的。周围国家的败亡已使法国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的确，巴黎已能清晰地听到阵阵的杀声。法国这个欧洲大陆上以浪漫主义著称的纯情少女，就要受到希特勒匪徒的侮辱。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拥有德国10个装甲师中的5个师的“A”集团军群顺利通过卢森堡，悄悄地向比利时南部的阿登山脉挺进。阿登山脉位于比利时境内，峰峦峻峭，森林密布，南面是坚固的马其诺防线，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直达瑞士，北面紧接宽阔的马斯河。

此地既有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且道路崎岖，沼泽遍地。当时许多军事家都认为这是庞大的现代化机械部队无法通过的地区。法国贝当元帅就十分肯定地说：

“这一扇形地区没有危险。”

法国在这一带只部署了战斗力较弱的防御部队。

然而军事上常常是以出奇不意而制胜。希特勒的侵略计划“黄色方案”就是这样设计的，5月10日这一天大雾迷漫，德军神不知鬼不觉

突入阿登山口。法军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天险难度”的阿登山口却成了德军入侵法国的主要突破口。

德军由克莱斯特指挥的装甲兵团作先导，采用闪电战术发动进攻。克莱斯特命令部队：

“不得休息，不得松懈；利用首战出奇制胜，务使敌人乱作一团；心中只记住一个目标：突破。”

闪击“英雄”古德里安率领先头部队第十九装甲军1000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其它车辆日夜兼程。为不使盟军发现，选择了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前进。在阿登山区，古德里安只遇到法军骑兵和比利时轻骑兵轻微抵抗。这样德国装甲部队就像潮水般向前推进。

法国顿时一片混乱，即使还存在抵抗，看上去一切也是匆匆拼凑的。一群群难民拼命向南涌去，堵塞了所有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是被敌人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当时德国装甲部队正飞速前进，突然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德国人叫他们放下武器，乘车或徒步南行，以免妨碍德国人向前推进。德国人喊道：

“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

这就是德国人眼中的曾经不可一世的欧洲第一陆军。人们难以相信，一战胜利后号称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就这样不堪一击，一触即溃。

英国政府也乱了方寸。5月15日凌晨，在伦敦唐宁街十号，正在酣睡的大英帝国首相邱吉尔突然被一串清脆的电话铃声吵声，电话是从海峡彼岸的法国打来的。邱吉尔睡意朦胧地拿起电话，耳畔旁立即传来法国总理雷诺惊慌失措的声音：

“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

“什么，输了？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

邱吉尔睡意顿消，半晌无音：

“完了，完了。”

说“完了”的并不是邱吉尔一个人。

法军最高统帅魏刚也这么说：

“完啦，法兰西帝国完啦，全世界都完啦。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说“完了”的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

"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拯救法国的唯一出路。"

一时间，失败主义弥漫法国。这种传染病甚至影响到普通民众，甚至下层人士也在说："完啦，法国完啦。"

然而，却有一个声音坚定地说，法国并没有完。这个声音并不是来自法国，而是来自英国伦敦。

这一天是1940年6月18日午后6时，一位气度不凡的法国中年将军正在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文告：

"事情已经定局了吗？希望已经没有了吗？失败已经确定了吗？没有！请你们相信，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说话的，我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总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在同年同天同一时刻，在法国布列塔尼省的一个小镇洛克密内上空，尘埃笼罩，闹声不绝，一片昏乱。乱哄哄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围绕在神甫周围，在神甫的旁边有一位弱不禁风、骨瘦如柴的老太。

突然，在隆隆的响声中出现了德国的摩托车，它们朝西方向急驶而去，对这些已被打垮了的人群视若无睹。德国人过去后，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的法国军人们，只是十分失望地紧握着双手。在他们当中，有位炮兵上尉格扎维埃·戴高乐，他是溃退时回家的，重新找到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女儿热纳维埃芙。

12分钟过去了。一个青年人从家里跑出来，大声喊道：

“咱们好象没有完蛋……有位将军刚在电台上发表讲话，他说必须继续进行战斗……”

“哪位将军？魏刚吗？”

“不是的，他叫戴高乐……”

这时原来在神甫身旁的那位老太太说道：“他是我的儿子！……”

12天后，这位善良的母亲在勃莱邦告别人世。宪兵队员们、前哨抵抗战士们到戴高乐将军母亲的墓前，向她致以军人的敬意。

那么，这位号召继续战斗的不屈将军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后来名震世界的自由法国的领导者、第五共和国创建者、威震敌胆的夏尔·戴高乐将军，这场灾难的先知者。

历史不能假设。但写到这位将军时，每一个后人，甚至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也忍不住要说：假如法国听信了他的劝告，也许法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至少不能这样惨。

然而，历史却做了这样的安排：大祸临头先知却遭了冷遇。

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夜之间没了祖国。

戴高乐识破[illegible]”回天之力

1919年第一[illegible]下了帷幕，法国人渴求已久的[illegible]，他们尽情地沐浴在一片祥和气氛中。的确，战争并不是法兰西的爱好，正像诗人所说的那样。

在具有法国情调的花园中，没有一棵大树想以自己的浓密窒息其它树木；花坛都是按几何图形建造的；池塘无另增瀑布的份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赞赏。花园里有时会发出一声长叹。也许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感情：园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独自存在的话可能会更

加明媚动人。但是，这样一来，必然有损于整体，而漫步园中的人看到花园里井然有序，永葆优美的和谐，自会感到十分欣慰。

这也是戴高乐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法国花园。但是，在花园中等待他的却是失望。他将会发现，园中果实固然赏心悦目，尝起来却往往又涩又苦。

弥漫着浪漫主义色调的法国，有的是田园诗般的生活，对未来并不在意。然而未来又是危险的，深不可测的，戴高乐是个清醒的人。

他善于思考，具有法兰西民族浪漫性格的另一面。大战一停，他就看出了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因为受辱的民族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日耳曼民族，他摸过德国的脉搏，嗅过波兰，也衡量过苏维埃革命对东欧国家的影响份量，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就不停地呼吁，希望法国引起注意。

1931 年戴高乐从海外服役归来，目睹法国政体腐败无能，行政效率低下，官职重叠，军队指挥不灵，机构臃肿，贿赂公行，财政紊乱，政客纷争，权力互相制约。戴高乐对此痛心疾首，常常喃喃自语：

“这样的政府怎么能应付未来的极大危险?”

戴高乐终于忍不住了，他拿起笔来呼吁。1934年1月1日在《法兰西军事评论》上发表题为《海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文中他拿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时期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的成效来警醒法国：

> 法西斯政体使执政当局得以不受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利用现有资源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人人按照要求遵守纪律；领袖通过个人的作用强使各部门紧密合作；最后，在人民中保持一种随时可以迸发出来的高昂情绪，……所有这一切对于巩固国防极为有利。

戴高乐的目的在于想利用自己的文章激起公众舆论，迫使政府停止纷争，着眼法国未来的生存发展，支持通过一项战时动员法。这篇文章向公众透露了他为最高国防委员会所完成的那项正式任务的内容。该任务是一个行动纲领的起草工作，一俟上述草案获得通过，即可付诸实施。可是上至法国政治家、下迄普通老百姓都无人理睬。

事隔一年半之久，一项新的议案才提交国民议会讨论，但直到1938年3月22日才付诸表决。等到参议院批准为法律时，已是慕尼黑会议那年的7月11日了。这时，希特勒上台已经5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只有一年零一个月。

这5年是戴高乐幻想破灭的5年，是法国灾难重重的5年。人们过去曾在安乐的心情中过了3年日子，现在却又陷入厌倦消沉、悲观失望的情绪。

法国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届又一届。每一届政府都处于焦头烂额状态，考虑的只是自己生存的问题，无人理会世界形势的变化。其实，灾难已经逼近了。

在莱茵河彼岸，日耳曼巨人正在挣脱凡尔塞和约的枷锁，而其宿敌——法国实际上没有提出多少反对意见。根据和约，协约国军队定于1935年从莱茵区撤出，但他们却提前5年撤走了。

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暴戾恣睢的国家社会党已于1933年登上了德国最高统治宝座。整个德国被绑上了希特勒的战车之上，欧

洲就像一位纯情的少女，即将受到强盗的蹂躏。大战迫近了，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当时任少校的戴高乐和一些与他见识略同的人，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增长的外来危险，竭力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抵御即将临头的、来自莱茵河彼岸的进攻。这是一项常常令人泄气的使命。戴高乐在给布瓦尔上校的信中说："你我都十分清楚，在军队里，人们感到思考问题是个负担。"

为了国家的前途，戴高乐少校尽管屡屡碰壁，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呼吁。

1933年5月10日他又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建立职业军》的文章，文章呼吁法国必须改弦更张，适应新形势，建立机械化部队。

戴高乐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抛弃旧观念，接受新思想，预见到在那将爆发的战争中拥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并不顾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敌意，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坚持建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该文与他以前的文章

一样，引起的反响并不太，这一杂志在法国只销售了750本。

戴高乐并不气馁，他向当时任陆军部长的贝当元帅呼吁。贝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很有军事才能。可是1934年的贝当已不是当年的贝当。20多年前，贝当和军界同僚在上刺刀和火炮威力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那时的贝当善于思考，敢于提出新建议。1934年的贝当已经78岁的高龄了，尽管身体还算健壮，并偶尔给会见他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思想早已退化，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而且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日益减弱。当年的贝当是戴高乐心目中的英雄。在那些年代里，每逢谈到这位长者，他总是说：

“他可是一个伟人哪。”

但是近几年来，他改变了口气，说：

“以前他可是个伟人哪。”

对戴高乐的建议，元帅给予了嘲笑。贝当认为使用坦克就可以缩短战争的想法太可笑了，并断言如果德国坦克入侵巴黎地区，必将被迅速围歼。1938年他在3月1日出版的《两大世界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重申他对马奇诺防

线的信心，说有了这条防线就无须担心装甲部队的进攻。

后来，贝当又宣称，他对法军阻击入侵者的能力感到满意。

贝当任陆军部长期间，在提高法军抗击德军的能力方面毫无建树，而此时德军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准备大举进攻。起初，贝当倒确实想让戴高尔充任他的幕僚，但他身边的那些人进言阻止，使他改变了主意。其实，凭着贝当的声望，加上戴高乐才能出众，精力过人，富有远见，如果重用，本来是大有建树的，但结果却一无所成。

戴高乐上校既无权又无势，他只能尽力而为：不停地进行游说。只要有人听，他就慷慨陈词。当然不能说没有一个法国人同意他的预测，有一位政治家——在法国处于崩溃之际出任总理的雷诺，成了戴高乐主张的积极拥护者。雷诺当时正任国民议会议员。

国民议会中充斥着一种主张防御、满足现状和漠不关心的情绪，因此对戴高乐的观点持敌视态度。

1935年3月15日，当国民议会就一项把服

役期延长到两年的法案进行辩论时，雷诺才找到机会为戴高乐的观点进行辩护。

> 让我们假设，明天德国就宣战，比利时遭到侵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
>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支援比利时，帮助它守住东部边界，那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历史的悲剧也许会重演。比利时军队可能被迫朝海岸退却。那样，我们就不得不保卫法国北部无险可守的长达 350 公里的边界。
>
> 在坐的有哪一位能同意不经一战就眼看我们最富饶的省份再遭侵略，我们的祖国重受肢解呢？

他最后说：

“不建立这个装甲军，我们就会丧失一切。”

雷诺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但他当时是逆流而泳，阻力极大，建立装甲军的建议没有实现。如果实现，那么德军在后来入侵时就会遭到强有力的阻击，而不至于沿法国北部平原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正当法国坐失良机之时，欧洲正愈来愈走向战争。根据凡尔赛和约，1935 年 1 月萨尔区公民投票，归还德国。这一来希特勒勇气倍增，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和约中有关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重新实行征兵制，军队增加到36个师，公然扩军备战。

这年秋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大为震惊，这也暴露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软弱无能。

事到如今，要使欧洲这两个独裁者住手，已经不可能了。

1936 年 3 月 7 日，希特勒下令占领莱茵区，最后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这一天是欧洲现代史上决定命运的日子。西方同盟国家对希特勒的这一行径几乎一致予以默许，不加干涉，从而失去了在时间来得及使希特勒住手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法国人不动手，英国人就无法行动，而法国人看到的仅仅是打一场局部战争就需要动员500万人，不禁畏缩不前，按兵不动。如果当时按照戴高乐和雷诺主张建立了装甲师，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怀才不遇的戴高乐上校当时就深有此感。他在事件的第一天

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应该迅猛而突然地采取行动。"

法国仍然是毫无作为。实际上法兰西共和国此时正每况愈下。法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强国，甚至也不想再成为强国了：对外政策顾虑重重，原因就在于帝国根基已经动摇；凡尔赛政策已经破产；洛迦诺只剩下不愉快和很渺茫的记忆；甚至意大利也瞧不起法国了，对它的友好提议不领情；法国在一切外交事务中以热衷于搞绥靖的英国马首是瞻。

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以后，法国政界领袖和军人才痛感法国付出的代价是何等严重，这是拿国运相赌啊！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法国和德国不仅在人口上，而且在军工生产上都相差悬殊。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因此只是一味地笃信和平，结果束缚了自己手脚。在他们看来，制定进攻性的计划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不可取。他们认为建立坦克部队易招非议。相反，在莱茵河彼岸，阿尔卑斯山另一侧新上台的极权主义者却并不受这种束缚，正在放手大干。

情况表明，形势已经万分危急，戴高乐设法

会见法国总理勃卢姆。

总理在办公室接见了他。戴高乐开门见山地对勃卢姆说：

“建立机械化的部队是应付未来战争的唯一出路”。

总理说：“上校，你说得对。我在提议大幅度增加军事拨款，其中大部分用于制造坦克和飞机。”

戴高乐反驳说：

“可是，总理阁下，计划制造的坦克和飞机的型号都是过时的。”

勃卢姆说：“至于如何使用拨给陆军部的军费，那是陆军部长达拉第先生和参谋长甘末林将军的事。”

“一点不错，”戴高乐寸步不让，“但必须承认，国防是政府的职责。”戴高乐接着说：“如果德国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法国就应该占领鲁尔区。”

“这是个疯狂想法。”总理大为震惊。

戴高乐反驳道：“不，这是一个有远见的作法。法国没有选择，要么生存，要么灭亡。如果德军突破法军的防线，法国在军事上必将一败

涂地。”

勒卢姆大为扫兴，他对戴高乐的古怪想法满腹狐疑。到头来，总理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法国军界对戴高乐到处游说，试图兜售他那套理论的政治活动十分反感，将他的名字从1936年晋升名册中勾掉，戴高乐当了4年中校，但还得等上一年才能升为上校。

随着战争火药味日浓，保守主义在法军中已逐渐失势。

1938年12月12日，最高军事会议就慕尼黑协定进行辩论，最后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下设4个坦克营。但是，组建这些部队要等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开始。

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参谋长甘末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之后，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

实际上，这次提升是一次流放。陆军部对戴高乐呆在巴黎早已厌烦了："你用纸上坦克把我们搅得够乱了。这回倒要看看你用钢铁坦克能搞出点什么名堂。"

然而，戴高乐却并不在乎。相反，他确实感到如鱼得水。他大搞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并终于有机会在实践中去检验他的理论。他对此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于是，人们半开玩笑半怀敌意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摩托上校”。尽管跟坦克打交道到处都是油污，戴高乐还是带着他那副操典上并未规定要戴的白手套。1938年7月14日，在庆祝国庆日的演习中，戴着白手套的上校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大显神威。

梅斯的军事长官前来观看，看到训练有素的坦克团，大为赞赏。然而他对上校并无好感。戴高乐耐心地向这位军事长官游说：

“坦克部队将发挥巨大的军事威力，未来的战争也许将以它为标志。”

“亲爱的戴高乐，我没有功夫听你说教。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

说这话的人虽比戴高乐矮一些，但也算高个子，后来他要在一些戏剧性场合与戴高乐会面，他就是后来与戴高乐争夺自由法国领导人的吉罗将军。历史可真会开玩笑。

戴高乐的理论虽然没有付诸实现，但他仍在呼吁。1938年他又发表《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希望引起人们的思考。书出版前几天，他写信给他的朋友保罗·雷诺，希望他得暇一读。信中说：

“至于我，展望未来，看到法国历史上将发生最重要的事件，对此我毫无诧异之感。我确信在这些信件中你注定要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谨有一言奉告：如蒙见爱，不论情况如何，只要我一息尚存，愿效犬马之劳。”

信发出五天后，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对于西方来说，这是那个可怕的年头中最不光彩的一件事。那年3月，希特勒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占领了奥地利，德奥合并。历史的发展的结果是，法国本身以及欧洲的命运已与操在德国希特勒手中只差一步。希特勒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15日，他挑动哈查总统辞职并占领布拉格，给了那个不幸的国家最后一击。

当这些悲惨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时，戴高乐本人正在梅斯担任军职，无力也无权干预。他的政界朋友雷诺在达拉第政府供职，整日埋头

于他相继担任的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公务，而且还要顾全内阁团结而处处受到制肘。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的装甲部队越过波兰边界，此时无论是戴高乐和雷诺，还是张伯伦和达拉第，都成了无能为力的消极旁观者了。

法国该警醒了，况且这是一场实力如此悬殊的战争啊！先知屡遭冷遇，法国一错再错。

一方是一意孤行、无求于人的德国。其领袖是个狂人，他一直凭直觉行事，到那时为止从未受过挫折，其战争机器高效率运转。

另一方却是士无斗志，四分五裂的法兰西。其军队貌似强大，但不堪一击；其领导人根本无意作战，而且对现代化战争技术熟视无睹。海峡彼岸的英国，多年满足现状，自恃有天堑海峡保护，陶醉于虚假的安全感中，实力大为消弱。远方两强按兵不动：苏联由于签订苏德条约，暂时中立；美国则希望置身事外。

战争爆发时，法国能出动的飞机只有500架，德国则有4000架。法国陆军动员了67个师，数字很可观，但比德国动员的兵力还少40个师左右。

1938年12月3日，最高军事会议终于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但这并不是戴高乐上校所设想的那种装甲部队。首先，时间上已失之过迟，因为到1940年1月才能建成第一个装甲师，而且装甲数量也远远满足不了戴高乐所估计的需要量。戴高乐要求配备500辆坦克，实际上每个师却只有120辆。更糟糕的是法国军事思想的落后，新装甲师不是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发挥作用，而是把坦克分散到全军去配合各个步兵部队作战。

希特勒闪击波兰，英法都做出了口头反应，对德宣战。如果这时法国警醒，听从戴高乐的劝告，也许法国还有救，因为德军进攻波兰，留在西线的军队很少，只有25个师，而英法在西线有110个师。

可是西方盟国却乱作一团，不知所措。他们不是着手制定作战方案，而是沉浸于种种希望之中，特别是希望把战争引向苏联，使这场战争能在远离西线的地方进行。虽然战争已经开始，但是开始的是一场“假”战争，似乎英法联军首要任务是参观齐格菲防线上德军晾起的衣服。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西方盟国在比

利时拦截到一位德军少校，在他身上搜到一份作战计划，即德军侵法的“黄色方案”。按理说西方该相信德军马上就要西进了，但是法国最高统帅部仍然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由英国派了一个远征军，但装备极差。邱吉尔无可奈何地指出，他甚至连一个装甲师也没有。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可他们在这方面装备甚至比法国还差。此时，法国军队无所事事，士气低落，战斗力日渐衰退。

戴高乐目睹欧洲的风云变幻和法国的现状，忧心如焚。此时他正率部驻守阿尔萨斯，远离决策中心，深感失意。

显贵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他在第5集团军所指挥的坦克。他向来访者警告：德国对法战争已到了读秒时刻。其中一位客人——共和国总统勒布伦先生微笑说：“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敌人如果想照你说的做，看来确实已为时过晚了。”

法国统治阶级的执迷不悟，使他忧心忡忡。德国运用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闪电战，风驰电掣，所向披靡；而西方呢，比利时前线不堪一击——它连马奇诺防线那样的屏障都没有——而

且政治家盲目乐观，军队技术落后，缺乏斗志。1940年1月，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以促使法国领导人吸取并正视德国在波兰所发动的闪电战的教训。戴高乐写了一份备忘录，题为《机械化部队的产生》。按原打字稿复印，分送约80个主要政治家阅读。书中写到：

> 任何守军如果只局限于使用旧式的武装进行静止防御根本无济于事，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使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因此，用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部队进行反击，是现代战争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当前这种战争中，像以往战争一样，消极被动必遭失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支新式军队。与英美合作，制定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如果可行，陆海空三军应联合作战。这是一场将蔓延到全世界的战争，法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戴高乐真是白费笔墨。坦克部队总监凯勒将军写了这样评语：

即使现在这道防御工事坚固的防线被突破或者被绕过，看来我们的敌人也不可能象在波兰那样得到进行闪电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因此，显而易见，在未来的战斗中，坦克的主要作用将仍其旧，掩护步兵迫近一个接一个的目标。

正当戴高乐又一次遭冷遇时，法国和英国政坛发生了有利于主战派的变化。当时，希特勒正出兵北欧，西方在挪威惨遭失败，达拉第政府垮台，伦敦张伯伦政府也寿终正寝。戴高乐的朋友、信徒雷诺组阁。戴高乐欣喜万分，认为法国有救了。然而随之而来的事态表明他高兴太早。法国政党制度应付不了民族危机，达拉第虽下台但却未离阁，因为离开达拉第的激进社会党的支持，雷诺寸步难行。

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唯一热忱支持戴高乐机械化战争主张的政治家终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这给了他一线希望。因此戴高乐一接到雷诺的邀请，就喜出望外地谒见总理，并连夜为总理起草了向议会的第一个声明。雷诺一字不改地宣读了。

然而，接着便是无情的失望。戴高乐出席了

沉闷多疑的议会——一次“糟透了的”会议。政客满嘴爱国爱国，但真正关心的却是他们自己和所属党派的政治命运。雷诺本想重用戴高乐，可是达拉第一听到这个提议，就以辞职相威胁，雷诺不愿冒新政府垮台危险，无限惋惜地撤回对戴高乐的邀请。

令人痛心的党派斗争需要，雷诺不得不违心任用一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号令却不灵。雷诺虽是主战派，支持戴高乐主张，却受到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包围，无所作为。

戴高乐满腹忧虑，惆怅地从巴黎返回旺冈堡途中，奉召来到设在万森城堡的甘末林将军总部。

身材短小的最高司令官心不在焉地说，装甲师数目将要翻一番，从两个师增加到4个师。戴高乐虽然还是上校，将受命指挥第四装甲师。该师将于5月15日成立。戴高乐表示对这一任命感到荣幸，但禁不住表达了他对当前时局的忧虑。甘末林答复说：

“我理解你的满意心情。至于你的忧虑嘛，我看没有什么根据。”

事到如今，已经太晚啦。戴高乐看到雷诺没有实行自己所倡议的任何一项政策，深感失望，遂于5月3日给雷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主席先生：

波兰之战及其后的挪威之战均已证明今日唯有根据现有的机械化部队的能力和规模方能订出作战计划。假定战火明天蔓延到瑞典领土，后天扩大到巴尔干，接着烧向乌克兰、比利时，最后又在西线燃起，不论是烧到齐格菲防线还是烧到马其诺防线，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都将得到证明。

然而，法国的军事体制，从规划组织到装备指挥，都与现代化战争中的这条规律背道而驰。彻底改革这一体制已是当务之急，决非其它任务可比。“法国的军事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迟疑不决，趔趄不前，拖得愈久，改革就愈加困难，从而胜利也就更加渺茫。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军队由于其固有的特点是服从，因此不会自行改革。改革及

国家大事，且属头等大事，唯有政治家足以膺此重任。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有伟人的话，他将是卡尔诺式的人物，舍此则无伟人可言。

阁下……身居要职，品格高尚，且在过去六年中别具慧眼，深明改革之义，因此唯有你能够而且有责任成就此项事业。我还要冒昧指出，倘若你以此事为内阁要务，必能使政府内外气象一新，并能使这套尚未用过的王牌在你手中发挥威力。从此时刻起，每过一天、每经一事，时时事事都将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理论，不过应予指出的是，它也将有助于正在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敌人。

自不待言，我最大的奢望莫过于有幸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在你认为合适的时候为您效劳。

顺致敬意

夏·戴高乐

正好一个星期后，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然袭击，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当天，温斯顿·邱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

事态发展迅猛，形势急转直下。夏尔·戴高乐和与他见解相同的少数派预料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一一成了现实。

“预言家”临危受命　戴高乐出走英国

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然袭击，突破阿登山口，迅速向法国腹地推进。法军潮水一般溃退下来。

戴高乐战前的预言一一实现。德军采用机械化立体交叉作战方式，共有10个装甲师和6个摩托化师，进军时，低冲轰炸机不断配合，迅速越过马其诺防线，把英法盟军加上荷兰一个军共80万人打得混乱不堪，一蹶不振。法国的命运在一个礼拜内就决定了。对先知者的蔑视犯了致命性错误，它使法国的军队和国家处在一个危险的陡坡上。现在整个法国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滚下去了，恶梦成真。

国家危亡，军人热血沸腾。5月11日戴高乐接到命令指挥第四装甲师，15日又被召到总

部面授机宜。之后又火速前往东北前线总司令乔治将军那儿报到。

乔治下达命令:“再见吧,戴高乐!敌人正用你长期以来提倡的战术。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6日,戴赶到前沿阵地拉昂。情况乱极了,法国士兵纷纷溃退下来,狼狈不堪。德国士兵非常猖狂,命令法军放下武器赶快南逃,免得挡住了路,并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俘虏你们!”

戴高乐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不禁燃起无名怒火:

“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

17日拍晓时分,三个坦克营调到戴高乐这里。天色微明,戴高乐下令进军。他们一路横扫敌人,迅速到达塞尔河,由于缺乏后援无法抢渡。

戴高乐只好命令部队去消灭进攻时没有来得及消灭的残敌。当夜幕降临时,戴高乐满意地看到,130名德军被俘,敌军死亡人数达数百名

之多，而法军方面损失不到200人。他们背后的难民也不再跑了。

然而10天以后，当法军不过已成为一支面临崩溃待援的军队时，为了在阿布维尔地区阻止德军闪击英雄坦克将军古德里安大军向敦刻尔克海岸挺进，法国当地守军不断向装甲部队请求增援。

5月25日，已经晋升为临时将军的戴高乐率领得到加强的装甲部队受命增援，目标是夺取阿布维尔桥头堡，激战3天。

戴高乐站在一棵苹果树下，像火车头冒烟似地抽着烟，神态自若，异常平静，穿着机械常穿的一件毫无标记的老式铜色装，镇定地指挥着。装甲第四师终于突破敌人阵地，抓获400名俘虏，击毁数十辆坦克和大炮，取得辉煌胜利。为此，法国新任大元帅给这位年轻的将军颁发了嘉奖令。

然而，局势已经无可挽回。戴高乐的局部胜利无法弥补法国全局的惨败。况且，法国人缺乏经验，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到四个小时。许多军官还是在这一地区的战场上和他们的士兵第一次见面。法国士兵连无线电之类

最起码的设备都没有，只能靠摩托传令兵进行通讯联络。

经过多次战斗，损失又较严重，后备力量没有。到5月30日，戴高乐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

4天前，布伦已落到德国人手中，比利时利奥波德三世已经命令比军投降，这样就使英国远征军和法军暴露在德军的进攻之面前，25万英军士兵和10余万法军挤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等候各种小型船只把他们撤往英国。

最高统帅魏刚丧失信心，认为继续打下去已毫无意义。5月26日，魏刚对一位内阁部长说：

“我想得很多。……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法国此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6月5日，戴高乐的朋友保罗·雷诺总理决定破釜沉舟，冒着政府垮台的危险，毅然冲破政党纷争的束缚，撤掉激进社会党达拉第的国防部长职务，自己掌握了全部军事大权，立即任命戴高乐为副国务秘书，以期扭转国家覆亡的命运。

戴高乐从“陆军统帅”一跃而为副国务秘

书，这在法国政治——军事史上是一次离奇的晋升。

法国各大报纸纷纷以寄予希望的口吻报道了这一任命：

“……很高兴获悉，我们最伟大的、最勇敢的军事技术员之一，夏尔·戴高尔将军已被保罗·雷诺先生正式选中。”

伦敦《泰晤士报》的反应则更引人注目，该报说：

“保罗·雷诺先生最令人感兴趣的革新是选定戴高乐将军；戴高乐的著作曾吸引军界对他的注意……，他是右翼党人，强有力的理论家，大规模运用坦克的鼓吹者，他头脑清醒，目光锐利，同时又是一个行动者和幻想者。”

戴高乐并没有被新闻界的吹捧所迷惑，他知道当时法国的处境，但他没有绝望，他要为他的处于危难中的祖国做力所能及的事。

雷诺总理认为法国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援，也许这样法国还有救。可是，当时英国已对法国丧失信心，因此必须选派一得力人前往伦敦说服邱吉尔，使他相信法国能够转败为胜，雷诺总理看中了戴高乐。

戴高乐临危受命，飞往英国。温斯顿·丘吉尔6月9日接见了他，戴高乐在第一次同邱吉尔会晤中被这位伟人非凡的才干和生气所吸引，他不禁惊叹，丘吉尔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伟大斗士，也是一个伟大历史中的伟大艺术家。可是，戴高乐的使命却彻底地失败了。英国人现在只求自保。

第二天，他首次参加军事委员会的磋商会，汇报了他在伦敦到处奔走失败的情况，这使魏刚大元帅和贝当元帅更加坚信他们的停战论点。

6月10日，从各地纷纷发来的电报只提到灾祸临头，墨索里尼乘火打劫，对法宣战。法国政府由巴黎撤往图尔。

“这是个痛苦的日子。”戴高乐后来写道。临近午夜，当政府其他成员出发后几小时，雷诺和将军驱车前往奥尔良，他嘴里只说：“非洲！必须到那里继续战斗……”

11日，丘吉尔来到布里阿尔同他的法国同僚会谈。英国此时已把法国看成战败国了，谈的不是共同战斗问题，它们早已是离心离德的伙伴了——主要争论的是这些地方失陷的时间和

方式。

法国的部长们，他们不是在参谋部的军用地图前，而在通用地图前，争论往哪里跑？戴高乐极力主张撤往北非阿尔及尔继续战斗。海军上将达尔朗认为戴高乐将军要在十天内将9万将士运往北非的计划是荒诞的。失意中，戴高乐决定提出辞呈。法国著名政治活动家芒代尔劝他打消辞职念头：

“现在世界大战不过刚刚开始。你重任在身，将军……你现在的职务可助你实现自己的宿愿。”

一个惊人的预言，戴高乐再次忍辱负重。

6月15日，戴高乐再次来到英国。途中正遇到满载从美国运往法国的一大批武器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的“巴士德”运输舰，戴高乐做出一项痛苦决定，让舰只改道运往英国港口。戴高乐是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思想意识和世界战略也抵不上民族价值，但从同盟者立场出发必须做出这种抉择。

6月16日，在伦敦，他与驻英大使共同提出一项英法全面联盟的计划。他权衡利弊，紧密结合世界战略，认为英法全面联盟是发动心理

战的好机会，可以为法国主张战斗到底的人鼓起勇气。为此，他说服丘吉尔，并要他的政府立刻接受这一方案；然后他又打电话给雷诺转告文本，总理也准备为此而辩护。

然而到了16日晚上这位总理却在魏刚、贝当元帅为首的多数派面前屈服了；他们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只有一个想法：放下武器，赶快结束战争。

戴高乐离开伦敦时，耳朵里回响着雷诺和丘吉尔在电话里商定深入探讨英法联盟的计划的对话。是否真有希望呢？16日晚，他在波尔多着陆时，得悉政府首脑、他的上司、他的朋友已经辞职，甘心情愿地把权力交给贝当元帅——停战政策的象征。这对他说，真同晴天霹雳。

而贝当政府的第一个举动则是拘捕坚持抗战的芒代尔和布雷尔将军，这一使人惶恐不安的措施使元帅本人后来不得不在这些受害者面前诚恳地表示歉意，但这也足以使满腔热情走下飞机的“陆军统帅”戴高乐成了惊弓之鸟。他甚至由于担心魏刚下令逮捕他，试图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过夜。这几年的遭遇早已使戴高乐

陷入精神和道德的分裂状态之中了。

戴高乐曾对之寄予厚望的这位软弱无力的雷诺，如今对戴高乐来说，已成了法国没落的象征。确切地说，戴高乐对软弱无力的旧法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17 日早上，戴高乐送英国代表回国。在飞机即将起飞的一刹那跳上飞机仓皇出逃到英国，不复回返。

敦刻尔克大撤退　绝望中的“奇迹”

1940 年 5 月 10 日战争开始，不到一周，国际观察家们就已认识到法国败局已定了。德国装甲部队和飞机联合战斗，而英法几乎只是步兵迎战，肉体是根本不能同钢铁对抗。英法盟军不堪一击，德国装甲部队在它的创始人、号称闪击英雄的古德里安将军领导下，开足马力全速向法国扑来，这根本不像一场战争，仿佛只是一次凯旋进军。

战争进行到第五天，德军装甲部队就突破法军前沿阵地，深入法国境内。之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巴黎逼近，一路向英吉利海峡推进。

英法联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到无路可退的敦刻尔克海边。

36万英法盟军陷入重重包围。后有追兵，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海。士兵们绝望了，英国更绝望了。

丘吉尔首相早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同英国远征军联络。真是“有病乱投医”，丘吉尔一会儿命令远征军统帅戈特勋爵执行法国最高指挥部的指示，给魏刚出主意，增强其信心。但是戈特勋爵根本接不到什么法国最高指挥部指示，它们之间的联络早已失灵。一会儿，丘吉尔又命令戈特勋爵杀出一条通往海岸的通道，以“撤退尽可能多的人员”。

但是当英国大伤元气的各师及法国第1军的半数经过千辛万苦的战斗到达敦刻尔克防御地带时，救援的船队又遥遥无期。

英国紧急制订“发动机计划”调集渡船、海军扫雷艇、沿海各种小船驶往敦刻尔克，以撤退被围困在那里的英法联军。

5月26日开始撤退，原定两天内撤走45000人，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小船把部队送上停泊在海面的大船，大大影响了撤退速度，只完

成了计划的一半。后面的敌军又日益逼近，天上德国敌机又加紧轰炸，几十万的英法军队有可能难以生还几人。

英国急了，下令调集一切可以运输的船只包括伦敦和泰晤士河上的救生艇、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游艇，甚至于救生圈。真是绝望中的绝望。

这样做丘吉尔也不放心，当北方盟军正共同投入这场绝望斗争之时，他又亲自飞到巴黎参加会议，希望避免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产生误会，他不时重复道：

“撤离时应该互相帮助！”

撤退历时10天，到6月4日结束，共撤出英法士兵336427人。成果确实很大，英国为此吹嘘说这次撤退是“敦刻尔克奇迹”。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迹，不过就是一次大溃退。确切说，这与遣返战俘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武器几乎都丢在了海滩。而且，要不是希特勒在最关键的时候命令古德里安停止追击两天，无论英国做什么努力，英法军队都没有死里逃生的机会。

但话又说回来，敦刻尔克大撤退，绝望中的

绝望却给了英国一线希望。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常常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坏事变成了好事，敦刻尔克大溃退就在此之列。

扶不起来的“阿斗” 丘吉尔黯然神伤

6月的第一个星期过去了，法国北部战场上的盟军无情地遭到惨败。虽然，敦刻尔克大撤退出乎意料地顺利：34万法英士兵得以登船启航，然而在他们身后不得不丢下绝大部分物资和装备。法军已经损失1/3兵员，余下的也已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法国败得如此之惨，大出丘吉尔之料。丘吉尔热爱法国、尊崇法国，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也许他对法国的这种感情来源于童年时代他的保姆带着他在繁华的巴黎大街上兜风的年代，也许来源于对法国的那种浪漫主义文化的热爱。然而，丘吉尔最难忘的是1883年夏季的一天，他和父亲穿过协和广场，那年他才9岁，但63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这件往事：“我是一个喜欢观察的孩子，我发现周围的建筑物中有一幢上覆盖着黑纱。我立即询问我的父亲，父亲说，这

些建筑物代表着法国各省。其中两个省阿尔萨斯和洛林在上次战争中被德国人从法国人手中夺走了。法国入感到悲伤，希望有朝一日收复失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对自己说：'我很希望他们将收复这两个省。'"

第一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地将永远使温斯顿·丘吉尔对法国更加充满热爱之情。法国步兵的无畏和顽强，马恩河和凡尔登光荣而血腥的胜利，在无数战场上英法将士的战斗友情，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不激起他的浪漫主义想象——尤其因为他本人也曾作为目击者在前线度过了6个月难忘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法国最上层人士，其中包括1918年盟军最高统帅——法国福煦将军，他这样描写道："他的仪表，他的大家风度，他那刚劲有力并往往如同喜剧演员那样通过夸张作法表现出来的启发性动作，以及当某事引起他的注意时他那大胆的思想，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生动而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指挥军队或发表见解，他从未停止过战斗……他全然不是一个安静的人。相反，他容易冲动，热情奔放，有说服力，而且目光远大。尤其是难以

战胜。”

在丘吉尔看来，福煦将军是代表法兰西面貌的一个侧面：

“这个法兰西是一个骑士的国家。凡尔赛宫的国度，特别是造就女英雄贞德的国度，它以其优雅的文化和礼仪施恩于全世界。”

但在丘吉尔心目中，他更为欣喜的是法兰西的象征——“老虎总理”克列蒙梭：

“如果一个无限高大的个人永远能象征一个民族的话，那么克雷孟梭就象征法兰西。人们喜欢用动物作民族的象征——英国狮、美国鹰、俄国双头鹰、高卢雄鸡。但对于法兰西来说，头戴奇特而优雅的便帽、口蓄白髭、目光炯炯的年迈老虎是远远胜过任何一种家禽的吉祥物。他似乎在法国大革命这个最荣高的时刻就已诞生了。”

丘吉尔对法国陆军的威力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即使当法国陆军早已不再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时，他却仍然坚信不疑。总之，是福煦的军队，是克雷蒙梭的军队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支军队现在由一位杰出的将领、同样也是他的朋友——甘末林将军率领。而且还有似乎

攻不破的马其诺防线。

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把愿望当成了现实：如果欧洲的安全和英国的安全要基于法国陆军的威力，这支陆军就绝对应该是最优秀的，因此它就确实是优秀的。

丘吉尔对法国陆军的信心由于他对法国的访问而更加强了。1936年9月，他观看了法国陆军演习。温斯顿又一次确认法国陆军是欧洲唯一的捍卫者。他认为这支军队的实力要比英国参谋部估计要强大得多。他说，参谋部总是低估法国人。

1938年，丘吉尔仍认为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好的军队”，他的朋友莫顿少校说：

“这是他的顽固不化的成见。记得战前，在得到当局许可下，我向他提供过有关法国陆军和空军……装备状况十分糟糕的完整情报，并且向他指出其必然导致的后果。谁知他竟不屑一顾，为此我们曾不止一次发生过争吵。当1938～1939年冬，根据文件和数据，我预示法国一旦遭到德国武装力量袭击，不消一个月就会覆灭，他竟大发雷霆。然而，对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只要有同样的材料和数据作依据，他总是会接

受我们的预测……‘法兰西不朽的光荣’成了他的观念！”

1939年夏，战争迫在眉睫。虽然丘吉尔也对马其诺防线在阿登山脉一段的薄弱易攻微感忧虑，但他仍然对法国陆军充满信心。5月，他宣称法国陆军的伟大时说：

“不说是当今最强大的，也是最优秀的军队。”

6月，他向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确认，德国军队无论如何不可能突破法国防线。直到1940年5月，丘吉尔仍对法国陆军的优势、将领的才干和士兵的英勇保持着不可动摇的信心。

然而事实证明丘吉尔错了，法国不但是个中国的阿斗，而且已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种冷酷的现实差距，人们可以想象出丘吉尔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丘吉尔本人的性格决定他很少承认错误，那只好暗自黯然神伤了。

5月15日晨7时30分，丘吉尔在伦敦接到保尔·雷诺的电话。总理在前一天就已去电要求空军增援。然而这次他的声调都变了，第一句话说：

“我们输了，这一仗我们打败了。”

“不可能这么快呀！”丘吉尔不信地说。

温斯顿·丘吉尔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坚持认为这仅是暂时的失利。5月16日晨，他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法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妙。阁员们向他介绍了盟军准备从比利时撤退的计划。丘吉尔气得满脸通红，他大声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这将使我们的全部军队遭殃。”

他突然跳起来宣布要去法国，认为法国竟然会被几辆坦克征服是可笑的。他补充说将于午后启程，请求内维尔·张伯伦看家。下午3时，丘吉尔真的飞往巴黎。

飞机在布尔日一着陆，丘吉尔看到的是一派悲观主义情绪笼罩着全法国，对此他极为震惊。人们甚至说德国人“最多几天之内”就可能打到巴黎。走进外交部，丘吉尔看到的是雷诺总理和他的同僚们正站在一堆堆熊熊火焰旁边烧档案，一个个满脸懊丧。

丘吉尔一进屋就控制了会场，没带翻译，用的法语也不很准确，但没有谁对他的话产生误解。

“看来形势很糟糕，”丘吉尔这样开始说，“但是我们共渡难关这不是第一回，我们将摆脱困境。现在情况究竟如何？”

甘末林将军作了回答，他对军事形势描述了一幅极为暗淡的场面：

“德国人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向亚眠和阿拉斯挺进。一旦到达，他们就能抵达海岸或向巴黎扑来。他们的装甲部队已经打开一个从东至西的宽大缺口，把盟军一切为二，由此形成的凸出部分宽 50 公里。”

甘末林将军的结论是，北部军队无疑必须撤退。

首相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那好，将军，我们将在何时何地反攻？”

甘末林精神颓丧地回答说：“无法反攻。我们军队在人员、装备、战略和士气上都处于劣势。”

全场紧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战略后备队在哪里？”丘吉尔打破沉默。

甘末林将军转过身，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道：

“根本没有。”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屋外弥漫着外交部花园里火堆上升起的烟雾，通过窗户，丘吉尔看到一些可敬的官员把满车的档案材料推向火堆……

“根本没有？”丘吉尔愕然了。

然而，首相仍然处之泰然。他深信德国人的机械化部队不可能同时遍布各地，还有机会反击。首相许诺，在英国防守本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再增派4个空军中队增援。

事实上，丘吉尔派来了6个空军中队，而非4个，并且继续给法国打气说：“我们将同德国人战斗到底！我们要饿死德国！摧毁它的城市！焚毁它的庄稼和森林！”

雷诺确实大受鼓舞，他立即做出一个长期拖延的决定：改组政府，撤换达拉第，自己亲自担任国防部长，任命魏刚为新大元帅，代替甘末林，任命贝当为副总理，起用戴高乐。

然而，法国并没有堵住溃退的潮水。

丘吉尔对法国陆军的信心动摇了，甚至开始怀疑法军将领的能力，这使他难以忍受，因为他热爱法国，痛恨承认自己错了。他一向钦佩之至的甘末林将军在德军进攻开始后仅仅6天就

放弃一切克敌制胜的希望，新上任的法军最高统帅魏刚的悲观和迟钝令他惊诧，而老贝当元帅在他眼里是失败主义化身，甚至雷诺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尽管他无休止地请求增派英国士兵和飞行员。

6月6日丘吉尔打电话询问他的联络官、在法军指挥部的私人代表：

“是否存在一个真的作战计划？布列塔尼最后防御地带计划确实存在吗？有无其它方案？”

丘吉尔已经明显感到失望、困惑了。

6月10日，法国政府准备撤离首都，保尔·雷诺和戴高乐同魏刚将军展开一场激烈争论，后者力主投降。

午夜，戴高乐和雷诺驱车前往奥尔良，6月11日黎明到达，惊闻丘吉尔首相当天下午将在布里亚尔着陆。

戴高乐和雷诺及政府官员又赶到布里亚尔与首相开会。会议于晚7时开始，丘吉尔首先发言。

“我来法国是为了研究军事形势以及确保战斗继续进行的最佳方案。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英国定要把这场战斗进行下去，什么都阻挡不

了它。我希望德国发动对联合王国的一次攻势，以使法国局势缓和下来。无论如何，英国政府仍对未来充满信心，决心坚持下去。我很关注重整军队的问题。从现在起，英国将派遣新的部队到法国。一个步兵师要在勒芒附近拉开队形迎战。今夜登陆的加拿大人是一支精锐部队，装备完善，并拥有72门大炮，这样，英国武装力量就达到4个师……此外，我们还能指望从纳尔维克开来的、未受损失的第一轻步兵师、几个营的外籍军团和波兰轻步兵同来。这些部队可以由法国指挥部任意调动。假如法军能坚持1941年春，将会有20至25个英国师再次归法军指挥，任其使用，例如作为大陆的桥头堡。”

然而法军最高统帅魏刚却说，入侵者比法军多出3倍，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已无力坚守。不再存在哪怕一个营的预备营的兵力，法军被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制服了。

丘吉尔对他的盟友的悲观主义情绪非常气愤：

“难道就一点办法没有？难道就不能反攻？难道就不能打游击战吗？”

会议结束，丘吉尔明显感到不满，他未能成

功地消除笼罩在法国的失败主义情绪。

6月13日，丘吉尔自5月10日以来第5次飞往法国。

雷诺要求解除不单独媾和的条约义务。丘吉尔回答说：

"应该给我们时间。我们要求你们尽可能地战斗下去，即使不在巴黎，至少在巴黎后方、在外省或在法兰西帝国。"

雷诺总理指出，首相并没有回答法国提出的问题：

"我要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同德国单独媾和？法国政府认为不应该让我们的人民去拼命，因为我们不能使他们在深邃的隧道中至少觅到一线光明，相反，我们现在看不到光明。"

首相含着泪结束他的话：

"我已经说过，我们不会表示非难和指责。法国的事业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珍贵的，如果我们赢得战争，我们将重建法国，恢复它的强盛和伟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要求英国放弃联系两国的庄严诺言。"

保尔·雷诺没有再坚持。

丘吉尔自法国归来以后丝毫没有放弃设法

激励法国人进行抵抗。因此，尽管法国败局已定，他仍下令英国增援部队继续在法国登陆。英国参谋部官员为此感到担忧，伊斯梅将军问首相：

“一定要那么着急？能否谨慎些？推迟他们的行程？”

但是丘吉尔什么也听不进去：“绝对不行。这是我们的职责，否则历史将严厉地评判我们。”

首相认为法国人也需要精神鼓励。于是6月13日晚上，他起草了一份英国内阁对法国做出保证的电文，电文结束语说：

“在法国重新获得安全和恢复其伟大之前，我们决不放弃斗争。”

之后又连续3天给美国总统发去无数封电报，呼吁美国对法国的支持是激励法国人抵抗下去的关键。

6月16日，丘吉尔接到雷诺要求停战的电文，丘吉尔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戴高乐与驻英大使提出英法全面联合的计划，以加强主战派的信心，否定投降的提议。

这一提案立即把首相吸引住了。实际上，一切能激励法国人继续战斗的事都值得一试，丘吉尔不是一个爱拒绝干漂亮举动的人，尤其是这件事不给人以多大约束……经过一番讨论，首相认为这一方案可行。

紧接着数小时内，为阻止雷诺辞职、阻止法国政府投降、阻止法军放下武器，两人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丘吉尔马上召集战时内阁会议，并亲自到唐宁街主持会议。戴高乐也陪同他去了，并且给雷诺打了一个电话说，傍晚以前可能会送给他一份法英联盟的宣言。

雷诺说感到非常幸福，但补充说，须加紧进行，内阁下午开会。

英国内阁会议于3时开始。戴高乐在另一间屋子等候消息。

15时55分，丘吉尔得知，如果17时以前英国内阁表示赞同联合的提案，雷诺就可以在17时召开的法国内阁会议上采取强硬立场。因此，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加上雷诺的话使英国内阁很快做出决定。

丘吉尔立即将通过的消息告诉戴高乐，戴高乐即刻给雷诺挂去电话，并逐句把文件念给

他听。

“这很重要，”总理说：“我将利用这个文件。”

丘吉尔为了增强雷诺战斗下去的信心，接过话筒说：

“喂，雷诺！戴高乐说得有理！我们的提案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应该抓住这一点！”

唐宁街笼罩着一片如释重负、乐观主义和互相同情的气氛。并不真正相信这个联合方案的戴高乐说服了同样不对此抱有希望的丘吉尔，两个人共同成功地使英国政府和法国总理接受这个提议。由于戴高乐和丘吉尔给雷诺先生提供了说服政府中他的同僚们的法宝，使他们相信在物资和精神上都有可能坚持战斗，因此他们两位有理由相信这大大加强了雷诺的地位。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当兴高彩烈的戴高乐一下飞机，得到的消息却是：总理辞职了，贝当元帅授权组织政府。显然，贝当将要求停战。一切都完了。

丘吉尔得知消息并不死心，于晚上 11 时 30 分给贝当打电话。半夜 2 时，经无休止地等待

后，他终于接通了电话，但一切都是徒劳。

长夜无眠，丘吉尔不复存在幻想了。法国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终于投降了。

温斯顿放眼世界　不列颠绝处逢生

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上，大浪汹涌，一艘孤独的船丢失了它的指南针，它不知道该停泊的港湾，也不知道该驶往何处。

1940 年 6 月 18 日，法国屈服了，纳粹瘟疫弥漫了整个欧洲大陆，英国孤立了。

温斯顿·丘吉尔担任大英帝国首相还不到一个月，他的盟友就一个个被希特勒征服，而苏美两国又保守着中立，而今他只好独自抗击纳粹恶魔。

丘吉尔深深地感到自己成了孤儿。

法国出乎意料迅速溃败使英国措手不及。英国实际上没有做好应付战争威胁的准备。加之，英国又失去了所有的欧洲盟国，它本来指望以其盟国的力量在大陆上作战。英国的军队在当时尚处于展开阶段。

大不列颠民族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危

险，甚至政府准备迁往加拿大，全英国都紧张兮兮。到处都在盛传德国人要来了而且马上来，待知的只是它怎么来，驾云呢？还是选水路？一时间弄得风声鹤唳。

有这么一个笑话就可以充分说明英国那时的神经脆弱到什么程度。有一天，剑桥有一个神经质的孩子嚷：

“快来啊，飞人，飞人降在后河的柳树上了。”

但跑去一看，是个为生计煎迫，寻了短见的不幸者，一个缢鬼。

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威胁始终具有的浪漫性。6月底，没有人晓得将在哪里过冬。飓风的警号球悬在了全英。报上登的，广播讲的，街上谈的，都离不开大陆上的那双黑手。

6月28日起，古老的英国与教堂钟声告了别。下一次再听到它可就是不祥的了。钟声变成了德国人进攻的警号，就像古时临海的渔村防海盗一样。

这还不够，全英所有路标都拆除了，甚至伦敦重要街牌也都拆除，因为谁也不敢担保飞人——德国空降部队在哪儿降临，也许在大街上，

也许在菜园里。

《每日邮报》预测敌人登陆的条件有了，第一是月夜，第二是海上平静，第三是潮水高涨，以便进攻船只直驶海岸。

英国人的担心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因为，当英国举国惴惴不安大捕内奸外探之时，柏林正流行着一种游戏，有如我们的升官图，竞争的是谁先到伦敦。

那时住在英国的人们都禁不住望着诡秘的天空，猜想哪一块云彩上站着德国人。飞机及毒瓦斯全忘掉了，又怕又好奇地守着飞人翩翩下来。吃饭桌上的笑话，睡在床上的梦，都充满了这种童话。恐怕正因为此，多少人发生错觉，错嚷出声来。连防空侦查队的威格摩尔7月24日那天都脱口嚷出，结果以造谣罪被罚款。

英国报纸又添了个新栏：多佛尔海峡的气象报告。如“西北风、海静、浓云、满月”，其神秘如历史的作息表。月亮到阙的时候，举国的人心更是惶惶了。

当巴黎陷落的情形传来时，那几天，英国陷入极度沮丧之中。但是后来大家又鼓舞起来了。最后，他们是认清局势了：英国已不复有一个同

盟的国家，英国已不再有一个帮手。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种认识不但没有使他们灰心丧气，反而使英国人勇气百倍。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就是他们之中的坚强代表。

丘吉尔在法国沦亡之后，使英国独自承担重任，确保战争继续下去。丘吉尔表达了英国的战斗意志。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他采取许多措施：根据抗战需要动员国内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军，进行反击德军的训练，以防德军入侵英国时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他还设法争取新的朋友。尽管当时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憎恨并希望消灭法西斯主义，可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同英国并肩战斗。所以丘吉尔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新的盟友。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有与德国旗鼓相当的实力。当时，只有苏美两国。丘吉尔注意力转向美苏。

为了拉美国参战，丘吉尔发动全面攻势。当时希特勒侵略英国的“海狮计划”已经实行了，德国首先进行的是空战，目的是想取得英伦三

岛的制空权，以掩护德国海军运送陆军踏上英国国土。

伦敦挨到的轰炸比其它城市多，而伦敦的城区中，威斯敏斯特遭到的破坏最严重，英格兰中部城市考文垂几乎夷为平地。这些挨炸的城市残垣断壁，古老的大教堂被炸得只剩下一个外壳，昔日繁华的闹市区一片瓦砾，使人触目惊心。

这些野蛮的轰炸很快就被拍成照片见之于报刊，传遍世界。丘吉尔的目的就是由此事得到海外、尤其是美国的了解和同情。与此同时，他又多次演讲阐述英语民族之间加强合作的美好前景，极力动员舆论，扩大影响。

丘吉尔利用舆论影响美国公众的同时，与美国领导人罗斯福始终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了解战争的情况。丘吉尔相当有战略眼光，认为美国虽然目前处于中立状态，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严重，但不能让她的领导人孤身于事外，因为美国有一天要参战而且必然要参战。事实上，大战一开始，丘吉尔就不断向罗斯福通报情况，以使他关注欧战。

丘吉尔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美国

公众虽然孤立主义情绪严重，但普遍同情英国，支持政府只要不参战可以全力援助。1940 年夏，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规定了现款交易原则：一手交钱一手取货。但英国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和美元资产。

可黄金的储备又是有限的，军火的需求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几乎是无限的。所以丘吉尔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此办法就是争取美国的全力支持，使美国认识到打败希特勒不光是英国的事。如果继续让孤立主义得逞，总有一天希特勒的魔影会笼罩到美国的头上。

为说服美国尽力解救英国的困境，1940 年 12 月初，丘吉尔致函罗斯福说：

"我国无力为运输费用和其它供应物资偿付现金的时刻即将来到。为了做到银货两讫，我们愿意尽力而为，决不应当在牺牲面前退缩。可是如果在这场斗争达到高峰之际，大不列颠却须被迫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资产，从而等到用我们的鲜血赢得胜利之后，文明固然得到了拯救，美国固然赢得了时间得以充分武装来防止任何不测事件，然而我们却落得个周身精光，那么这一状况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际上也对

彼此不利。这点我相信您会同意。”

罗斯福受到震动，认为美国确实不能再隔岸观火了。12 月 29 日，他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

“前途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加以防范的危险。但是我们深知，爬到床底下用被单蒙上头，并不能使我们逃避开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枪口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产生很大效果，大大促成了 1941 年 3 月 8 日国会顺利通过的《租借法案》。美国已经事实上开始介入“有限战争”，这使丘吉尔大受鼓舞。

这一时期丘吉尔同样关注另一个战略上的盟友即将遭到希特勒侵略的危险，丘吉尔深刻认识到应该将希特勒的野心通知苏联，提醒苏联做好准备。

1941 年 6 月份丘吉尔得知确切消息：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这使他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在抗击纳粹中自己将不再是孤儿；担心的是

苏联没有准备，迅速溃败，因此他利用多方渠道不断将讯息传递给斯大林。

在德军闪击苏联的前一天晚上，他与自己的新任私人秘书考维尔散步时，考维尔问首相是否对援助苏联有保留态度，因为丘吉尔是众所周知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分子。可是丘吉尔却迅速回答：

“毫无保留。”

他告诉考维尔：

“我只有一个目的，粉碎希特勒，达到了这一目的，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得多。如果，希特勒进犯地狱，我至少也得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考维尔从首相的表情中明显感觉到，由于苏联即将卷入战争，这使首相舒心极了。的确，孤身奋斗了整整一年的丘吉尔终于要有位强大的盟友了。后来丘吉尔就寝了，并且下令不准把他叫醒，除非德军入侵英国，他要好好安稳地睡一觉。

这一觉一直睡到早晨8点，当他醒来时，考维尔告诉他：

“德军已于凌晨4时闪击了苏联。”

丘吉尔立刻精神抖擞地跳下床，告诉考维尔：

“通知英国广播公司，今晚9时我要发表广播演说。”

为了这篇演说，丘吉尔全天都在准备。直到晚上开始广播前20分钟才脱稿。他说：“英国坚决援助苏联抗击纳粹，尽管英国本身已岌岌可危，但是我们仍然准备竭尽全力在各方面予苏联以支援。……任何一个继续战斗抗击纳粹主义的国家和个人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一个跟着希特勒走的国家和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1个月后，英苏两国终于携起手来，双方议定：决不单独国德国媾和；英国派遣2个中队皇家空军飓风式飞机至摩尔曼斯克以护卫北部运输线，同时派军队至伊朗建立当地运输线并阻止德国夺取油田。

9月，在伦敦开了个英美会议，决定将原定送交英国的各种军火转交给苏联。

与此同时，丘吉尔继续对美进行工作。由于形势的发展，美国也越来越全面参予战争。1941年8月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纽芬兰的军舰上会

晤，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次会晤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它向轴心国显示英美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团结。

后来的形势发展越来有利于英国摆脱孤立状态。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晚丘吉尔得到消息时，唯一的反应是极大的欣慰，因为美国终于正式参加进来了。

到1942年1月，全世界反法西斯26个国家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两大阵营对垒正式形成。

英国成了反法西斯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从此再也不是孤儿了。

戴高乐伦敦“乞讨” 待从头收拾山河

法兰西在法西斯铁蹄下呻吟，作为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世界大国正崩溃。戴高乐不得不流亡伦敦，他作何感想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6月17日早晨9时，我和斯皮尔斯将军、副官德·古塞尔乘前一天晚上给我开来的英国

飞机起飞。启程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或艰险。

我们飞过了罗舍福尔和罗舍尔。这两个港口的船只被德机炸得起火燃烧着。接着我们又飞过班朋，我的母亲在这里病得很厉害。这儿的森林由于附近销毁了一些军火库，正在冒着浓烟。我们在泽西停了一下之后，就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到了伦敦。当我进入房间时，古塞尔在打电话给大使馆和代表团，但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自己是单独一个人，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准备跳到水里游过去。”

戴高乐落难英国，两手空空，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也没有名望和地位。

然而戴高乐已经破釜沉舟。他很清楚，后退已经不可能了，今后不是奏凯而归，就是失败而归。他如今仿佛就像一个没有本钱的赌徒正在进行一桩没有把握的买卖，必须成功，没有后路，虽然面前有高山峻岭也要攀。

丘吉尔完全意识到了，当法国即将从同盟国的阵营中消失时，戴高乐的事业具有精神上的价值，因此，丘吉尔收留了他。

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当务之急是精忠报国，救亡图存。大国之中如果唯有法国放下武器径自退出世界大战，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一想到战败的法国最后竟要靠外国军队来拯救，戴高乐就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只有一些法国人继续战斗是不够的，应该使法国作为国家重新投入战斗。

但这又谈何容易，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外，他唯一的资本就是他的东道主英国愿意接受个近乎荒诞的建议，给他所代表的法国继续战斗的机会。

戴高乐征得丘吉尔的同意，于6月18日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的讲演。

尽管讲演是那样慷慨激昂，但是也掩饰不了戴高乐内心的虚弱。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随着无可更改的字句广播出去，他心中就已意识到，过去在强盛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内度过的生涯行将结束。他在49岁时却要去冒险，如同一个被命运遗弃、变得无依无靠的人一样。

不过他总算宣布了奋斗目标，现在他要作出最后一次尝试，看看留在海峡彼岸的那些人心目中是否存在抵抗法西斯的星星之火，并试探一下海外的法国头面人物的态度。

然而，戴高乐失望了。他得到的回答是：维希政府判他死刑。

殖民地总督中也没有一个人对戴高乐的呼吁作出反响，戴高乐是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上校而已，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而已。

大多数人对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认真提出疑问。即使有人认为应该战斗下去，但也觉得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那些高级人物基于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确实感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

至于法国公众，他们之中的多数更期待和平。法国农业立国的传统，滋生了那种恬静、超脱现实的浪漫主义格调，向往田园诗般的生活，无忧无虑，安于现状，战争并不是他们的爱好。相反，他们倒认为那是政府的事，他们永远只是

被动者，甚至法国士兵也是这样想的。

戴高乐加紧为自己建立一支战斗队。这时，大约有10万吨法国船舶到英国港口避难，船上至少有1万名水手。此外还有几千名比利时负伤的士兵正在英国的医院里逐渐康复。这些士兵和水手中的大多数人一心想回家，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了。贝当政府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绝大多数人都乐于从命。英国当局把白城体育场借给戴高乐，作为志愿人员集合的地方。

但在他6月18日的呼吁广播以后一个星期，才只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帜之下。全法国也没有几个人相信戴高乐所代表的事业会成功，愿意接受他领导的人则更是寥寥无几。

倒是英国人民，无论高低贵贱，一直向自由法国人士表示友好情谊，那是十分感人的。当伦敦报界报道维希政府判处戴高乐死刑并把他的财产充公时，马上就有许多不知姓名的英国同情者把珠宝和结婚戒指送到卡尔顿花园，作为对戴高乐事业的支持。

但是英国官方人士对这个一无所有的落难

者并不怎么友好，甚至是看不起。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等少数几个人外，与戴高乐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他持怀疑态度，不愿与他合作。敦刻尔克大溃退以后，武器普遍不足。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武器给法国人。人们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让他们回国。戴高乐曾想访问安特利和海多克两处兵营，但驻防利物浦的英国海军上将表示反对，理由是怕影响治安，因此未能成行。

戴高乐有时只好忍辱负重。

英国于7月3日凌晨，在事先没有通知戴高乐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了米尔斯克比的法国海军舰队并摧毁了它。理由是害怕它落入德国人手里。

戴高乐最初从报纸和广播中获悉这一消息时，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觉得这并不完全出于保障安全的动机，而是由于“多年海上竞争宿怨、法兰西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政府投降而爆发出来的愤恨。”但是，戴高乐对英国人的行径和他们的吹嘘一概忍气吞声。他认定法国本身的命运应当高于法国舰队的命运，因此战斗必须坚持下

去。

戴高乐的事业是在一种近乎可怜的条件下开始的，甚至和乞丐没有太大差别，什么东西都是英国人提供的。他的住所仅有三个房间，陈设十分简朴。他几乎一无所有：两条裤子、四件衬衫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就是他最重的家当。自由法国的总部设在一所英国提供的二层楼上。自由法国军队的所有费用暂由英国政府垫付。戴高乐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他像一般法国人一样注重面子，即使已无资本可以仰仗。为了弥补地位虚弱之不足，他摆出一副寸步不让的高傲态度，以此体现他心目中法兰西的尊严。他极力要求所有开支单独立帐，以后予以偿还，从而保持法国的荣誉。

在这种忙乱、将就、充满了内部倾轧和英法竞争的气氛中，戴高乐毕竟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不但着手组建了既忠于他个人又忠于他心目中的那个法国的运动，而且开始创立一个新法国的雏形。

1940 年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日那天，戴高乐作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开姿态，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检阅了从白厅前通过的第一

批自由法国支队。随后又在福煦元帅像前敬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一周之后，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鲁尔区的轰炸，并发表了有关空袭的消息。

在此前后，根据海军将军建议，洛林十字被用来作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标志。到7月底，大约有7000人拿起武器在戴高乐的麾下为法国的解放而战斗。

8月24日，他们荣幸地接受了英王乔治六世的检阅。

这就是承认的一种形式。其实英国政府包括丘吉尔本人在承认戴高乐的地位上一直处于观望态度，他们始终在等待一位更有名望的法国政治家来英国，并由他来掌握运动的命运。但随后的事实表明，这样的知名人士是不会出现的。

丘吉尔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不顾军方敌意及其他官员的反对。6月27日晚上，他把戴高乐请到唐宁街对他说：

“您只有一个人——那好，我只承认您一个人！”

第二天早晨，电台播出以下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是所有为捍卫盟国事业而归附他的自由法国战士——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的领袖。”

尽管这种承认是很有限度的，但是它终于赋予戴高乐将军和英国政府的关系以合法的基础，并为两个盟国签订双边协定打开了通路。对丘吉尔说，承认这一举动意味着他对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以及对被称为自由法国的这个抽象概念的信念。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然而丘吉尔在未来的五年中却不止一次地感到后悔。

两种前途难取舍　法国并不伟大

一个曾是小农的国家滋生了对混乱的恐惧，也滋生了对那种安于现状的所谓“和平”的钟爱。

田地的永恒秩序谁也不能打破，这是不容怀疑的。即使世道已经变化，谁也不会相信这种秩序也随之改变，因为土地是不会说慌的，也不会被搬走的。

回到大地上去，这是真理，朝代的变迁与我

无关。这就是法国小农的想法。

法国的溃败并没有激起法兰西民族救亡图存的热潮，激起民族大义之心。戴高乐派，那还是少数，只是后来形势发展才有所改变。

更多的人是心服口服承认失败，乞求德国人给予和平。

这个国家真令人难以置信，处于战争状态的法国众望所归的不是抗战派，而是一个主张投降的贝当元帅。此时的贝当仿佛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所有的惊慌失措的、安于现状的、乞求和平的人们以及冒险家们，都吸引到自己周围。而贝当本人也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伟大、不神圣，相反他觉得自己是法兰西人的英雄、救星，这个光荣任务非自己承担不可，他用激昂的话语说：

“我把我本人献给法国，以此来减轻它的痛苦。”

甚至当时精于纷争的法国政治家们也珍视这种团结：

“现在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都聚集到人人尊敬的贝当元帅周围来了。我们千万不要去破坏在他周围所形成的、靠他威望所建立

起来的全国大团结。”

你也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法国人本来就重法统，而贝当政府却的的确确是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贝当的上台并不是希特勒扶植的，这只不过是一次内阁更换，因为国家战败，收拾残局，停战议和也需要一个政府来处理，雷诺怕承担责任，你戴高乐又不愿做，当然就得由别人来做了。当时许多法国人都这样认为。

法国人民，除了少数人，在希望破灭于纳粹横扫欧洲的隆隆战车声中，之后，都寄希望于贝当，把他作为在未来艰难岁月中能引导他们、保护他们免受德国人之害的父辈人物。他们对他深信不疑、绝对爱戴。

维希政府的政治家们认为停战协定能保护法国保持中立和自治，他们设想英国虽在抵抗，但不久也会像法国一样被打败。他们看到的前景是整个欧洲都会变成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极权国家。

在这样的欧洲，法国的唯一出路是全面合作，甚至向它的原来盟国宣战。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法国的“波兰化”——消灭法兰西国家的一切痕迹，由纳粹地方长官直接统治。

对前途的绝望是维希政府建立的政治哲学，但这个政府声称自己代表法国。是的，它有理由这样说。虽然自己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成立的，但仍不失为一个根据完全正常的程序合法成立的政府——贝当元帅的政府。它仍有自己的地盘，海外的殖民地，自己的强大的海军，尤其是和另一个也自称代表法国的在伦敦公开宣布同所有官方机构决裂的一个孤立的人相比，更具有代表性。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事实上他们都代表法国，谁都没有错。不过，也有些区别。维希的法国所代表的是：吓破胆的、现在的法国；伦敦那个一无所有的人所代表的法国是未来的法国。

两个法国眼下谁都摆脱不了谁、奈何不了谁。旧日法国曾很伟大，未来法国久久难以忘怀。旧日法国又很渺小，未来法国愤愤然。而旧日法国看到的未来法国是在云端中，虽也憎恨，但却无能为力。旧日的法国正在逝去，看来已经不用担心。

因此，贝当判处戴高乐死刑，却批上不要执行。

戴高乐后来回巴黎时也判处贝当死刑，也批上不要执行，任其自生自灭。

法国并不伟大。本应该早些离去的旧法国却迟迟不肯离去，然而新法国却偏偏早产。

新旧相比，按理说就会显出新的伟大，可对比的结果却是，新法国是这样可怜，因为旧的没死，他就没有什么可继承。

戴高乐，就是这个新法国的化身。他是国家元首，这个国家并没有宪法，没有选民，没有首都，他却要代表法国讲话；他作为军官，肩上的星不多，但是他的国家的部长、将军、海军将领、总督和大使却都是对他唯命是从；他作为法国人，却被“合法”政府判过罪，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诽谤，受到一部分军队的武力反对。

在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首脑执政期间，他一直为他统治法国人民的权力的合法性伤透了脑筋。

这也难怪，人们能不怀疑吗？你戴高乐口口声声说：维希政府是希特勒一手扶植起来的、纳粹德国的傀儡政府，是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投降的政府，不能代表法国。可你的政府就能代表法国吗？你的政府又何尝不是英国一手扶持的？也

难说你的政府就不是英国的傀儡政府？也很难说你不向英国出卖民族利益？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半斤八两而已。

当时，在法国国内的人有许多人都怀有这样的心理。

戴高乐不得不制造神话：维希政权的人物由于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放弃国家主权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力。相反，戴高乐则因捍卫了法国的主权而赢得了至少说是临时的统治权，虽然在开始时他几乎是单枪匹马的。他所要为民族和国家作的和将要作的一切都是以人们承认这个神话为前提的。

一个人强有力时，他并不需要借助神话的力量，只是当他虚弱不堪时才求助神话的帮助。

法国的不幸并不在于借用了神话，而是在于世人偏偏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于是法国再也伟大不起来了。

第二章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戴高乐与丘吉尔度“蜜月” 远征达喀尔无功而归

在伦敦唐宁街十号的一间大厅里，摆着一张老大的桌子，桌子上铺着几张非洲地图。桌子前边是走来走去神采奕奕的丘吉尔，另一边站着冥思苦想的戴高乐。他们正在研究怎样合作以便为自由法国从维希政府控制下黑非洲殖民地中夺来达喀尔，从而使自由法国得到一块同法西斯作战的基地。丘吉尔兴致勃勃，十分健

谈，他提出了一个可以更快实现（或者说更富有想象力）的方案，他以其所特有的风度向戴高乐谈了他的设想。

首相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一幅达喀尔黎明时分的景象："某一天早晨，达喀尔城在沉闷和疑惧的心情中醒来。在初升的旭日下，它的居民会看到远处海洋中出现许多船只。这是一支庞大无比的舰队！有100只战舰和运输舰！它们慢慢地开来，用无线电广播向城里、海军、警备队播送友谊的声音。有些船上飘扬着三色旗帜。有些则挂着英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等国的国旗。在这支盟军的舰队中忽然出来一只和平的小船，上面挂着谈判的白旗。它开进港口，把戴高乐将军的使者们送上岸。他们都是去见总督的，任务是说服他让你登陆；做到这一点，盟军就可以撤退，往后所剩下的问题只是确定他和你之间合作的条件。相反地，如果要打，他就必然会毁灭。"

丘吉尔先生接着便绘声绘色地一边讲一边比划，把他希望和思想中的未来景象一幕一幕地描述出来：

"当你的代表和总督进行谈判时，自由法国

和英国的飞机将和平地在城市上空飞行，投下友谊的传单。军队和平民——你的代表们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正在热烈地讨论与你达成一项协定的好处，以及与此相反，同那些毕竟是法国的盟友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而招致的弊端。总督会感到，如果他抵抗，他就会垮台。你会发现他愿意继续谈判，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这时也许他为了'荣誉的缘故'而放几枪。但却不会再打下去。那天晚上他就会和你共饮，并举杯祝贺最后的胜利。"

一直在盯着地图冥思苦想的戴高乐似乎被首相的热情所感染，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他仍然很冷静。从他那瞬间又恢复的紧锁着的双眉，丘吉尔分明知道了将军在担心什么。

戴高乐把丘吉尔先生构想中那些为说服对方起见而加进去的诱人词藻去掉，又经过反复思考，也不得不承人他的方案是在牢靠的材料基础上的。既然英国人不可能長期把大部分海军力量转移到赤道非洲，所以只好采取直接的作战行动来帮助自由法国夺取达喀尔。如果说这一行动不具有地道的进攻性质，那就必然要

掺杂劝说和威吓的手段。达喀尔既是一个那么大的大西洋基地，“黎塞留”号又停在那里，自然会引起英国垂涎和不安。纵使没有自由法国参加，英国海军部早晚也会有一天要去解决达喀尔问题。如果自由法国参与的话，也许还有机会使这一场战斗变成对自由法国的归附，尽管可能是被迫的归顺。相反，如果不参与，英国人迟早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就会顽强抵抗，达喀尔因此可能被摧毁，最后不得不在废墟上向英国人投降，这种结局只能是对法国主权的侵害。

戴高乐想到这种可怕的结局，就下定决心要亲自参与，于是他再次拜会丘吉尔，告诉首相他赞同他的建议。

丘吉尔立即指示英国各部门积极协助戴高乐做好准备工作。然而他的参谋长们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这使丘吉尔很恼火，不断催促他们积极工作。8月8日，他写信给参谋长委员会说：

“戴高乐将军能够获得达喀尔，尤其是尽早获得，对英国利益至关重要。如果他派遣的使者告诉我们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占领城市，那就再

好不过了。否则就应该组织一支波兰和英国的武装力量，给他以必要的海上掩护。作战计划一开始进行，就应该执行到底。为了使该计划具有法国的色彩，应该使用戴高乐，当然作战计划一旦成功，就应在当地设置他的行政机构。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他，从武装力量方面给予他必要的协助。参谋长们必须拟订一个夺取达喀尔的计划。……”

丘吉尔将这份通知批上“紧急”字样，以督促三军计划委员会加快工作。

然而，准备工作进行得相当糟糕、丘吉尔和戴高乐十分不满。预定参加的英国部队大大减员，最后组成的并不是丘吉尔想象的有100艘军舰的巨大舰队，总共列入计划的不过10几艘，至于原来预定参战的波兰旅，没有什么明确理由在计划制订初期阶段就消失了。

作战开始日期一推再推，迟迟决定不下来。实际上，尽管丘吉尔无休止地催促，进攻日期又往后推到9月19日。其它的延误还会在远征出发前出现。

更坏的是，关于达喀尔情况的一无所知。有关那里的防御工事的确切性质，人们掌握的情

况奇缺。多少炮台？大炮的口径、位置？人们甚至不了解达喀尔周围登陆滩头的确切地形。至于这些海滩周围的海域情况，蒙德海军准将写的是“海域也许很坏，也许不坏”之类的话。尽管有关达喀尔形势的情报是这样不完整，但是要塞司令布瓦松总督的态度至少使人相信：达喀尔不会不战而降。当然，谈判一旦失败，战斗将不可避免。

可笑的是，提供给两位远征军司令的有关达喀尔情报，不言而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保密性也令人担忧。在伦敦和利物浦的好几个饭馆里，可听到一些法国军官在举杯祝贺：“达喀尔见！”

还有，一个法国军官在同他的女朋友们谈话时、英国军官在伦敦旅行社搜集有关达喀尔情报时，均不严守秘密。而利物浦的码头工人竟把远征军的确切目标讲给任何感兴趣的人听。准备装运走的箱子有两次竟然落地散开，掉出几百份三色传单，上面写道：

“致达喀尔的居民和达喀尔的法国人！为解放法国，请加入到我们中间来。”

看来，丘吉尔与戴高乐的政治蜜月一开始，就有不祥之兆，结果恐怕是好梦难圆。

尽管有这些那些令人懊丧的地方，戴高乐将军仍相信行动会取得成功。由于8月26、27、28日，乍得、喀麦隆、刚果先后归顺自由法国，他确实受到莫大鼓舞。8月30日，他和首相在唐宁街共进午餐，气氛是热情洋溢的。

31日，远征军终于离开利物浦，踏上征程。戴高乐站在船头，满怀信心地望着滔滔的海水，思绪万千。

他提起笔来给他的部下卡鲁特将军写了一封信（当时这位将军正在伦敦）：

"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和军队、军舰和飞机一起向达喀尔启程了，有英国人的支援，我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英国人干起来了，对我们和他们来说，幸运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是个地道的'军人'。战争就看希特勒和他之间的较量了。"

9月17日，戴高乐到达弗里敦。他得到情报，一个星期前，维希法国的6艘巡洋舰冲破英军拦截，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毫无阻碍地于9月14日到达达喀尔。5天以后，维

希政府又派了7艘巡洋舰向达喀尔方向驶去，显然，达喀尔已有了警觉。

丘吉尔得知情况，马上意识到危险有多大，战时内阁认为必须放弃这次行动，于是向远征军发出指示。

戴高乐坚决反对。两位远征军司令也同意他的意见，这三个人坚持继续执行行动。这坚定的信心深深地打动了丘吉尔。9月18日，战时内阁也表示同意。

9月23日联合舰队出现在达喀尔水域，没有看到任何温斯顿·丘吉尔1个月前所想象的壮观场面，当时大雾弥漫，甚至从海岸都看不到同盟国的舰只，所以根本谈不到战略威慑的作用。

但戴高乐将军主意已定，早上6点他按原计划向达喀尔城的海员、士兵、居民发出号召书，并起飞两架法国小飞机降落在达喀尔机场，带来了使者。其他英国和法国飞机在城市上空飞翔，扔下三色传单和三色小旗。然而达喀尔城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什么反应，防空部队也没有表示。

戴高乐正在诧异。突然，达喀尔的高射炮轰

鸣起来,“黎塞留”号军舰的大炮也随之响应。三位在达喀尔机场刚下飞机的法国军官立即被捕。两艘悬挂三色旗和白旗的小艇深入锚地,戴高乐的使者刚一登陆,就受到威胁:敌人要逮捕他们,因而不得不在猛烈的射击下重新登船。英国军舰不得不进行还击,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炮战。

戴高乐组织远征军强行登陆,但也遭到失败。英国军舰“决心”号受重创,自由法国与英舰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守军投降仍无希望。戴高乐无计可施,于9月25日不得不率军向弗里敦返航。

达喀尔的失败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德国和维希政府的宣传机构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而且英国报界的评论几乎也同样残酷。

戴高乐那些天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度过来的,失败使他尝到了苦头。他担心由于打了法国人而受到谴责,他担心自由法国的事业,他也为丘吉尔担忧。他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像地震剧烈地震撼一个人的房子,房顶上的瓦片纷纷打在他的头上。

伦敦方面向戴高乐发出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愤怒，华盛顿则掀起了一阵飓风式的讽刺。美国的新闻界和英国的许多报纸异口同声：

“就是他，想出了这个荒唐的冒险。他对达喀尔的形势作了虚构的报告，害苦了英国人。当达尔朗已经派来援军，成功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还以唐吉诃德式的精神，坚持必须进攻这个地方……此外，土伦开来的巡洋舰也完全是由于自由法国不断泄露机密所造成的结果，这样就使维希警惕起来了……这一下可看明白了，不能保守秘密的人是不足信任的。”

不久以后，丘吉尔也受到激烈的攻击，据说他轻易上了别人的当。

维希的宣传，更是津津有味地重复刻薄而尖酸的中伤。达喀尔的公报则宣扬这是一次伟大的海军胜利。无数的信件都寄来祝贺总督布伊松和达喀尔英勇的战士们。

丘吉尔虽然受到严厉责难，但并没有抛弃戴高乐，这使戴高乐感到欣慰一些。首相说他比任何时刻都更加信赖这位将军，他在下院宣布：

“我们和戴高乐将军都不希望被拖入一场与维希法国人进行的血腥而持久的冲突中去。

我一点也不怀疑戴高乐将军有理由认为绝大多数法国人是倾向自由法国的。我甚至可以说，当此时刻，他的判断相当准确，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的行为只可能增加我们对他的钦佩。英王陛下政府在戴高乐的事业和法兰西的事业上融为一体之前——这个时刻必将到来——绝不会对他的事业弃之不管。”

在陈述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后，丘吉尔严厉谴责那些诽谤者：“只有建设性的、严厉的和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才是有益的。但是某些报刊在谈到达喀尔事件以及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时所使用的口气——幸亏不多——是如此恶毒和刻薄，以致几乎下流，即使对敌人也不至于如此。”

首相的公正态度大大促使议会和报纸把愤怒平息下来，但毕竟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戴高乐怀着失意的心情去看望远征军的士兵们。他惊奇地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他，相反由于维希方面的敌意反倒使他们态度更加坚决。一些将军们打来热情洋溢的电报，重申他们的忠诚。在杜阿拉，戴高乐——这位失败的将军

却受到盛大的欢迎。

戴高乐感动了，他重新有了信心，他感到自己就是不屈不挠的法国象征，他必须无愧于这一新形象。

戴高尔又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斗争。11月17日，戴高乐离开自由法属非洲飞回英国。当时秋雨霏霏，飞机在海面上掠过，他陷入了沉思：回想起自由法国事业开始的艰难经历，今天毕竟有了一点起色；想到未来不知道自由法国运动往后在一场奇异的战争中将经过多长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交锋，重建法国的伟大。这些，不知道付出多少艰难的努力。但一想到那些可以自由地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的人具有多么大的热诚，心中就又振奋起来。戴高乐在思索着一切能鼓舞他们在世界规模的冒险中前进的东西。

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他有信心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

叙利亚兵家必争　盟友间利益难分

一架银白色的飞机正呼啸着掠过地中海，

飞向情况日益复杂的东方，然而坐在飞机上的戴高乐此时心中的念头却很简单。他心中想着的只有两点：一点就是那里将发生重大事件；另一点就是法国应该参加进去。

那里是控制亚非欧三大洲的战略要点，但是法国在这里的地位已经削弱，而且这里为各方面所垂涎。当一切都在沸腾的时候，如果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陷于被动，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保住其中的任何一块土地，因此法国必须行动起来。当时，希特勒也想占领此地，并且向仍在此地保有宗主权的维希法国施加压力，维希政府已指示它的驻叙利亚总督邓茨将军抵抗盟军的“侵略”。

英国也有染指此地之意向。这些使戴高乐十分忧虑。

戴高乐一到中东，就加紧组织自由法国的军队准备进军叙利亚和黎巴嫩。但由于力量弱小，不得不同意与英国军队联合行动。

当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准备在军事上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彼此之间的政治冲突就在幕后酝酿起来。在盟军参谋部的圈子里，在开罗大使馆的周围，在耶路撒冷的高级英国官员那里，

戴高乐处处感到英国有迹象要撇开自由法国，为自己获得利益。

如果让英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立定脚根之后，自由法国就无法在这些地方维持“原样”了。

1940年的大震动——维希的投降和轴心活动，使得戴高乐觉得自由法国必须对东地中海地区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来应付形势的发展和新出来的力量。战争一旦结束后，法国是不会保留托管地的，即使它想这样做，阿拉伯人民和国际局势的趋向也不会允许它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心里很明白这一点，只有允许它们独立，但法国利益必须要得到维护。

英国人绝不会满足这种状况，他们玩弄的把戏是想在整个中东建立英国的“领导权”；这些把戏由伦敦方面可靠的决策部门决定，由一批无所顾忌又很有办法的人去当地执行。英国外交部接受这种把戏，它对此有时叹息，但从不加以否认。

首相也支持这种把戏，只是不好明确出来直接参与，他的含糊诺言和装模作样的表情使人捉摸不到的他的真实意图。因此英国的政策

是时而明争，时而暗斗，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地位。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英国军队根本看不起自由法国，认为只是英国的附属品，先是阻挠自由法国军队参战，经过戴高乐抗争才参加了叙利亚战争。

1941 年 6 月初，即战争前夕，双方的冲突也日趋激化。

英国试图把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所做的让步作为自己斡旋的成果而取信天下，然后再怂恿当地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最后又出来支持必然导致的挑衅。同时利用法国当做挡箭牌，促使当地和国际舆论攻击，从而转移群众对英国侵略其它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而自由法国方面，本来自己已经弱小不堪，但仍以昔日的大国自居，顽固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

接着双方又在叙利亚宣布独立问题上争吵不休。英国坚持这个声明应当用英国和自由法国名义提出，戴高乐反对。英国随后又提出由英国作为法国承认叙利亚独立的诺言保证人。戴高乐当即对英国代表说：

“法国的诺言无需外国保证。”

丘吉尔也亲自发电报劝戴高乐接受英国建议，戴高乐仍没有签应。他认为英国是想造成一种印象，即让人认为这两地的独立是出自英国的力量，在下一阶段，英国就可以充当法国与东地中海国家之间的仲裁人。但英国政府仍然不顾戴高乐的反对，发表了英方的独立宣言。

当时，战斗已经开始。戴高乐亲临前线，看到士兵伤亡很大，但仍然勇敢地忘我战斗，他深受鼓舞，愈加坚决不屈。

6 月 18 日，维希将军邓茨支持不住，不得不由维希政府要求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向英国人和戴高乐派了解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

第二天，戴高乐将军接到一份转送到贝鲁特、并已发往华盛顿的停战条件副本时，他发现英国外交部在相当数量的重要问题上没有考虑他的建议。因为发往华盛顿的文本上规定：

“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谈判将在代表三军总司令的威尔逊将军和叙利亚的维希当局之间进行。”

协议并没有提到自由法国参加谈判的问题。此外，没有一处提到自由法国当局是在地中

海东岸地区法国的代表。

此外，戴高乐在其它问题所要求的其它具体措施也没有被满足。

戴高乐将军勃然大怒，对英国斯皮尔斯将军愤怒地说：

“我认为我将永远不可能与英国人融洽相处。你们都一样，只关心你们自己的利益，从不考虑他人的需要……你以为我会祝愿英国的胜利吗？啊不！我只关心法国的胜利！”

7月初，叙利亚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戴高乐据理力争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相反，由于战争的结束，斗争更加激烈，他终于成功地坚持他的代表卡鲁特将军参加了停战会议。6月28日，他还致函丘吉尔力陈要求：

“如果我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共同行动最终将削弱法国在那里的地位，并导致英国的倾向和影响加强，维希、柏林和罗马都会感到满意，然而我深感这对我国舆论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我应该补充一点，我个人一向致力于使法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和英国一起抵抗我们的敌人，但这种努力也会因上述原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戴高乐斗争的效果并不大。

7月10日，邓茨将军要求停火。3天后，双方代表在圣—让—达克开会，英方代表威尔逊占了主角，自由法国代表卡鲁特将军只是一个可怜的配角。

7月14日停战条款一公布，舆论大哗。整个协议只是对英国利益的充分保护，维希当局得到宽大处理，战略物资交给英国，由叙利亚和黎巴嫩志愿人员组成的“特别部队”也都归英国人指挥，协定根本没有提到自由法国。只有一处提到：自由法国战士不得与维希的法国人有任何接触。

条约严重地伤害了自由法国的利益和感情。连一些参与谈判的英国代表也认为条款“绝对荒谬”，“一些应该给予自由法国人应有的地位的地方，现在也被剥夺了。”

正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戴高乐反应极为强烈。维希政府与英国人之间订的协定似乎证实了他所担心的最坏设想和他对英国政策的固有成见：从中他看到了英国全然无视自由法国的利益，而对维希政府的宽容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并暴露了英国想在中东替代法国的明显意图。

实际上就是把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转让给了英国人，这就是这个协定的实质。

7月16日，戴高乐向新闻界发表声明：他不能承认《圣—让—达克条约》。

戴高乐深知自己地位的虚弱，但作为一个法国人的性格特点，他又从不承认。他知道为了补充自由法国的虚弱，自己应该做什么。每当英国当局侵犯自由法国利益时，他就以激烈的抨击和威胁性的最后通牒的方法来威吓和为难他们。

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战，英国官员们有时还真禁不起这种考验。当然，他们实际上需要戴高乐的合作，即使看不起他。

英国政府委托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向戴高乐解释，以期平息戴高乐的愤怒。实际上，利特尔顿本人对《圣—让—达克条约》也不满意，因此他深为担忧，在这样不利条件下和戴高乐面对面接触是难堪的。

谈判是在利特尔顿办公室进行的，戴高乐阴沉着脸走进来冷淡地打了声招呼，国务大臣有点尴尬地站起来请他坐。戴高乐因强压怒火而脸色苍白，他开门见山地说：

“停战协定自由法国不能接受，它束缚不了我们。因为协定使英国人在该地建立了权威，而这种权威本应归自由法国。对维希军队的遣返对我们是个巨大打击。英国在整个事件中的作为是和法国荣誉和利益不相容的。”

“可是卡鲁特将军参加了谈判，并且同意了条款。”利特尔顿争辩说。

但是利特尔顿远还没料到后面发生的事，戴高乐拿出来一份照会，结尾如下：

“自由法国，也就是法国，不再同意由英国军事统帅部来负责指挥中东的法国军队。戴高乐将军和法兰西帝国国防委员会从 1941 年 7 月 24 日正午起收回对地中海东岸地区法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全部支配权。”

利特尔顿惊呆了：

“将军，我不得不把这个文件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因而我不能接受。”

利特尔顿马上向丘吉尔首相报告：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只能使自由法国与英国联盟告吹。”

利特尔顿与戴高乐一直争吵到中午 12 点半，这时国务大臣要求会议延期，晚上 6 时再重

新开始。

晚上，戴高乐将军再回来时心情稍微改善了一些，利特尔顿似乎也很轻松，一下子同意作出不少让步：英国政府放弃干涉叙利亚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并保护“法国在叙利亚的传统利益”。

7 月 24 日，双方达成一项解释性协定，即纠正对自由法国的不公，允许自由法国当局和维希军队进行接触，并向“有关人员陈述他们的观点”。现在承认，战争物资应该归自由法国，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特别部队”编入自由法国武装力量，而不是编入英国军队。戴高乐将军的固执和努力收到一定成效，但他并不因此而过分高兴。无论如何，自由法国领袖对他的行动收到的效果感到十分满意。

那天晚上，他向在伦敦的自由法国代表团致电：

“总之，目前英国的方针的改变是有利的。危机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且没有完全结束。”

危机甚至远远没有消除。因为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尽管利特尔顿“船长”明显表示出诚

意，在该地区的英国军人却根本不重视 7 月 24 日的解释性协议。邓茨将军仍然统率着他的军队，而且军队在的黎波里地区集中，直到他们上船前完全被隔离起来。这是英国军事当局为阻止他们和自由法国人接触所采取的行动，借口是“怕引起混乱”。

某些举动是英国陆军部和殖民地当局故意做的。英国指挥部征用自由法国代表团在苏韦达的住宅“法兰西大厦”，并把三色旗降下来，把英国国旗升上去。

自由法国总代表、地中海东岸地区总司令卡特鲁将军回总部时，遭受到一个澳大利亚哨兵的刁难，禁止他入内。在那里，英国国旗也同样代替法国国旗了。

英国最高指挥部也带头这样做，威尔逊将军威胁说要宣布戒严令，掌握地中海东岸地区全权。

有一位英国军官甚至拒绝参加戴高乐举行的晚会，据说是怕损害他和维希当局的良好关系。

令人奇怪的是，英国军官事实上对他们与之斗争的维希法国人比对和他们并肩作战的自

由法国人更抱有好感。

英国军事当局根本不把自由法国放在眼里，他们宣称对利特尔顿和戴高乐之间达成的“解释性协定”一无所知。

维希政府的所有人员受到了彬彬有礼的待遇，遣送上船回国竟然没有受到英国方面的检查。然而维希法国可全然不领情，他们扣押盟军52名军官，并且对停战的条件敷衍了事。英国这时才有所悔悟，但已经晚了。

英国当局的这些差错使戴高乐感到愤怒。他申斥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所有英国人，特别把矛头针对威尔逊将军、陆军部、“殖民部支持的狂热的亲阿拉伯团体”，自然还有他眼中钉的“情报处”。

不管有理或无理，他怀疑所有人都勾结起来侮辱法国，想在该地区取法国而代之。当然他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正是他地位虚弱的表现。英国是个强大的帝国，而他的自由法国一无所有，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这使他那种高傲的民族自尊心难以忍受，他迫切希望别人把他当做大国领导人看待，可当时他的法国不过就是一个流亡团体，根本代表不了法国，离开英国就无法

生存，或者说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此，他不得不用虚张声势来填补自己力量的不足。

整个夏天，他动手准备心理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武器，以便使英国人尊重法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主权。

他这样做吓坏了他在伦敦、开罗、贝鲁特的拥护者，而这些拥护者认为与英国人紧密合作关系到自由法国的生存问题。但戴高乐将军毫不在意，他一报还一报，既不惧怕，也不动怒。

戴高乐将军就是这样以一份名副其实的最后通牒驳回了《圣—让—达克条约》，使他得到了 7 月 24 日“解释性协定”。以后，当威尔逊将军要宣布戒严令时，戴高乐将军声称这样的措施就意味着篡夺法国的权利，将导致与英国立即断绝关系。

为了捍卫法国主权，戴高乐将军甚至不惜冒险武装冲突的危险。

7 月底，他派一支由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自由法国纵队往苏韦达夺回“法兰西大厦”，恢复德鲁兹骑兵中队。英国旅在苏韦达指挥部威胁说准备迎战，自由法国战士声称奉陪——当然英国军接到了撤离的命令。

戴高乐常有惊人之举。1940年他出走英国时本来是送英国军官回国，然而，戴高乐却在飞机即将起飞的一刹那跳上飞机，腾空而去，令在场之人目瞪口呆。这也许是法兰西民族所固有的浪漫主义性格，喜欢做一些打破常规的事，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满足自己那种高傲的心理需要。

实际上，戴高乐更像法兰西帝国走向没落的象征，本来实力已不配作为一个大国，但他又不承认，总是想出一些新花样，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国家仍是个大国。

戴高乐也能运用某种更符合惯例的外交手段，然而其运用方法不一定那么符合习惯。这年夏天他向丘吉尔发出好多封既强硬又恭敬的电报。7月21日，他在写到《圣—让—达克条约》时说：

"我不得不对您说，我本人以及所有自由法国战士都认为这个协定从内容上说违背了自由法国，即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利益，因而从形式说极端地损害了我们的尊严。……我希望您能亲自感觉到，在一个对我们生死攸关的事来说，英国采取的态度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困难，从我肩

负的使命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其后果是令人痛心的。”

他对外交大臣艾登的态度也很恭顺，但程度要差一些。8月1日他叫人传话给艾登说：

“英国的干涉已经导致最严重的复杂局面，英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无视法国权利的政策所能获得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和微乎其微的，相比之下，自由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争吵所引起的弊端却是正大的。”

而对英国其他大臣，戴高乐将军公开采取粗暴的语气，讽刺挖苦不讲分寸。

戴高乐充分利用公众舆论这个有力武器，在电台、报社发表讲话、著文揭露英国的错误政策，常常使英国下不了台。当美国记者提问：

“将军，您认为伦敦为什么没有与维希破裂而承认自由法国政府呢？”

他回答说：“英国害怕法国舰队。事实上伦敦与希特勒在战争时间上有某种交易，维希政府在其中充当中间人。维希政府使法国人民处于奴役地位，把法兰西帝国某些地区出卖给德国人，来效忠希特勒。但不要忘记，维希政府也以拒绝把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来为英国人效

劳。和德国一样，英国也在利用维希政府。唯一的区别是目的不同。我们实际上目睹了两个敌对大国间的互惠交易，只要英德还能从中捞到好处，维希政府将存在下去。”

丘吉尔对戴高乐的反应很震惊，起初没有注意到事态如此严重，因他的精力正集中于在北非与德国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争夺，之后又被苏德战争的爆发吸引起来。当国务大臣利特尔顿向他汇报：“戴高乐……大发雷霆，一切有关英国的他都攻击。他似乎前一天彻底未眠，在任何问题上我都无法使他头脑清醒。”

他在报告结尾说：“我之所以给您这么冗长的报告是因为我无法摆脱困境，……假如戴高乐再过一个不眠之夜，恐怕明天我们就会面对更出人意料的要求。……彻底决裂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外交就应该这样搞的话，我宁愿选择另一个职业。”

戴高乐将军的态度使温斯顿·丘吉尔深感不安。自由法国领袖与它的盟友的不和公开化，对英国人缺乏尊重，他表现出确定无疑的仇英态度，他与英国军政官员发生激烈的争吵。他公开发表声明、接见记者抨击英国。有关将军仇英

情绪、行为、声明不时放到首相办公桌上了，丘吉尔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器重程度开始大大下降。

丘吉尔也觉得该刹一下戴高乐的威风，于是他指示目前冷淡他，不与他接触。

很明显，即将发生一场大冲突。自由法国和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避免这场暴风雨的爆发。

戴高乐的部下莫里斯·德尚拜访莫顿少校，对戴高乐声明抱怨，并且说："戴高乐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当运动领袖是万分遗憾的，……没有理由认为戴高乐是仇英的。"

他劝英国人重新信任戴高乐。

艾登也致函首相：

"如果他表现某种悔悟，我希望您不要低估您有能力把他拉回正道。……在法国，他作为反对维希政府的中流砥柱，其作用是巨大的……"

就在此时，戴高乐将军正平静地飞回英国。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被冒犯的，决心到伦敦便"冒失地干一场"。

然而，他一下飞机，发现迎接他的民族委员

会成员个个神情沮丧，证明他们心情很坏。而这足以使他情绪平稳下来，不再毫不容情地对待他的盟友。将军已明显感到英国当局的不快所造成的压力。

这一天，丘吉尔通知他的内阁："由于戴高乐将军最近几周的令人担忧的态度，请各位大臣对自由法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采取拖延和谨慎的态度，直到新的情况发生。"

英国人首先拒绝他在广播公司讲话。首相又给他一封口气冷淡的信：

"您认为可以向我作出一切解释前，我不可能判断我们的会面是否有益的。"

戴高乐在他的总部卡尔顿花园附近的街道上散步，但对于英国官方当局来说，他这个人并不存在。报纸无权报道他返回伦敦，英国人整天都在公开激烈抨击他和他的同伴，说他们表现很恶劣。

戴高乐似乎对被人冷落并不以为然，他深信不会无限期拖下去。他也采取一些报复措施，如命令所有自由法国人停止英国广播公司播音。但他也知趣地试图缓和紧张关系，以打破僵局。他接见丘吉尔身边的莫顿少校，对他说：

“我一直受到首相、各位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慷慨款待。”

接着，戴高乐也以令人宽容的坦率态度承认自己很遗憾地发表了一些声明、照会、言辞，但是他说当时正处在气头上。他又说：

“和英国驻开罗国务大臣的关系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丘吉尔终于被打动了，他不记仇。他通知戴高乐9月12日接见他。戴高乐很平静、很自信，冷静地等待丘吉尔答应在下星期向他所做的解释。

而温斯顿·丘吉尔在等待会见时并不怎么平静。他了解了自由法国运动的确切地位、戴高乐将军的“代表性”以及采取什么措施能使他的运动更好地“控制”他。他还要求外交部列一份英国方面触犯戴高乐将军的所有事件的清单。他承认“法国在叙利亚的特权地位”后，又在下院宣布，应该让叙利亚独立，不要拖到战后。不能由自由法国的利益简单地替代维希法国的利益。

9月12日双方急切盼望进行解释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午后3时将军出现在唐宁街10号，

坐在办公桌正中的丘吉尔站了起来，略微点了一下头，并指了指他对面的位置。戴高乐看来很安详，并不窘迫。他走向他的位置，一言不发坐下来，直视首相。

“戴高乐将军，今天下午我要求您到这里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第一次谈话不用法语，而用翻译。丘吉尔停住了，凶狠地盯着翻译。

“我的将军，”翻译开始翻译，“今天下午我邀请你来……”显然翻译的水平是一流的。

“我没有说我的将军。”首相打断译者，“我没有说我邀请他。”尽管他时时打断，译者还是将就着翻译了后面的几句话。

轮到戴高乐将军说话了，说完一句，他就转向翻译者，译者开始翻译。“不对，不对，”他提出抗议，“这完全不是我说的意思。”实际上这正是他说的意思。

丘吉尔这时对译者说，假如不能翻译得更好些，就干脆换人。

译者尴尬地退出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劳福德抱怨，因为他的法语无懈可击。劳福德匆匆赶来。可是刚过一会，他也满脸通红退出来，声称他无疑是和两个疯子打交道：“他们说他的法语

不行，还是应该不要翻译。”

显然，丘吉尔和戴高乐的私人友谊使他们感到直接争吵很难为情，因此通过翻译来发泄对各自的不满。

首相宣称他很痛心看到戴高乐对英国政府态度变了，将军散布了很多敌视英国的言论，这些大量材料使他很不安。

戴高乐将军回答，不能如此当真地把他当作英国的敌人。他目前的地位和他的经历都不能使人理解这种看法。但是，应该说，最近某些事件尤其叙利亚事件使他动摇了，导致他对英国当局对他的很多运动以及他自己态度上产生怀疑，另外还由于他个人处境的巨大困难，他的孤立，也许还有他个人的脾气促使他发表了一些英国人听起来刺耳的声明。在这方面，他愿意表示衷心的遗憾。

首相说，他是信任将军的，并且是想和将军合作的，做了许多有益将军的事。当然，英国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将军为此而气恼也是有理由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障碍也是难免的。但是将军却变得越来越敌对，并且不和首相进行联系。

戴高乐提醒首相，他发过多次电报，但没有回复。叙利亚的英国当局根本不知道自由法国代表什么，他的代表忍受无数屈辱。他和国务大臣的协议双方表面满意，但在实际中如同废纸一张。和平时期，这类困难可通过外交瞬间完成。但是法国现在沦陷了，受到凌辱，它的神经很敏感。如果他受到这样待遇，那么他为保卫法国而作努力也必然要失败。

首相接着说："我们在叙利亚没有任何野心和其它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败希特勒。"

戴高乐回答说：

"我根本不怀疑英国人有私利的企图，我在原则上是没有意见的，而是在方法上怎样避免法国人受到侮辱。"

接着两人又谈了一些其它问题。丘吉尔的秘书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开始有些担心，两人已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现在是不是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件，也许他们俩正互相掐着脖子呢！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秘书越想越害怕。正在这时铃声响了，一走进办公室，发现两人已并排坐在一起，戴高乐抽着首相的雪茄烟，

两人正用法语亲切地交谈。

丘吉尔一面送戴高乐出来，一面肯定地说他很高兴再见面：

“假如国务大臣回来，将安排一次三人会面。”

会见开始很糟，结果却很圆满，两位伟人又一次握手言和。双方会见消除了许多误解，减少了一些成见，解除了一些怀疑，两位领导人之间重新建立了信任和理解。

实际上，丘吉尔无限赏识这位从不畏惧失败的、孤独而不屈不挠的人。至于戴高乐，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领导人肩负着重大使命，他感到丘吉尔是少数几个真正理解这个使命意义的人之一。

然而，如果人们从中得出结论，两人从此将保持最坦率、最友好的关系，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

戴高乐与丘吉尔“感情危机” 罗斯福“第三者”插足

1941年12月7日，战争敲响了美国的大

门。对丘吉尔来说，长期孤军奋斗即将结束。而戴高乐将军则立即领会了事件的意义，他对自己的同伴说："啊！这场战争要结束了……当然，还会有作战行动、战役、战斗，但是战争快要结束了。既然从此以后，战争的结局已众所周知。在这场工业战争中，谁也不能抵御美国工业的威力。"

之后，将军又说了一句具有预见性的话：

"从此，没有罗斯福点头，英国人什么也不会做。"

此时此刻，正是戴高乐与丘吉尔关系走向恶化的时候。丘吉尔尊重戴高乐将军本人，但从根本角度讲，他并不把戴高乐将军所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当做法国的整体，也许是由于它太弱小，也许由于是自己一手扶植起来，因此自由法国在他眼中怎么也伟大、神圣不起来。而作为亡了国的、但仍以昔日大国领导人自居的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比任何时候都敏感，事实上他的敏感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每当利益受到侵犯时，他就会暴跳如雷，以期引起人们对法国的重视，维护法兰西人的尊严，掩盖自己地位虚弱的缺陷。

他的性格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难妥协了。尽管随时都能说一些幽默讽刺的话，但在通常保持冷漠镇定外表的同时，间或也情不自禁地发一通脾气，而在更多情况下，他是有意发火的。因为他和大多数杰出的公众领袖一样，认为做戏自有妙用，可以使他达到他想得到的完美效果。

多年以前，他在他的著作《剑刃》一书中就是提及并颂扬了恺撒和拿破仑的表演才能。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法兰西本身，这是历史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的一个伟大角色。这始终是一种绝妙的表演，使许多近台观众都深信不疑。

尚未亲自领教过戴高乐表演的罗斯福，从不相信、也不奉承戴高乐的这种自诩。丘吉尔则好像是坐在正厅前排，也许是离台太近吧，他并未完全信服。

“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英国首相有一次盛怒中吼道：

“法兰西！她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追随者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值得尊重的部分。但除他们以外，我们无疑可以

找到另外的权威，它也有它的价值。”

戴高乐打断他的话：“如果在你看来我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利来同我商讨法国的世界利益呢？”

丘吉尔不吭声了。

由于戴高乐寸步不让，丘吉尔又把继续战争作为当务之急而置这位将军的感情于不顾，这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总是很坏，即便关系好也只是一阵子的事。怪并不怪在有这样多的争吵，而在于事情从未发展到最后决裂的地步。两人之间都互相尊重。

然而，罗斯福——这个第三者一登场，这种关系就不可避免地比先前越搞越坏。罗斯福一登场，丘吉尔几乎立即就默不作声投入罗斯福怀抱，另觅新欢，在新的大同盟中改扮次要角色，尽管一有机会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罗斯福仅仅把戴高乐看作是“与其他将军一样的一个法国将军”，甚至他怀疑戴高乐是英国人造就出来的，很不赏识。再说，华盛顿方面更热衷于鼓励维希政府的老元帅贝当“重振精神”参加盟国对希特勒的战争。而丘吉尔首相又向戴高乐保证过支持自由法国，这位首相便陷

于困境。加之戴高乐一直坚持他的要求，这就更使首相的处境有时难到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

丘吉尔对于戴高乐并无不忠不义之处，尽管一怒之下他有时也想这样做，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罗斯福与戴高乐发生冲突时，丘吉尔非支持美国总统不可。

1941 年春无疑是战争的最黑暗时期，英国首相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本在珍珠港袭击了美国舰队。就事件本身来说这是海军的一场灾难，但对反法西斯国家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美国的参战。但是 3 天以后，日本飞机又在马来亚海域炸沉了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1942 年 2 月 15 日，军事要塞新加坡的大批英军也向日本侵略军投降。此外，奥金莱克在北非的胜利为时不长，隆美尔的反攻很快就要再度突破英军在沙漠中的防线。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说，1942 年 6 月 21 日托卜鲁克的陷落结束了 6 个月的灾难史。在这出悲剧的尾声中，丘吉尔——无可否认，他仍掌握着内阁、议会和人民——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比他上台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动摇了。人们不能指望这种状况会有助于改善他和戴高乐的

关系。

在戴高乐重返伦敦后的整个困难时期中，法英两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关系一直危机重重。同时，在非洲之角，戴高乐的代表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与英国当局在与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关系上以及在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铁路问题上也经常发生冲突。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

1942年5月5日，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凌晨3时，一家通讯社打电话给戴高乐，告诉他一支英国特遣部队正在马达加斯加东北海岸线上的战略要港迪耶果—苏瓦雷斯登陆。由于这次在法国领地上的登陆事前竟未与戴高乐商量过，他顿时愤怒到了极点。

事实上，自日本参战以来，将军就一直敦促盟国让自由法国对马达加斯加采取军事行动。1941年12月16日，他首次就这件事写信给丘吉尔。1942年2月19日，他再次写信催促做出决定，并向英国参谋部提交一份详细计划。4月9日，他又向安东尼·艾登发出了一个催办此事的照会。

这个岛屿显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有被日本占领的危险。然而，在戴高乐初次提出

建议时，马达加斯加还不在丘吉尔优先考虑之列。

日本在东南亚的神速进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孟加拉湾、锡兰和印度洋的危险，使首相改变了他的看法。但他考虑的问题在于自由法国是否应该参加任何登陆行动。从他们本身的情况看，他们显然缺乏登陆的手段，这就需要英国海军和空军的支持。但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对达喀尔的惨败和由于自由法国人员的极为轻率的行动致使这次战役受到破坏一事记忆犹新，因此在同美国商量后，他决定自己干，不让戴高乐过问其事。

从事情的前前后后来看，这样做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决定势必要惹火戴高乐将军。英军登陆当天，发自华盛顿的一份公报宣称：美国和英国同意，马达加斯加应在占领该岛对于共同事业不再必要时，立即归还法国。这份公报更使他怒火中烧。一想到法国的一块领地将在一段时期中被人夺去，戴高乐将军怎么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

艾登要求与戴高乐会面，戴高乐竟让他等了6天。

5月11日，他们会晤时，将军看出外交大臣有些局促不安。

“我向你保证，”艾登说：“我们对于马达加斯加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希望法国行政当局继续行使职权。”

“哪一个法国行政当局？”戴高乐问道。他听说英国打算与维希总督安内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划定迪耶果—苏瓦雷斯为英方的活动范围，而把岛屿的其余部分让给维希行政当局统辖，戴高乐立即反对这个计划。他说，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其结果将是法国领地在盟国的保证下中立化，这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反之，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法国人迫使维希作战的可能性将会更大。

艾登反驳说，他认识到自由法国的协助是必要的。英国政府随时准备说——公开宣布将在马达加斯加建立自由法国的政权。

5月14日，英方声明，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在这个已经解放了的法国领地上具有应有的行政权。

戴高乐立即命令在赤道非洲集结一个混合旅，时机一到就开往马达加斯加。但是，看来在

英国官方声明与执行政府政策的军人和特派员的行动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距，这使戴高乐再次遭到挫折。他在回忆录回忆说，维希事实仍然是全岛的主人，而且英方还没有停止同安纳特总督的谈判。英国又派了一个名叫勒什的人率领的情报组，从东非来到该岛。而戴高乐打算派去马达加斯加了解局势发展的人，英方拒绝放行。

已决定到利比亚视察法国军队的戴高乐本人也被告知延期出发。

与对付先前危机一样，戴高乐又采取了丝毫不让步的态度。6月6日，他责成查尔斯·皮克向丘吉尔和艾登阐明他的立场。他说："如果在马达加斯加、叙利亚或其它地方，法国由于盟国的行动而被迫失去它固有的任何领土，那么我们将没有任何理由再和大英帝国和美国直接合作下去。"

他威胁说，要撤回到自由法国统治下的领土上去单独进行斗争，并随即把这些强硬的言词电告他驻北非和中东的军政代表。

法英关系布满了乌云。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大西洋

舰队总司令金海军上将，曾在伦敦停留一些时候，但是避免同戴高乐见面。这更使戴高乐疑心重重，他认为凭法国的领土、人民和军队，要事应该与盟国进行密切磋商。但是无疑美英想把自由法国这个积极因素远远排斥在外边。戴高乐深深地感到一种被冷落的感觉，这使他态度更加坚决。

同往常一样，他的办法奏效了。6月10日，丘吉尔先生约他会面，畅谈了一个钟头。首相在热烈称赞法军在比耳哈亥依木的光辉掩护战之后，就谈到马达加斯加的问题上来。他向戴高乐保证，英国对马达加斯加没有任何企图。他大声说道："我是法兰西的朋友！"

戴高乐问起罗斯福的态度。首相劝他说："不要急躁嘛！看看我是怎样既能能屈能伸又能坚持不让的吧！"

"你能这样，"戴高乐说，"因为你有一个巩固的国家、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统一的帝国、一支庞大的军队作基础。至于我！我有什么资本呢？然而，正如你所知，我得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这副担子太重，要我让步，我也让不起啊！"

"我不会抛弃您，"临别时丘吉尔一再重申，"你相信我好了。"

征北非盟军登陆　被蒙蔽夏尔怒起

1940年11月8日早晨6点，正在伦敦自由法国总部（当时已改名为战斗法国）酣睡的戴高乐将军突然被他的参谋长比约特上校叫醒，他被告知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今天早晨最初几个小时中，一支由庞大的海、空军掩护的美英强大的水陆两栖联合部队在事先没有通知战斗法国的情况下，突然在法国的非洲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的7个地点登陆。战斗法国继马达加斯加事件等多次受冷落后又一次面对既成事实。穿着睡衣的夏尔·戴高乐大发雷霆："好啊！我倒希望维希的人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们不能这样偷偷地进军法国。"

但是到中午11点时，戴高乐将军情绪已经平息下来。丘吉尔首相身边贴身人查理·皮克像侦察兵似的来摸情况。当然，将军来到唐宁街肯定要发脾气，但应看看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写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报告：气氛"并不像人们担心

的那样糟糕"，"只要会议一开始就会制造出一种缓和的气氛，便可望立即使将军处于最佳情绪。午餐就有可能进行得令人满意。"

中午时分，戴高乐应首相之邀来到唐宁街10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地迎接了他，但显得有些尴尬。首相百般向将军表示友谊，并且立即解释说，在海上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英军。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英国人只起辅助作用，不得不暂时让美国人负主要责任，由艾森豪威尔担任元帅。遗憾的是，美国人坚持要把自由法国排斥在外。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丘吉尔说，"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抛弃与你签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一直答应支持你。"他情绪更加激动地补充道，"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这时，英国的大臣们也告诉将军说，美国人正在摩洛哥许多地方登陆，同时也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战斗很艰苦，尤其在卡萨布兰卡，法国军队正在那里顽强抵抗。维希法国的吉罗

将军从“蓝色海岸”乘英国潜水艇到了直布罗陀，因为美国人打算请他作北非法军总司令，以便扭转局势。但吉罗能否扭转还是疑问。接着，丘吉尔又对将军说：

“您知道达尔朗正在阿尔及尔吗?”

听了英国人的解释，戴高乐将军满意地回答说：

“两年多以来，你们英国人和我们自由法国人共同在非洲作战，今天美国人又在那里登陆，这件事本身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对法国来说，我看可以在非洲重建一支陆军，也许可以重建一支舰队为解放而战。吉罗将军是一位伟大的军人，我预祝他成功。可惜的是盟国唆使他与我不和，否则我除了祝愿外，还可以给他其它方面的帮助。但是我们迟早会融洽相处的，盟国干涉得越少，我们就能相处得越好。至于谈到当前作战行动进行得很艰巨，我并不感到意外。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有许多军人是去年在叙利亚同我们交过战的，是你们无视我的警告把他们放走的。

“此外，美国人想在北非打维希这张牌反对戴高乐。我一向认为到时候他们一定要为此付

出代价。事实上他们目前正在付这笔代价，当然我们法国人也将付出代价。但是，就我们军人内心深处感情而言，我相信这场战役不会拖很久。但是无论时间多么短，法国人总是要来的。”

之后，戴高乐又向丘吉尔和艾登表示，盟军的矛头没有首先指向塞大港，令人惊异。因为法国与意大利人显然会从那里来突尼斯。美国人不愿冒直接登陆的危险，可以向战斗法国稍一要求，他就可以派柯尼格师从那里登陆。英国大臣们承认这些，只是再三推脱说，这个战役由美国人负责。

“我不明白”，戴高乐说，“我们英国人竟把这样一项与欧洲休戚相关的大事全盘交给别人。”

丘吉尔先生问戴高乐对战斗法国和北非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只有统一起来。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权及其代表人物必须下台，因为整个抵抗运动不允许他们存在下去。如果维希的投降派达尔朗海军上将要在北非为王，那就没有取得协议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目前最重要的是停止战争。其它事情，以后再说。”

听了这些话，首相显得非常高兴。他回答说，吉罗将军此时起作用纯粹是军事方面的。英国政府希望与盟国一起继续战斗的法国人不出现任何分裂，他不会干涉法国人自己的人事问题。但是有一点英国政府的立场是极其坚定的，那就是它承认，戴高乐将军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是组织和团结所有愿意帮助盟国事业的法国人的唯一权威。因此，其国政府要继续努力帮助战斗法国。

首相满腔热情地谈了这些话，对戴高乐将军表现出最诚挚的情感。

戴高乐将军回答首相，他的目的始终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法国人和法国属地重新和盟国一起参加战斗，战斗法国竭诚欢迎所有愿意重返战斗行列的人，名声和地位无足轻重，他仅看重祖国的利益。由于他认为盟国对北非的法属领地没有任何企图，因此他希望北非的法国人最热烈地欢迎前来解放他们的盟军。这就是今晚将军将要在伦敦电台讲话中要表达的要旨。

非常明显，丘吉尔没有料到将军会表现得如此通情达理。他心花怒放，热情地描绘了隆美尔刚遭到的失败，这在阿拉曼战役是不可避免

的。

“美好的日子到来了！”他用法文喊道。然后，将军声音哽咽了，含着眼泪说：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1940年6月当我孤军奋战时那些没有抛弃我的人。你们看，我们将一起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

当会见结束后，原以为照例会有一场冲突的丘吉尔如释重负，对戴高乐将军的感激溢于言表。第二天，他打电报给斯皮尔斯将军说，支援战斗法国并与它合作仍然是英国政府对法国政策的基础。

然而，就在6个星期前，丘吉尔还打算和戴高乐将军决裂呢。

戴高乐将军在离开唐宁街之时也“满心欢喜”，丘吉尔不是向他保证，不管罗斯福总统这一举动多么糟糕，英国将永远支持战斗法国吗？而且，美国旨在把吉罗请进北非以分裂法国阵营的方案似乎注定要失败。吉罗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也许能够促使他和战斗法国合作。因此，法属北非不久将能在洛林十字旗下重新参战。

当天晚上，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广播公司对

法国人讲话，激情万分：

“北非的法国人，让我们通过你们重返战场，从地中海北岸打到彼岸，我们要依靠法国人自己赢得这场战争！”

支持利用达尔朗　罗斯福侈谈“权宜计”

北非事件中出现了新的、出人意料的情况。美国计划中原打算利用吉罗将军这张牌没有奏效。确实，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代表马克·克拉克将军很快就发觉法国人中谁也不准备服从11月9日抵达阿尔及尔的吉罗将军。然而应不惜一切代价使对抗停下来，尤其法国人已重整旗鼓，向突尼斯开来，并与地方当局勾结。对美国人说，情况已经万分严重，但克拉克是一个实干家，正如他自己说：

“我不熟谙政治。”10日晨，他和达尔朗达成一项协议：海军上将以“元帅”的名义在北非执政，作为交换条件，他要命令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面停火。当天到达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协议。总之，吉罗方案失败了，与达尔

朗签订的协议可以挽救无数美国人的生命。

“我仅仅是个军人，”艾森豪威尔说，“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美国国务院对外交是精通的，但完全不了解谈判情况。至于罗斯福总统，对所有这些都不熟悉。事实上，美国方面也不想熟悉。对他们来说，达尔朗、吉罗、戴高乐仅仅是玩牌时发给他们的三张牌，只要对自己有利，打哪一张不都是一样吗？但问题不在于这，而在于这张牌的性质。

达尔朗是什么东西？他和希特勒曾经勾结了一年以上，他曾公开宣称德国人“比英国人慷慨得多”，他把法属印度支那丢弃给日本人，他允许德国人使用叙利亚法国机场，他让突尼斯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供应给养，他在6个月前宣布：

“总有一天英国要付出代价。”

其次，难道他不是继赖伐尔之后最遭法国人憎恨的吗？就在两天前难道不是他命令他的部队向美国人开枪吗？他难道不是一个通敌分子、公开的敌人和卖国贼吗？

然而，华盛顿却不管这些。3天后，达尔朗

就成了“北非的高级专员”，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始终“以贝当元帅的名义说话”。

达尔朗海军上将在美国保护下在北非执政的消息传到伦敦，舆论大哗。人们感到难以置信，沮丧万分。自由法国人瞠目结舌，戴高乐怒火中烧。愤怒的丘吉尔厌恶地说道：“达尔朗应该被枪决。”

但是在“火炬”行动执行前，丘吉尔曾答应罗斯福总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支持他，现在他丘吉尔临了最难堪的局面。11 月 16 日戴高乐将军在唐宁街用午餐，他写道：

“尽管丘吉尔先生心事重重，但是从表面看，情绪相当不错。艾登先生似乎有些局促不安。”

艾登后来回忆这次聚餐时说：

“首相对将军说，他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他也有同感。但是他提出，目前战斗正在进行，首要的问题是把敌人从突尼斯驱逐出去。为达此目的，盟国军事当局在北非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而这是为了取得当地法军的支持。”

至于英国的立场，首相保证说，一如既往支

持戴高乐，并且拿出他刚刚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作证：艾森豪威尔的措施是临时性的，纯粹是权宜计划。

戴高乐将军对首相说，他注意到了英国立场，但他要向首相表明自己的立场："请您想一想，假如法国人由此得出结论，盟国的所谓解放就是达尔朗的话，那就将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也许你们在军事上会打赢，但是你们在道义上必然要输掉，而最后将只有一个胜利者：斯大林。"

丘吉尔先生一再强调，目前的事件丝毫不预示未来。

在将军和丘吉尔共进午餐时，宾客们的心情都很激动和不安，尤其是夫人们。丘吉尔夫人也无法扭转这种气氛。

丘吉尔随后又把戴高乐让到办公室，单独会谈。他对将军说：

"您的地位是杰出的。达尔朗没有前途。吉罗在政治上已被排斥。您就是荣誉。您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您一个人如此。您不要和美国顶撞，这没有用，何况您什么也得不到。要有耐心，他们一定来找您，因为没有其它选择。"

“我不理解你们，”将军说道，“你们从第一天起就参战，甚至可以说，您本人就是这场战争，你们的军队在利比亚是胜利者，而那时还没有一个美国兵同德国人交锋，可你们现在却跟着美国跑。应该由你们在精神上充当这场战争的领导，欧洲的舆论将是你们的后盾。”

丘吉尔有些坐不住了。

将军又补充说，目前人们注意到美国人和维希分子正在进行交易，后者是为了适应形势，已经改换了面孔。而维希代表着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反英的。英国愈容忍美国玩弄把戏，也就愈要冒风险，以致到处树敌，终将群起而攻之。

艾登回忆道，会议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丘吉尔先生请求将军同他保持密切联系。只要将军愿意，可经常来看他，如果乐意，天天来都无妨。”

第二天，首相致函罗斯福总统：

“我必须向您指出，与达尔朗签订协定引起强烈反响，舆论深为不安。我越深入思考问题就越深信这只能是仅因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权

宜之计。如果我们给人们的印象是我们想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合作，这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我们的事业在政治上将遭到严重损害，不应低估这一点。达尔朗臭名昭著。正是他把他的亲信安插在法国海军的各领导岗位，从而使海军对我们充满敌意。昨天他还派遣法国海员冒着生命危险到卡萨布兰卡海面同你们的舰队作战，而今天还是这同一个达尔朗出于权欲却又改换门庭了。千千万万怀有赤诚之心的普通老百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他们不会理解和达尔朗签订一个长期协定或者在北非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府。”

是的，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不理解，罗斯福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白宫刚刚收到大量的抗议书。美国新闻界掀起一股愤怒的风暴，一致强烈声讨艾森豪威尔—达尔朗协议。这是自1940年停战以来，美国赫尔国务卿对维希政府采取姑息政策的结果。《国家报》发行人这样写道，这不是不明智的军事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非洲在“两种政治原则、机会主义和纯粹右的政策”之间制造了历史冲突。沃尔特·李普曼表示强烈抗议。多萝西·汤普森写

道：

“这场战争有一种道义基础，人们不能认为同这样的敌人签订协议是正义的，是不丢脸的。”

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如财政部长摩根索、法官弗兰克·福特向总统提出抗议；不少议员也纷纷表示声明抗议。更重大行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向《先驱论坛报》的大众论坛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原曾允诺给法国人民自由，现却把那些使法国人民处于奴役地位的人扶上台，以便统治法国人民。”

海军部长史汀生费了好大劲才使温德尔·威尔基冷静下来。但报界继续抗议：难道我们同赖伐尔谈判是为了得到巴黎，同吉斯林谈判是为了得到奥斯陆吗？我们作战是为了让纳粹的代理人继续掌权吗？我们给摆脱了德国桎梏的人民究竟带来了什么自由？

英国新闻界的反应更为强烈。最初，罗斯福仅认为他应对参加作战的人生命负责，并想尽快达到目的。但不久就意识到作战的政治危险，便一再进行解释。他宣称这只是权宜之计，一旦不需要达尔朗，便将他甩掉。罗斯福以各种形式

反复讲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或者是罗马尼亚有名的谚语：

“为了过桥，可以同魔鬼同行。”

很明显，罗斯福想继续和北非维希政府合作，只要他在美国的政治形象不因此而付出太大代价。无论如何，一个合乎法律手续的协定于11月22日在克拉克和达尔朗之间签订了。因此权宜之计看来要长久“权宜”下去。

与一个首要通敌分子联合这种反常现象最终出现了。英国舆论更加愤怒了，新闻界强烈抗议，议会哗然，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严厉谴责。特别行动执行处汇报说，协定“引起我们派往占领地区所有地下联络组织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法国，这个消息造成的反响如同掷下了一枚炸弹”。

在英国广播公司政治战术执行委员会，绝大部分在法国处工作的人员都提出辞呈，甚至英国政府，好几位大臣就公开宣布反对罗斯福的北非政策。外交大臣艾登是其中一位。

而丘吉尔则迎着风浪，仍然恪守支持总统的诺言。更何况，如果失去了英国和美国亲密合作，还怎么能赢得战争呢？丘吉尔心甘情愿地做

总统的“热情而大胆的助手”。因而他极力反击对总统北非政策的一切抨击。

丘吉尔对人们批评美国政策作出的反应也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形式，即他越来越疏远戴高乐将军，同时又越来越接近达尔朗将军。15天前丘吉尔还说达尔朗是恶棍、流氓、叛徒、变节者，应该被枪决，而现在却对艾登说：

“达尔朗为我们所做的比戴高乐为我们所做的多得多。”

最惊人的话是他两个星期后在一次国会秘密会议上发表的演说。

这个演说被认为是首相最出色的演说之一，他精彩地叙述了“火炬”计划最初所遇到的障碍，非凡地描绘了贝当元帅形象——一个过了时的、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化身。最后突出颂扬了达尔朗海军上将，这使许多议员气得蹦起来。接着他说了令议员们震惊不已的话：

“我继续和戴高乐将军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我竭尽全力帮助他。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法国失去一切抵抗意志时，他曾站出来反对波尔多政府的人和他们可耻的投降行径。然而，我劝告你们不要把我们的全部希望和信任

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更不要以为我们当前的职责是把法国的命运交给他，这是我们不能做的。如同总统那样，我们要尽量考虑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意志，而不是这种意志的个别表现，哪怕这些行为多么令人肃然起敬也不予以考虑。”

戴高乐始终没有听到这次充满仇恨的抨击，否则的话，他不会原谅首相。当然，他更不能原谅美国人在北非恢复维希的统治。

将军多次发表广播讲话：

“自愿为法兰西荣誉作担保的战斗法国不能和一个通敌分子、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打交道。”

此外，面对罗斯福的敌视和丘吉尔越来越靠不住的支持，将军充分利用了舆论这个有力武器，不断地声讨这个“权宜之计”。12月中旬，甚至连《泰晤士报》也参加进来，它强调指出：

“达尔朗的过去以及现在他的野心引起了严重不安。”

反对“权宜之计”的新闻运动也开始波及到大西洋彼岸，特别是当人们听说戴高乐派和犹太人在北非再次遭到迫害，而且帮助盟军登陆的法国军官也遭迫害时，维希的人、通敌分子、

反英和反美的军官复原职，而大批德国和意大利间谍毫无障碍地越过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界。

报界以及总统的反对派对所有这些都严加指责，使罗斯福开始担心起来。很清楚，他关于“权宜之计”的劝慰声明没有发生效果，尤其因为达尔朗海军上将仍在北非占据显要地位。罗斯福开始考虑摆脱他，并公开表示“准备在戴高乐来美时接见他”。

实际上，达尔朗海军上将在北非地位并不稳固。贝当元帅不承认他，戴高乐派攻击他，吉罗派憎恨他，英国人蔑视他，美国人把他当做“权宜之计”。

此时，戴高乐正为北非事件忧心忡忡。有时甚至感到绝望。由于美国的敌视，他甚至考虑解散战斗法国。

但到了 12 月 24 日，这个问题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这一天达尔朗被暗杀了。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们对 1942 年圣诞前夜暗杀达尔朗将军事件表示了公开的义愤，但私下里却感到如释重负。

罗斯福总统马上对暗杀进行了谴责，但无论如何，他发现这是解决“权宜之计”这个棘手问题的确实可行的办法。

温斯顿·丘吉尔表面上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实际和罗斯福一样对事件的发展很满意，免去了盟国与他继续合作的难堪局面。

罗斯福、丘吉尔一厢情愿　戴高乐、吉罗“姻缘”难成

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死并没有结束新闻界的强烈抗议运动，相反，由于戴高乐将军12月25日以后公开和私下发表的声明在英国报纸登载，美国报纸又立即转载，舆论更加激昂，抨击美国北非政策的不择手段和不讲道义的怒潮如波涛般滚滚而来。

1941年1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比大英帝国的首相丘吉尔晚一天到达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两国首脑准备在这里讨论下一步战略行动等问题。

与丘吉尔最初几次会见中，罗斯福听说英国的报纸、议会和舆论继续在高声怒斥达尔朗

事件造成的后果以及关押北非的戴高乐派。更甚的是，罗斯福随后也接到最近美国报纸摘要，几乎人人都以辛辣的口吻谴责他的北非政策。更糟糕的是，一些过去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专栏作家在这次事件中成了他的最凶狠的中伤者。

罗斯福马上意识到了危险，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顺从地同丘吉尔坐下来讨论一下法国政策。

为了平息舆论，罗斯福打算解决法国统一的问题。当时坚持抗战的戴高乐派——战斗法国自称代表法兰西，它已经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原非洲的法国殖民地上有了自己的基地，有自己的武装，有自己坚韧不拔的领导人戴高乐。他威望很高，得到英国和美国公众的支持，当然也得到法国绝大部分支持抗战的公民拥护。但是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认为他是英国造出来的，所以罗斯福更倾向于从维希方面寻找美国喜欢的法国领袖。他先是看中达尔朗，行不通后又看中了吉罗将军，但又迫于舆论压力，又不能排除戴高乐。

于是，罗斯福想出一个妙计，让两位将军合

作，委任吉罗以最重要职务，让戴高乐处于吉罗领导下，或者至少给戴高乐个二把手。这样既平息了舆论，又达到了美国目的。

此时的罗斯福由于在卡萨布兰卡这段时间可以逃脱华盛顿持续不断的令人厌倦的政治事务，心情特别轻松，就如同一个放了假的小学生，他处理这起微妙的事件时，随便得近乎轻浮。他向丘吉尔提出的方案是：

“我们称吉罗为新郎，我把他从阿尔及尔弄来；而您呢，您把新娘戴高乐从伦敦请来。我们来安排一次强迫婚姻。”

这种不拘礼节的简单行事让人无法生气：只要促使两个法国人见面，说服他们团结起来就行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充当义务介绍人，这样就可以平息他们的所有指责。

英王陛下的首相有些出乎意料。也许是他感到了问题比这要复杂，也许他想起了戴高乐将军一向不喜欢英国人插手法国事务。何况，要作“新娘”的介绍人这种前景并不使他高兴，因为美国人总是过高估计他对将军可能施加的影响。另一方面罗斯福也没有考虑首相是不是愿意邀请将军呢？再说，戴高乐本人是否表示过要

与吉罗会见呢？无论如何，罗斯福是善于说服人的。丘吉尔在第二天清晨，与总统的讨论结束后低声对他的警卫汤普逊监察员说：

“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为他们两人举行婚礼！”

于是，首相向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发去电报，告知将军马上来卡萨布兰卡，并为他和吉罗在绝对保密条件下安排一次会议。

“新郎”吉罗于1月17日到达，首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与他进行了友好会谈。总统对他说，希望他成为军事组织的首脑，“戴高乐作为他的助手，第三个人物担当法属北非的政治领导”。

一个小时后，吉罗也拜访了首相。

首相说：

“戴高乐应该来这里。我给他提供了一切方便让他来。他有时很任性。他不好商量，您的那位同事戴高乐。您认识他吗？”

吉罗回答说：

“在麦茨，他是我的部下。”

丘吉尔接着说：

“这是个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1940年6

月，他是第一位（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没有对英国失望的外国人。我非常希望为了法国的利益和我们大家的利益看到你们和睦相处。他可能离开伦敦，回到阿尔及尔与你共事。这样就完满了。”

吉罗说：

“显然如此。”

在伦敦，戴高乐直到1月16日还始终不知道首相已离开英国。他还期望接到罗斯福的邀请去华盛顿。他曾给吉罗去了2封电报，但吉罗都拒绝了。

此时将军深感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维希政府独立的神话已由于1942年11月的事件烟消云散了，英国外交部越来越支持战斗法国，法国的抵抗运动现在与他有密切关系，北非的舆论也越来越有利于自己。而吉罗将军是以不谙政治而闻名的，唯有戴高乐可以代表共和国和法国抵抗运动的精神。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阿尔及尔组成一个以戴高乐为首的扩大的民族委员会。吉罗担任军队总司令，没有其它道路。将军深信，两个星期后，美国就会认识到这一点。但始终没有接到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将军不

免有些着急。

然而，1月17日艾登拜访了他，并转给他首相请他去北非的电报。当看到吉罗的名字时，将军喊起来：

“啊，他们把这个人也弄来了！”看完电文，他对艾登说：

“我早就希望在达尔朗遭杀后会见他，但是他认为时间选得不好，拒绝了。现在要在两大盟国的保护下与吉罗将军见面，我认为是不适宜。”

艾登极力劝说这次会见的好处，而且“首相费了好大劲安排了这次会见”。接着，艾登又指出这也是总统的意见。

“这纯属是另一个问题，”戴高乐回答说，“如果总统想见我，我可以去美国拜访他。怎么可能邀请我去一块法国领土上去会见随便一个什么人呢？……如果赢得胜利只是使维希方面的人获利，那么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将得到多少好处。吉罗将军不代表什么，他只有归顺战斗法国。让我在两国首脑面前与吉罗共商大计，这是强人所难。”

艾登很为难，最后将军答应考虑一下。

实际上，戴高乐很气愤。他认为艾登明明告诉他说，罗斯福也在那儿，盟国正在那儿制订共同计划。可是首相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邀请只以首相一个人名义？也许除了与吉罗会见的目的外另有其它目的。如果让他必须去是为了作英国人的"小马"，而美国人也让自己的"小马"参与进来，这将是一出不相宜的、甚至是危险的喜剧。

于是，戴高乐一口回绝了。

丘吉尔感到被羞辱了。本来将军的拒绝就够令人难堪的了，可是偏偏是当总统的面收到电报的。

总统似乎把这一切看作是旨在安排一次"强迫婚姻"的快乐竞赛，这注定解决不了问题。罗斯福拿将军的拒绝开玩笑，看到丘吉尔窘态很开心。他打了一个电报给艾登：

"我已请来新郎，新娘在哪里呀？"

他说，丘吉尔是个"坏父亲"，不能让他那个"捣蛋儿子"尊重他。这个形象使总统乐不可支。

相反，丘吉尔可全然没有感到情况有什么幽默之处，他气急败坏。

罗斯福说："您应该把您'捣蛋儿子'请来。"

丘吉尔说："戴高乐摆出傲慢的姿态，我无法让他从伦敦挪一步。贞德的感情，您懂吗？"

罗斯福说："谁提供给戴高乐给养？"

丘吉尔说："是我们啊。"

罗斯福说："为什么不切断他的给养？也许他就会来了……"

丘吉尔回到自己的别墅思考去了，而罗斯福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就不怕重复他的玩笑，他给他的国务卿赫尔发去一封充满浪漫情调的电报：

"我们已经请来了新郎吉罗，他完全准备好要订立婚约，当然条文由我们向他口述。然而，我们的朋友却未能请来新娘，这位任性的'戴高乐女士'。'她'不满意我们的方案，不愿见到我们中间任何人，似乎一点都不准备与吉罗同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尽力而为。我以为能够从中得到某些较好的东西。吉罗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打仗，却不太关心政治问题的人。"

1月19日，首相又给戴高乐发出第二封电报。首相称他受权说明，要戴高乐赴卡萨布兰卡不仅是他本人的邀请，也是美国总统的邀请。电

文显然带有一种威胁口吻。

戴高乐不愿在这样的恫吓面前屈服，于是他决定把这件事提交他的民族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经过故意拖长时间辩论，决定仅仅为了与罗斯福会晤，也应该去。因此，戴高乐告诉丘吉尔说，大战的形势和法国的“暂时的”处境不允许他拒绝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王陛下政府会晤。

戴高乐一行于1943年1月22日抵达卡萨布兰卡。没有仪仗队，到处是美国兵。一辆美国汽车把他们送进周围都是铁丝网包围的安法别墅，服务人员也是美国兵。戴高乐感到受到了侮辱，这儿仿佛是受到监禁，而这却是在法国领土上。

因此，当戴高乐赴吉罗为他举行的午宴时不无讽刺地说：

“您好，我的将军，我看美国人待你不错啊。”

吉罗说：

“我丝毫不反对维希政府，我所要的事就是打德国人。”

听到这番话，戴高乐的随员个个怒火中烧，

全靠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的克制才按捺下来。

戴高乐与往常他和盟国发生纠葛时的做法一样，决定摆出他那精心做出的一脸颜色。那天下午，哈洛德·麦克米伦看到他又憋着这股火。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听说哈洛德·麦克米伦和墨菲正努力制定一项使戴高乐和吉罗和解的方案，便竭力使麦克米伦懂得，只有“法国人之间”的协议才算有效。不过，他还是答应去见首相。

在与丘吉尔的重大冲突中，戴高乐此时已成老手，而且总是获胜的老手。这一次，他一进门就先发制人。他大声说，如果他早知道在法国的土地上会被美国人的刺刀团团围住，他决不会到这里来。

当将军的情绪安静下来后，首相向他解释说，他已与总统在解决法兰西帝国问题的方案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吉罗和戴高乐将共同出任一个领导委员会主席，他们俩和该委员的其他成员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但吉罗将担任最高军事指挥官，主要原因是美国只希望和吉罗打交道。

戴高乐彬彬有礼地评论道，这些安排对于可敬的美国军士长一级的人来说，似乎倒是称心如意的，但是丘吉尔很难指望他会认真考虑的。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非常崇敬，然而他不承认他们有任何权力安排法兰西帝国的人事问题。盟国在没有同他商议，实际上是违反他意志的情况下安排了北非的行政机构，现在他们发现不灵了，因此又想使战斗法国淹死在里面。战斗法国是决不允许这样的，假如它必须消亡，它情愿光荣地消亡。

戴高乐是从道义上看待这个问题，而丘吉尔却从政治上着眼。

“看看我自己的政府吧，”首相说，“当我最初组织它时，尽管我痛恨慕尼黑精神，但我却把所有慕尼黑分子都包括进来。是啊，他们都干得不错嘛，甚至现在人们都无法把他们从众人中辨认出来了。”

“我不是一个想要组阁并想在议会中弄到多数票的政客。”戴高乐反驳道。

最后，首相请他好好考虑一下那个方案。

丘吉尔目送将军离去，看着戴高乐昂首阔步，高傲地穿过花园。对随从微笑着说：

“他的国家放弃了战斗，而他仅仅是一个逃亡者，如果我们撤消对他的援助了，这个人就会完蛋。啊，你们瞧他！好好瞧他！简直像斯大林，似乎身后有200个师作后盾。我没有向他让步。我明确告诉他，如果他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我们就果断地叫他倒台。”

当天晚上戴高乐首次与罗斯福总统会面，总统再次施加压力以迫使将军同意该方案。实际上，将军并没有被说服。

第二天早晨，戴高乐和吉罗第二次会面。吉罗倾向英美方案，多次重复他不关心政治。并引诱说，将提升戴高乐为陆军上将，以高于委员会中其它成员。戴高乐说，吉罗忠于贝当元帅，这很危险，要求他归顺战斗法国。而吉罗则要求戴高乐归顺他。

戴高乐揭露吉罗说，他想在罗斯福支持下独揽大权。戴高乐用无情的逻辑步步紧逼，吉罗拒绝让步。戴高乐发现他“不但没被说服，反而更顽固了”，戴高乐希望他以后回心转意。两人最后总算同意在北非建立一个联络组。

显然，当时丘吉尔和罗斯福撮合的这桩婚姻——两派联合的努力失败了。罗斯福为了向

国人交待，又拟出一份公报，想要戴高乐和吉罗签字，从而给美国舆论造成这样印象：他成功地使两位将军和解，以堵住对手的嘴。然而戴高乐认为这是干涉法国内政，拒绝签字。

丘吉尔更愿意两位将军和解，这更有利于盟国利益。因此当将军向首相告别时，首相非常愤怒，两人唇枪舌剑。首相谴责戴高乐阻挠和解，如果不在公报上签字，他就在下议院和电台揭露他，以使将军名誉扫地。戴高乐指责首相，为了满足美国要求，竟赞同法国不能接受的事，这会使英国以至欧洲大为不安。

接着，将军第二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表现得很亲切，但脸上明显有愁容。他知道将军不能接受公报内容，他感到很遗憾。他说，公众需要戏剧性的东西。如果吉罗和戴高乐在有总统和首相参加的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发表某种共同声明，即使达成的协议仅仅是理论性的，这样的消息也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我可以办到，”戴高乐回答说，“会有一个公报的，尽管它不可能是你所需要的。”

然后，戴高乐把自己的助手介绍给总统，总统也介绍了他的部下。

丘吉尔、吉罗这时也走进来。

丘吉尔利用这次会晤又向戴高乐发起又一次新的进攻。他气冲冲地晃动着他的手指，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用他那无法模仿的法语大声吼道：

“我的将军，请不要妨碍战争！”

可是，罗斯福装做没有注意到丘吉尔在大发雷霆，笑容可掬地询问戴高乐是否至少愿意同吉罗在一起并在他和首相之间照像。

他的要求并不高，戴高乐彬彬有礼地表示同意说：

“当然可以，因为我对那位伟大的战士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总统惊喜地问道：

“再请你当着我们的面在照像机前和吉罗将军握握手，行吗？”

戴高乐用英语说：

“为了你，我将这样做。”

这时，外面一批又一批记者和摄影师走进来。两位将军不自然地摆好姿势，摄下了象征和解的照片。

罗斯福、丘吉尔无可奈何 戴高乐抛弃吉罗

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在到达阿尔及尔这个普遍充满敌意的地方时，他实际是单枪匹马。不错，他有许多支持者。但是，吉罗将军是当权的最高统治者，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他，当地几乎所有的法国官员也都承认他。然而，过了两个月以后，戴高乐却成了阿尔及尔和法国人的主人。这或许是他最惊人的一次胜利。尽管各种情况对他不利，但以下几种因素惊人地结合在一起，使他获得了成功：一是坚强的个性，这使他争取到了一些最初曾反对过他的人；一是戏剧感，其中最起作用的是戏剧性的勃然大怒和善于选择时机的才能；一是雄辩的口才；再一个是戴派"秘密军队组织"的有组织的支持；最后一个但也是重要的因素是，即吉罗本人的无能。

英美方面决心要在突尼斯战役中把戴高乐排斥在北非之外，因为他们不愿看到在突尼斯战役胜利前阿尔及尔出现公开示威。

5月中旬的时候，这次战役就取得了辉煌胜利。冯·阿尼姆将军本人随同他的15万德军和大约10万意军一起被俘，战利品很多，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法国人内部的不和。吉罗为数众多的部队虽装备低劣，但打得很好；德拉米纳将军指挥下的人数较少的戴高乐部队，也打得出色。但在5月20日盟军于突尼斯举行的阅兵式上，德拉米纳指挥下的400名士兵选择了与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一起行进的作法，以避免同安德逊将军第一集团军一起行进的吉罗士兵的接触。

5月30日星期天，戴高乐飞临阿尔及尔。事先，盟国方面担心引起混乱，因此禁止当地报纸报道他到达的消息，伦敦和纽约也保持同样的沉默。

然而戴高乐看来很满意，乘坐的是法国战斗机，随行的是他提名参加拟议中的法兰西联合委员会的人选。飞机是在布法里克军用机场着陆的，机场正高奏着《马赛曲》，吉罗将军亲自来迎接。官方轿车是法国造的，这使戴高乐非常高兴。

欢迎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和吉罗共乘一辆轿车。双方交换了参加委员会人选问题，戴高乐对吉罗的人选很不满。吉罗每报一个名字，戴高乐都准备了一句尖酸刻薄的评语：

“莫内，受英国雇佣的小金融家。”“特隆，小小的摩洛哥的一名小官。”

他突然毫不客气地说，无论如何，维希分子都得下台。这段行程没有结果。

接着，在夏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正式午宴。戴高乐和吉罗相对而坐，两旁是他们的顾问。出于对危机的习惯爱好，戴高乐注意到对立双方之间情况悬殊。

“一方是无所不有，另一方是一无所有。这里有军队、警察、行政机构、经费、报纸、电台、电讯设备……盟国力量。……至于我，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军队、宪兵，没有官员、银行存款，也没有使人们听到我的声音的手段。”然而他声称，他与之会见的好些人态度清楚表明，他们对于结局毫不怀疑。

4 点钟，戴高乐到邮政广场洛林死难者纪念碑敬献十字架，忽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神秘出现，向他欢呼。将军极为欣慰，唱起了《马赛

曲》，大家也满怀激情地跟着唱起来。

戴高乐及其随员下榻在格里森别墅，那里的气氛仿佛就像一个行宫。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莫内前来拜访，并与戴高乐进行了3个小时谈话。

第二天，麦克米伦获悉，戴高乐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欧洲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表示关注。戴高乐说，如果这种威胁继续增长，战争结束时法国将不得不倒向德国和俄国。

5月31日，对立两派的内圈人物在国立弗罗芒坦中学举行了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戴高乐谴责了当地的维希分子——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和法属西非总督布瓦松将军。会议在戴高乐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骤然离去后结束了。

那天下午，与吉罗单独会谈时，戴高乐重申了他最后通牒：必须将这三人解职，否则他不能与委员会一起工作。

6月1日，戴高乐出于他在选择时机和自我宣传方面惯用的敏感，在格里森别墅召见法国和盟国记者，提供了几条他们渴望得到的重要

消息。他说，他到北非来，目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构，以领导民族力量进行战争，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主权，但要把某些代表其它方面的人排除在外。

那天晚上，戴高乐赢得了他在阿尔及尔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胜利。我们称之为“佩卢东事件”。佩卢东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一度是维希政府的一个部长，激烈反对过赖伐尔，来此之前一直在阿根廷避难。他被带到阿尔及尔，主要是艾森豪威尔下达的命令，理由是需要一位干练的殖民地官员。现在，戴高乐坚持他应当与其他维希政府高级官员一同被解职所引起的反响传到他耳里了，他忧心忡忡，颇值得同情。

佩卢东决定给委员会两主席各写一封信，表示愿意放弃他的职位，以促成取得胜利和恢复法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体法国人的联合。戴高乐在一小时内就佩卢东信件作了答复。不出所料，戴高乐接受了辞呈，并告诉他可以认为自己已被动员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军队（当然是纯粹戴派军队）里服役。

佩卢东在给戴高乐信送去时，也草拟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给吉罗的信，由于天渐晚，所

以决定第二天早晨送。

戴高乐答复了佩卢东的辞呈时，吉罗还没有收到佩卢东给他的信。戴高乐充分地利用了他所走的好运。复信之后，他立即将这位总督的来信和他的回信的副本送交吉罗，并将副本同时送往报界。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戴高乐决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能白白浪费掉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所具有的宣传价值。

吉罗获悉戴高乐的行动后，立即在凌晨3时左右写了两封信——一封是怒气冲冲的正式信件，对戴高乐处理佩卢东辞呈的做法感到惊讶；一封是毫不客气的非正式信件，指责戴高乐有纳粹倾向。

这时，种种离奇谣言开始流传：一场“军事暴动”即将发生。但谁也弄不清楚哪一派在策划暴动。是戴派还是吉罗派？就吉罗而言，他确信戴派正在暴动。他派来米塞利海军上将去维持阿尔及尔城内外秩序，派遣坦克守卫通向这座城市和夏宫的各条道路，并调进增援的殖民军。有一种谣传说，罗斯福已致电丘吉尔说，戴高乐及其同伙应当立即被带上飞机送走，无论到哪里都行。

甚至在戴派内部，也并非一致赞同将军的举动。卡特鲁来到格里森别墅，对戴高乐的“荒唐”做法表示愤慨，然后砰地一声关上门，愤然离去。他回到寓所，写了一封辞呈，但没有送出它。

这时候，别墅在10个阿尔及利亚骑兵象征性保护下，出现了一片宁静。关于吉罗惊惶之余采取的安全措施的消息，确实有助于使别墅里的人保持冷静。

然而，戴高乐却在6月3日发电报给他在伦敦的办事处，指责吉罗的行为，特别是指责他发出了拘禁在阿尔及尔休假的戴派军人的命令。他说，这完全是一出“悲喜剧”，不过到头来可能变得使人恶心。

卡特鲁决定不辞职。1日上午，他在莫内陪同下拜会了吉罗，决定将事情平息下来。他们两人说服吉罗不要采取过火的举动。

墨菲和麦克米伦也来好言相劝。那天下午，麦克米伦应邀单独会见戴高乐，向将军指出，接受辞呈是不妥当的。戴高乐说，在接到佩卢东辞呈时，他认为那位总督承认了他的权威。此外，整个事件表明，正如他一向认为的那样，佩卢东

是个无赖。

显然，戴高乐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但佩卢东事件现在该收场了。不论多大程度上是靠了运气，不论是戴派采用了什么手法，也不论戴高乐本人采取“抢先一步”的决定起了什么作用，整个事件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吉罗却弄得像个大傻瓜：全世界当时都知道，维希的阿尔及利亚总督首先向戴高乐提出辞呈，表示了对他的顺从。

虽然吉罗将军刚刚在盛怒之下谴责了戴高乐企图在法国建立纳粹统治，但现在他已在主要障碍问题上——戴高乐要求撤换维希分子——让步了。

6 月 3 日上午 10 时，7 人委员会同意卡特鲁取代佩卢东的的总督职位，同时继续在委员会任职。诺盖将军也被解除在摩洛哥的职位；布瓦松一俟找到合适人选就把他从达喀尔撤回；贝尔热雷将军退休。

障碍一扫除，建立民族委员会协议便迅速达成。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法国中央政权，领导法国各地武装力量，并行使法国主权。委员会的权力一直行使到移

交给将来的共和国临时政府为止。

戴高乐如愿以偿，热情地拥护了吉罗，用的是法国式的拥抱。

尽管戴高乐认为委员会双重领导是荒谬的，但他有信心可以使它屈从他的意志。眼前一个不可忽视的好处是，迄今为止不在他控制之下的为数众多的军队和官员，现在至少要对他负部分责任。

正如戴高乐所料，盟国不会甘心。委员会换了维希分子，掌握了主权，从而嘲弄了罗斯福明确表示过的愿望。因此戴高乐发现委员会的第一篇宣言被军事检查扣住不发时，并不感到诧异。但是，他设法通过广播讲话公布了这一消息，因为广播设施已在很大程度为组织得很好的戴派人所控制。

但是英国人把运送由戴高乐所提名的、将从伦敦前来阿尔及尔的委员飞机启程推迟10天，以示对他专横的不满。

现在丘吉尔出面了。他一直在同英军和美军司令部就下列重大问题秘密商谈：是否进攻西西里岛，何时进攻该岛？他邀请了戴高乐、吉罗等人共进晚餐。看在首相面上，戴高乐勉强参

加了。

当戴高乐问首相来北非来干什么时，丘吉尔声明说，他无意干涉法国事务；但是，军事形势迫使英王陛下政府考虑该地区的内部发展情况。

“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他说，“如果……比方说，你一口吞掉了吉罗。”

戴高乐否认他有这种企图，他希望吉罗自觉站在公众利益方面来。不过这是一种委婉说法，实际上戴高乐认为作为一个军人吉罗也有局限性，决不能容忍保留吉罗主席和国家文件签署人之一的职位所给予他的对政治决定的否决权。

5日，解放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以便7位创始人选定他们的同事，并给每个人分配工作。

那天任命的官员并非都是戴派，但戴高乐确信，尽管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是戴派，但很快就是。然而，当重要的决议需要通过时，政府中立即出现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3天以后，即8日那天，当委员会再次开会研究有关军队统帅问题时，便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新委员还未

到任，要等到被阻留在伦敦的戴派委员到达后才能就职。因此，只有原来的7人委员参加了会议，戴派多了一票。否决了给予吉罗将军充分军权的建议。但吉罗仍是主席，在军事问题上不受委员会的约束。

不久前曾在戴高乐面前摔门而去的卡特鲁，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吉罗任总司令，戴高乐负责国防事务。

戴高乐本人则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建议。总司令应被派去担任与盟军司令们联络的任务。他应尽快亲临前线指挥，因此应解除他的政府职务。同时，军事事务应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

但是，吉罗在丘吉尔的朋友乔治将军支持下，对卡特鲁和戴高乐的建议都拒绝考虑。

换演新戏的时候到了，于是戴高乐在10日上午演出了这出戏。他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说，既然委员会连显然该作出的决议都无法作出，他不能再与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任何联系了。他在格里森别墅闭门不出，并向外界透露，他打算去布拉柴维尔。

正如戴高乐所预见的那样，这一来便出来

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混乱时期。莫内肩负调解使命，八方奔走。墨菲和艾森豪威尔多次接到罗斯福总统愤怒的电报，麦克米伦也不断受到丘吉尔同样的责难。看来总统对于撤销布瓦松在达喀尔的职务的决定特别恼火，因为美国人认为他很有用处。总统在10日致电艾森豪威尔，威胁说要派遣一支美国特遣队来反对戴高乐控制西非的任何企图。

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要阻止戴高乐“亲自或通过党羽”控制法国军队。

至于丘吉尔，则借助于《圣经》，要麦克米伦去查看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段阴晦的引语可以解释为什么丘吉尔在那个阶段无意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

麦克米伦和他的班子连忙辛苦地在圣书里寻找答案，终于在《启示录》第二章2～4节中找到了，其最后一句是：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最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个回答，以其含蓄责备反映出了麦克米伦对戴高乐不断增长的钦佩。他使丘吉尔“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正如戴高乐将军估计的那样，吉罗发现，在戴高乐缺席的情况下，他无法利用委员会。然而，他还是召集了解放委员会，日期大概是15日；当他要求与会者研究戴高乐的辞职问题时，戴高乐派便喧闹起来，说法国人团结仍然是必要的，莫内出于他的中间派立场，说戴高乐的辞职并未最后肯定。

戴派的“部长们”现在已经从伦敦来了。戴高乐断定“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在那天下午召集了委员会全体会议。

但现在该轮到吉罗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宣称，委员会没有资格决定究竟由谁行使指挥权问题。

这时，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决定采取行动，他邀请吉罗和戴高乐在6月19日同他一起商谈“有关法国武装力量的指挥和组织问题”。

戴高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会错过登台表演机会的人，他故意姗姗来迟，并立即在其他将军还

未来得及集中思想之前便开始发言。当时在场的还有第四个将军——美国的比德尔·史密斯。但他是沉默的目击者。

墨菲和麦克米伦呆在另一间屋子里，需要时便可出场。

这是艾森豪威尔第一次领教戴高乐在高度戏剧性的时刻所发挥出来的全部威力。麦克米伦写道，看来他对"戴高乐的坚强性格得到了深刻的印象"。面对戴高乐关于法国主权的宏论，他确实无言以对。

会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戴高乐也对艾森豪威尔的军人的直率性格和慷慨性格得到了深刻印象。但这位总司令有军令在身；而且戴高乐发现艾森豪威尔虽然对他抱有同情心，但也不能置军事的和政治的纪律于不顾。

在戴高乐的请求下，盟军总部将他的各项要求写成书面文件。总的说来就是坚持由吉罗担任法军总司令，而不应受压倒一切的政治控制。不过，书面要求的末尾，对法国主权再次作出了正式保证。

戴高乐不为所动，因为这些保证与上述的

实际要求相矛盾。戴高乐要盟国提出书面要求，是为了他能让委员会正式否决他们。为此目的，他在 21 日召开一次委员会。

在这方面，委员会没有使戴高乐失望。委员会果然要求吉罗决定要么承认法国政府的权威，要么离开政府，不担任总司令职务。当吉罗反对与一个有 14 人的委员会讨论秘密军事问题时，戴高乐乘机力促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令人吃惊不已的是，吉罗竟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双方一致同意暂时应当有两个最高军事司令部：吉罗的司令部负责北非；戴高乐的司令部负责法兰西帝国其余地区和法国抗战运动。

在第一阶段，吉罗的虚荣心使他在所有权力斗争中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即在错误的时间为了错误的目的而离开了阿尔及尔。他宣布他已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到华盛顿去商讨有关向法国军队运送武器的问题；他要求委员会推迟有关组织形式和指挥官的职权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讨论。

吉罗在接受总统邀请之前没有考虑应与他的同僚们商量一下，戴高乐对这一点感到很恼

火，但是他还是立即同意了，因为这是把一个委员会改组成按他意愿行事的有效率的政府的大好机会。

7月2日，吉罗动身去美国。在那里，他受到了组织得很好的官方捧场和公众的喝彩。大约3个星期后，他取道渥太华和伦敦返回。

在此期间，戴高乐对突尼斯和摩洛哥进行了正式访问，就近为他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他受到盛大的欢迎和普遍的赞扬，并对当地形势进行了精细的观察。但是吉罗不在期间，他真正关心的是搞好行政机构的组织工作。这项工作以前一直由于两主席之间的权力竞争而无法进行。在6月10日的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秘书处，为首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记者和历史学家路易·若克斯。

7月，当吉罗还未回来期间，戴高乐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由卡森教授领导，负责起草法律和其它官方文件；诉讼委员会由及埃尔·蒂亚埃领导，负责处理此前因施行维希法律所引起的冤案。此外，比约特上校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秘书，在戴高乐直接领导下工作。

吉罗出访美国期间，丘吉尔将一份秘密的备忘录分送给英国各驻外机构，并发给全国性报纸的编辑，其中罗列了他的政府对戴高乐及其运动的不满。这份文件泄露给了美国报刊，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这个事件使戴高乐将军感到不快，它有可能有助于吉罗出访的宣传价值，但正如吉罗回来时所发现的那样，它对阿尔及尔政治权力的现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直到7月31日，才出现了使戴高乐感到满意的双方妥协，吉罗和戴高乐之间的权力分配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从此以后，戴高乐就单独主持委员会并领导其工作。但吉罗仍保留副署文件和法令的权力。这至少在理论上给了他否决权，不过戴高乐并不担心，因为吉罗再不可能在政治范围内有任何倡议了。所有的法国部队现在都合并起来了，由担任总司令的吉罗统率，而戴高乐则将主持一个新的国防委员会，来代替为时甚短的军事委员会了。

除名称以外，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成为以戴高乐为总理的法国临时政府。这基本上就是他到阿尔及尔来要做的事。他只用了8

个星期就在障碍重重条件下如愿以偿了。

然而，戴高乐将军并没有彻底击败吉罗，对此他并不甘心。

1943年，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出一项公告，号召成立抗战运动咨询委员会，这相当于这个临时政府下属的临时议会。

10月3日，民族解放委员会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式任命戴高乐为该委员会唯一主席，让吉罗去指挥军队。

戴高乐尚待进行的工作是召开第一次咨询议会和改组解放委员会——这两项工作的目的相同：使在法国抗战运动中出现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倾向尽可能忠实地在阿尔及尔反映出来；同时表现出各方的协调一致。戴高乐现在认为国内国外的抗战运动各派之间已经取得了协调一致。

两件大事都发生在11月。3日召开了咨询议会。9月17日公布的大会组成情况和有关组织提名、选派与会代表的办法虽然是矫揉造作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并不算做得过分。50名代表是抗战运动各组织选派的，20名代表是各政党选派的，后者尽可能包括曾拒绝对贝当投

信任票的前议员。代表中还有12名共产党员，他们曾于1939年被捕，后来被押到阿尔及尔，被吉罗将军释放了。此外，还有20名帝国海外领地“抗战运动”的代表，10名阿尔及利亚本地律师。

新的临时政府在9日宣布正式成立。新任职的委员中有7人是职业政治家。吉罗当然不在委员之列。未当上委员的还有吉罗派其他人士：乔治将军（他选择退休，戴高乐将军说是“体面地退休”）、阿巴迪博士（他希望回去搞科学研究工作）、勒让蒂约姆将军（戴高乐希望把送他到伦敦，他果然到伦敦去了）以及顾夫·德姆维尔。

民族解放委员会于11月改组以后，吉罗问题仍然存在——但只不过是一个残留的问题而已。13日，民族解放委员会批准了由吉罗担任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任命。吉罗将军像过去一样固执，对他目前的境遇相当的不满意。

吉罗在一场他本不该冒险卷入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以后，现在决心紧紧抓住陆军总参谋部的庞大情报机构。这个机构一直替维希政权服务，直到奉吉罗之命于1942年11月才迁到阿

尔及尔。

这个机构的忠诚是无容置疑的。过去它的领导人罗兰上校和里韦上校一有机会就竭力挫败德国人使用该机构的企图。但是它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继续只对总司令负责，目前说已不符合现实情况了，因为吉罗已不再是两委员会主席之一了。

1943 年 11 月 27 日，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命令，规定总参谋部这个情报机构必须立即并入戴高乐的秘密机构。这次合并，并不是为了裁减冗员，而是为了把参谋部的情报人员吸收扩大到新机构来，该机构后来名叫特别任务总局。年仅 31 岁的雅克·苏斯戴尔被任命为局长，并直接对戴高乐负责。

但是吉罗对戴高乐要他放弃他那个情报机构一事充耳不闻。过了好几个月，这两个机构还是同时并存，各行其事。吉罗的情报机构往法国本土派遣自己的人员，对苏斯戴尔的安排部署置若罔闻。这种局面很快就混不下去了。

但是到 1944 年 4 月，在一次不幸事件之后，戴高乐终于向吉罗发出了最后通牒。

但是吉罗自以为是，固执到底，他仍然闪烁

其辞，不置可否。因此，民族解放委员会下令撤销他总司令职务，改任他为陆军总监。为了缓和给他的打击，戴高乐给他写了两封信：一封是正式公函，表扬了他的功绩；另一封是私人信件，请他在祖国危难之秋做出克制的榜样，并接受他的新职。

但是，吉罗决定退休。他在拒绝接受颁发给他的军功勋章时说："我或者当总司令，或者不任任何职务。"

他离职引退，似乎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不安，甚至可以说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走了。

对戴高乐说，前面还有一场更大的战斗——争夺法兰西的战斗。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为他今后在法国本土上夺权的斗争铺平了道路。这位法国领袖已经除掉了一个竞争者，此人不是他的对手：要不是美国人在英国人支持下把他扶上台，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戴高乐的竞争者，也不能维持在台上8周之久。

但是，真正的斗争，最后的斗争，只能待到解放的时候在法国进行。

第三章　凯旋门不凯旋

丘、罗、戴各怀心腹事　“小伙计”力单遭冷落

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计划提上日程来了。

在计划的制定上，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在头脑中都在打着一套自己的小算盘。

丘吉尔有为自己考虑的一面。他认为在欧洲与敌军作战，应该先从德国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入手，就是被丘吉尔称为“轴心国的软下腹”的意大利半岛，即由意大利到希腊和南斯拉夫，然后直捣多瑙河盆地。

“诚然，这个战略是与伦敦的政策相适应的，伦敦的政策是企图在地中海建立英国的霸

权，同时它害怕看到俄国人在地中海取代了德国人的势力。”戴高乐看穿了英国人的伎俩。

美国方面对于在意大利首先采取进攻的办法是赞同的。但对于在意大利开辟战场以后的计划则有美国的看法。“美国人方面认为以后可以通过捷径，换句话说，可以通过法国来开辟战场。”

美国第二步计划是：从诺曼底登陆，进军巴黎；从普罗旺斯登陆，进军罗纳河谷。然后，两股军队配合起来。同时，在瑞士和北海相互接合的地方发动进攻，直捣莱茵河。美国认为“意大利战役只不过是一种军事牵制而已，不应削弱主攻力量”。

戴高乐认为丘吉尔是错误的。丘吉尔把巴尔干半岛称为“软下腹”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攻占意大利并非一举而下，可能要费些周折；巴尔干地区道路崎岖，适宜于平原作战的机械化部队在巴尔干会进展缓慢，不会快速取得胜利。戴高乐极力主张在法国登陆，“必须从法国领土找出解决办法。在法国，也就是说，在有利于速战的土地上，既接近海空军基地，又有抵抗运动在敌后活动，给予盟军以有力的帮助”。

对戴高乐来说，热爱祖国的法国人民恐怕自然也增强了他的战略信念。法国应该以最快的办法得到统一解决，如按丘吉尔的从巴尔干进军的策略则会拖缓一些法国解放的时间。戴高乐后来在回忆录中大发感慨：

“在我们这方面，我认为应当根据法国本身的利益来排除英国人的计划。难道当侵略者正在奴役法国的时候，可以听任西方把我们的士兵派到其他遥远的地方去吗？难道可以允许我们国家最后解放和间接地解放，而不是自己的军队与盟军并肩作战，首先踏上自己的国土争取胜利吗？难道可以让自己的唯一军队打到布拉格去，而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还要长时期沦陷在敌人手里吗？如果疏忽了这一点，不让我们在海外经过训练的军队在本土作战和取得胜利，那么，不是使我们在历尽动乱之后坐失加强法兰西联邦的联系的机会吗？最后，在我们国内，德国人撤退和维希垮台以后的混乱中，如果我们的军队还在奥地利或在匈牙利，不能与国内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试问将要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

“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战略的抉择关系到

它们的政策，但是这个抉择将牵涉整个法兰西的命运。”

尽管戴高乐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见解，可惜，他却没有发言的机会。罗斯福和丘吉尔始终都把他看做是一个“小伙计”，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就是“盟国费尽心机不让我们参与它们的讨论”。

事实上，在1943年9月到1944年6月这一段时期内，盟国进行了一系列大的活动，但可惜的是戴高乐在多数情况下都被排斥在外。

1943年9月27日，美英方面和意大利拟订停战协议，虽然事前美英征求过法国的意见，但实际协议的起草过程法国一直被排斥在外。当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马西格利接到文件时，这个文件当时早已递交给了意大利方面，以便当天即可签字。

戴高乐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随后不久，苏联方面提议在莫斯科召开盟国外长会议，英、美两国外长接到了邀请，而戴高乐则未收片字。

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在阿尔及尔访问了戴高乐，他向戴高乐

透露了这一条消息。戴高乐自然非常恼火，他对赫尔说：

“要把德国人从意大利赶走，必须有法国方面的协助和法国的基地。法国人乐意提供帮助，但在意大利前途问题上得有平等的发言权。”

赫尔把这一口信带到了莫斯科。盟国经过讨论，决定邀请法兰西解放委员会参加会议。于是马西格利参加了讨论。尽管戴高乐“小有所得”，但心中则始终蒙着一丝不快的阴影。

11月下旬，英国、美国、中国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会议，商讨统一行动，没有邀请戴高乐。

12月2日至7日，英国、美国、苏联“三巨头”会议，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来讨论欧洲的局势，丝毫没有想到发给戴高乐一张请帖。

戴高乐有苦难诉，他对欧洲的解放的宏伟设想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早在1943年9月，戴高乐就分别发给丘吉尔和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一套主张：

“拟订了法国行政机关与盟国军队协同配

合的计划。地方当局将满足盟国在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满足艾森豪威尔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所提出的要求。”

为了配合行动，戴高乐还招募了一个法国行政联络队，在9月派往伦敦听任调遣。

1944年3月，戴高乐又任命了他的两个法国将军分别担任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的法国助手，与此同时还任命了解放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

英国也在力图使盟军接受他们的计划，他们设立了在华盛顿工作的专门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联络。

罗斯福没有理会戴高乐的备忘录和宏伟计划，他和斯大林、丘吉尔仔细商讨之后，使丘吉尔做了一定的让步，这样，美国的观点占了上风。

于是，关于在意大利作战的“霸王”计划出台，在法国登陆的“铁砧”计划开始制定，但都没有戴高乐参加讨论的份儿。

戴高乐愤愤不平，大发牢骚。

“鉴于这一战的得失，以及在战争这一阶段

我们已投入战场的力量，我们当然应该参与盟国的主要决定，法国政府领袖应当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共同会商决定关于指挥战争的计划；法军司令部，应当是起草军事行动计划的联合参谋部的成员之一。……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不同意以真正盟国的资格来对待我们。他们采取任何措施都没有以政府之间平等相待的办法来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于政治或便利的缘故，他们设法利用法国军队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在曾经帮助装备法国军队的借口之下，似乎法国军队已经隶属于他们了。

“这种哲学不是我们的哲学。我认为法国给予盟国各种形式的协助，其价值远胜于美英所供应法国的物资。既然把法兰西排斥于讨论之外，那么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在必要的时候照自己的利益去行动，而不听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

戴高乐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在“霸王”计划中，盟军要求法国军队参加协同作战。这时的戴高乐显然羽毛丰满了不少：

“我们建立了拥有 23 万人的野战军，15 万

士兵的驻防军，5万名海军和32万吨位的舰队，120万吨的货船和商船，有一支拥有500架作战飞机，3万名服务人员的空军。”

戴高乐派了3个法国师和1个摩洛哥师参加“霸王”计划。

在战争期间，盟军司令要求法国增派一个师，戴高乐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且选了“自由法国”第一师。但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对“自由法国”第一师感到不满意，他命令法国殖民地第九师开赴意大利作战。

戴高乐一下子来了火气，他立即向艾森豪威尔发出照会：第九师是北非驻军，领导权在戴高乐的法兰西解放委员会，艾森豪威尔无权对第九师调遣。

这立即引起了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愤慨，他援引了吉罗将军与美国签订的协定：凡是美国装备起来的法国军队完全归美国司令部支配。盟军司令这样做只能加强了戴高乐的决心，因为他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定。戴高乐通知美英两国，“建议在三国政府中规定一些条件，使法国武装力量能和英美武装力量以同等资格得到盟国司令部使用”。

盟军参谋部愤怒地提出抗议，指出戴高乐的做法贻误战机。戴高乐主意已定，对非洲法军的调离就是不下达命令，而意大利战场上又迫切需要这些军队。

12月27日，盟国终于作了让步，同意由戴高乐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商讨这一事宜。

戴高乐神气十足地表白了他的看法。"第一师（而不是其他别的师）是已交给盟国总司令部支配的，所以只要正式通知我们把它运往意大利，就可以立即开赴意大利与那里原驻的法军汇合。当然，任何法国军队，如果没有法国政府的命令，决不能在任何战场使用。"

戴高乐表示：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他"当然愿意"与盟国合作。他建议缔结一份保证三国政府和三国司令部协同指挥作战的协定。"如果缔结这项协定，一切都好办。如果缔结不成，法国政府只有在自己规定的条件下，才将法国部队交给盟军指挥，同时法国还保留在一旦国家利益看来需要时将其部分或全部调回的权力。"

戴高乐强调指出：

"目前，在意大利战场上，盟国司令部接受

了法国陆、海、空军的协助，而我们不知道人们要把意大利战役引到什么地方去和到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将来在法国的登陆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说：除非英美政府向我们保证，'铁砧'登陆的进军一定实现，所有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都应像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一样参加战斗，并按规定时间一定把一个法国师运到英国，以便参加'霸王'登陆的进军，并解放巴黎。否则，我们不向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增援，并且也不想把军队长时期摆在那里。如果有了这些保证再发生问题时，法国政府就要根据这一事实立即收回它的军队的使用权。"

英美政府对戴高乐的不卑不亢感到恼火，但戴高乐句句在理，无可厚非。于是，英美终于做出了同戴高乐共同行动的保证。戴高乐也答应可以派兵。

在这场小冲突中，戴高乐似乎是报了"一箭之仇"，取得了一点小胜利。

在盟军将领们看来，戴高乐所扮演的角色正是：

"这位国家领袖，没有宪法，没有选民，没

有首都，却口口声声用法国的名义说话；这个军官佩带的将星并不多，而他的部长、将军、海军上将、总督，他的国家的驻外使节等都对他奉命唯谨；他作为法国人，却被'合法'政府判过罪，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诽谤，受到一部分军队的武力反对，但是许多人还团结在他的周围。"

在意大利参战的军队由法国两位杰出的将军——朱安将军和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率领。

戴高乐这样评价他的两位将军：朱安深沉稳重，一心致力于本身的任务；他的权威不是从声誉而是从高深的才能中得来的；他的吸引力与其说得自外表的魅力，不如说是来自坚韧不拔的意志。拉特尔则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他很机灵，眼光远大，面面俱到；他以勇猛和敏锐压服别人的才智；他出奇制胜，以飞速地跳跃奔向目标，而这种跳跃往往是计划好了的。

由这两位杰出将军来指导法国军队，在盟军中大大地提高了法国的地位。

法国远征军于1943年12月在意大利参加战斗，盟军划分了一块艰难的位置给他们，法军表现出色，战绩辉煌。这有力地证明了法军有一

定的战斗能力。

意大利战场结束以后，下一个作战计划就是“铁砧”计划了。

这时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是对戴高乐感到别扭。

罗斯福“直到最后也不承认戴高乐政府，哪怕临时承认也不行”。罗斯福的考虑是这样的：法国解放以后，应建立一个由技术人员、商人、理论家、宣传家等组成的沦陷区盟国军政府，由这个沦陷区盟国军政府管理法国解放地区的行政权。应由法国人民来自己决定自己的政府，美国和英国都不要支持任何一个政党或某一个候选人。

英国的丘吉尔则唯罗斯福的“马首是瞻”，他对这项计划言听计从。

1944 年 4 月，罗斯福指示艾森豪威尔要以盟国总司令的身份来掌握法国的一切权力。“因为他享有极高的威望，能就地保留维希的官员，如有必要，还可以用经过特殊训练的英国军官来管理地方事务”。他希望艾森豪威尔不要表现出支持戴高乐的行动。

很显然，罗斯福讨论法国的问题时，“好像

戴高乐和法国临时政府不存在似的”。难怪戴高乐在丘吉尔面前大叫“法国已有政府”。

艾森豪威尔已明确地认识到了事情的进展，如今的戴高乐非同小可，他现在已是法兰西民族的象征了，是法兰西人民拥护的对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承认他的政府，岂能承认别的政府呢？

5月，艾森豪威尔向罗斯福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我理解您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作出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您，目前在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个地区……我们就可能会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我向您介绍了也许在法国会出现的情况……”

6月2日，罗斯福表示：“务必不要让外国政权对法国人民施加任何影响。这应当由法国人做出选择，这就是说，尽可能由4千万人做出抉择。”

他再次表示美国和英国不会支持任何候选人。

戴高乐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老实说，我认为总统的企图与《爱丽斯漫游记》的迷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罗斯福早在北非就冒险实行过类似他现在梦想在法国推行的政策，当时的条件要比现在对他的图谋有利得多，但他在那次尝试中完全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打算在法国本土实行的计划，是丝毫也没有实现余地的。盟军在法国除了我所委任的部长和公职人员以外，就找不到其他的人。除了我领导的部队以外，就找不到任何其他部队。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决不相信艾森豪威尔能同不是我指定的人在那里顺利地进行工作。”

其实，戴高乐说得一点也不错，艾森豪威尔背上的政治包袱太大、太重，他也没有取消戴高乐的打算。

12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伦敦会见了戴高乐，向他声明：

“过去我对你抱有成见。今天，我承认这是错误的。为了将来的战争，我不仅需要你的武装部队的支援，还需要你的公务人员的协助和法

国人民精神上的支援。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现在我请求你帮助我。”

戴高乐大度地说：

“你真是好样的！因为你知道该说‘我错了’。”

在这次会见中，艾森豪威尔特别使戴高乐感动，因为艾森豪威尔声称：

“我可以向你担保，关于我的事情，无论人们强迫我采取什么表面上的态度，实际上，在法国除了你的政府以外，我不承认任何其他法国政权。”

英国丘吉尔看到罗斯福和戴高乐在顶牛，他虽然倾向罗斯福，但为了全局，也不能抛弃戴高乐，尤其是诺曼底登陆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之中。于是，丘吉尔作中间调停人。

6 月 4 日，在丘吉尔专机迎接下，戴高乐赴伦敦和丘吉尔相见。用戴高乐的话说，丘吉尔是“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与戴高乐将军的拒绝之间充当了中介人。但是美国的势力大和声望高，所以首相的努力主要是对我施加压力，叫我去满足罗斯福的要求。”

戴高乐表示反对：“为什么你硬要我到罗斯

福跟前去作法国政权的候选人？法国已有政府。”

看到戴高乐的顽固不化，丘吉尔不禁大声说：

“每当我们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总是挑选海洋。每当我需要在罗斯福和您中间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

但是，戴高乐不会轻易屈服于任何压力，他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我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要到华盛顿去，但必须是在纠纷真正解决的时候；在法国解放的第一块土地上无可争辩地建立起我的政府权威的时候；在美国人表现出在军事行动以外不干涉法国的其他事情的时候；在承认法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时候。”

诺曼底盟军登陆　戴高乐我行我素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拿破仑的哲理，戴高乐的信条。但盟军却按着他的头让他当无名小卒，戴高乐抗命不遵。

欧洲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迫在眉睫。

"铁砧"计划马上就要付诸于实现。

无疑，这对于盟军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最兴奋的则莫过于戴高乐及其法国人民。

登陆的首站即在法国，法国第一个迎接黎明的曙光，法国人怎能不欢呼雀跃呢？

但由于法国此时的特殊地位，寄人篱下的戴高乐兴奋的另一端则是一盆接一盆的冷水。

没有人足够重视他的政府。

没有人看得起他的"强大"的军队。

整个欧洲的战场的局势发展，戴高乐始终被拒之门外。解放欧洲大陆的宏伟计划，戴高乐的席外建议被束之高阁。整个"铁砧"计划的制定，没有戴高乐的份儿，虽然战争即将在法国领土进行，虽然法军"力量强大"。

戴高乐被堵于门外，对整个详细的计划一无所知，作为法兰西国家的政府首脑，他的确感到愤愤不平。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则使他难以忍受下去了。

4月21日，盟国方面通知戴高乐，今后不再转发法国和法国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的理由很简单，但又似乎很

充分，就是必须对整个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进行保密。但令人不解的是只是对法国采取了密码保密措施。

戴高乐极为不满，“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防范措施，我们认为是一种侮辱，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它们的军队一样，在作战上担负主要任务，同时战场正是在法国领土上”。

戴高乐采取了行动，他决定只要盟国继续对密码工作保密，法国则禁止自己的大使和军方代表与盟国进行联系。而这时，盟军对法国的军方代表非常需要。

这可苦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部，没有法国人的合作，他们的工作便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他们强烈要求解除对法国的密码工作限制。

5月23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伦敦解决承认法国政府以及在法国进行行政合作的问题，并且表示，英国政府希望盟军在法国登陆时，戴高乐能在英国。

戴高乐立即回答，表示他很希望到伦敦去看登陆战役，但条件是他不准备和美国人进行

无意义的谈判，同时，必须立即解除对密码通讯的限制。

5月27日，英国同意取消密码通讯的限制，于是戴高乐起身前往英国。

在伦敦，戴高乐和丘吉尔在大部分时间是友谊相处的。但也有一些小小冲突。

罗斯福和丘吉尔没有征求戴高乐的意见，让准备登陆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带上外国制造的法国货币，尽管法国一再提出严正抗议，但盟国拒不理睬，并且盟军司令下令这种货币将在法国流通。

戴高乐郑重声明：共和国政府将绝对不承认这种货币。

法国将军比约特插话说：

“还有一点，这种纸币印出后还有一个拼写错误。”

戴高乐是一个做事决不含糊的人。6月10日，他接见了一家新闻社的记者，又一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宣布盟国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价值。

6月12日，戴高乐乘“战斗号”驱逐舰到诺曼底，任命了共和国的诺曼底地区专员，并给

他带来了大量的自由法国货币，“其目的是在于使可憎的盟国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无法在法国本土流通”。

戴高乐在这一小冲突中又获得了小小的胜利。

丘吉尔对欧洲大陆的反攻异常关注，他叫人改装了一列火车用做他的流动司令部。他把火车紧挨着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朴茨茅斯司令部，以便他能随时了解登陆工作的进展状况。

6月4日，丘吉尔在他的“火车司令部”会见戴高乐。首先是丘吉尔眉飞色舞地描述诺曼底登陆行动：庞大的登陆军队将从英国海岸出发；战争最初阶段主要由英国的力量来承担这个任务；“特别是皇家海军在运输和护航方面将起主要作用……”

戴高乐认真地听取着丘吉尔的讲话，他非常感谢丘吉尔邀请他并告诉了他作战计划。是的，戴高乐一直为不知道即将在法国进行的作战计划而恼烦。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法国登陆的计划始终对戴高乐保密。丘吉尔曾经致电罗斯福：

“我同意不应该让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得知‘霸王’计划的进行方式。我曾试图满足它的愿望，让勒克莱尔的装甲师参加即将来临的这场战役，但是仅有这一个师参加，不足以使它有权了解我们的秘密……”

但是现在丘吉尔想通了，“他的意见是，假如解放法国的军事行动由英美武装部队发动，而法国人却不知道，这将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产生最坏的影响”。于是他在登陆的前夕告诉了戴高乐军事行动计划。

戴高乐高度赞扬了丘吉尔“对这一成果我诚挚地向首相表示我的钦佩。大不列颠勇敢地经受住了无数考验，拯救了欧洲，今天成了反攻欧陆的基地，并投入了如此众多的兵力，这鲜明地证明自最阴暗的日子以来丘吉尔个人所体现的英国勇敢政策的正确。尽管未来的事件还要使法国付出很大代价，法国仍然因能够和盟国肩并肩地解放欧洲而感到自豪。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在场的所有法国人和英国人心中都怀有某种互相尊重和友谊的心情。”

接下来是谈到了法国解放后的政府问题，两人发生了一些争吵。

当天下午，丘吉尔陪同戴高乐来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总部，艾森豪威尔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戴高乐，并向他详细地阐述了登陆作战计划。

作战的规模相当巨大，计划制订得极其完备。英国的整个南部变成了一个辽阔的军营。8个师，15万人，1.1万架第一线飞机，4000艘舰船正整装待发，穿过英吉利海峡投入第一次袭击。在他们面前是负责开路的伪装、破坏和防化的特种部队，跟随他们后面的是一支有200万人的部队。

用戴高乐的话讲：

"船只随时可以出港。飞机待命起飞。……渡海和登陆都已经全面地准备妥当。由海军、空军和伞兵部队进行掩护的工作也无可挑剔。我体会到在这种极端危险和复杂的事件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登峰造极。……"

艾森豪威尔不敌视戴高乐，他和英国人不同，"他善于在战略问题上尊重戴高乐将军的意见"。

两人谈得非常融洽。

当戴高乐准备告退时，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说：

“在登陆的那一天，我们准备向西欧人民发表一个声明，对法国也有一个声明。”

戴高乐一怔，忙问道：

“您向法国人民发表一份声明？以什么身分？发表什么内容？”

艾森豪威尔给了戴高乐一份打字稿，戴高乐飞速地看了一下，大为不满。“根据这份声明，总司令首先以肩负这项军事任务的军人身分向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人民说话，而他和他们的政治命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接着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气向法兰西人民讲话。他要求他们‘执行他的命令’。他决定，在现有行政机构中，大家要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除非有相反的指示下达。法国一旦被解放，法国人可自己选择自己的代表和政府。总之，表面上他似乎对我们国家负有责任，实际上他只是一位授权指挥军队的盟国将军，他没有资格干预我们的政府，而且这样做他会感到难堪。”

而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整个稿子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运动。

戴高乐提出要修改稿子，艾森豪威尔答应了。

戴高乐怒气冲冲地和丘吉尔一同回到“火车司令部”，戴高乐向丘吉尔大发牢骚，毫不隐讳自己的不快。并且拒绝留下来和丘吉尔共进晚餐，拒绝坐火车回伦敦，他和他的军官们坐汽车回去了。

戴高乐和他的将军们连夜修改好稿子，第二天（6月5日）早晨，将修改好的稿子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们回答我，要修改已经太迟了，因为声明已在8天前印刷出来，只准备随时撒到法国领土上了。确实，当天夜里就要登陆了。”戴高乐回忆说。

戴高乐吃了一顿哑巴亏，很明显，他感到受了奚落和侮辱，“正如我们长期以来所知，戴高乐将军不是那种受了侮辱不回击的人……”戴高乐寻找一个反击的时机。

6月5日凌晨，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大手一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诺曼底战役准备开始了。

下午，盟军通知戴高乐，6月6日登陆开始

后，各国的流亡政府首脑将分别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发表号召书，次序是这样排列的：挪威国王、荷兰王后、卢森堡女大公、比利时首相，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后方是戴高乐。

戴高乐接到这一消息几乎气得发疯：

"我在总司令后面讲话，就仿佛承认他所说的一切，而我是不赞成的，并且在名次的排列与我的地位不相称。如果我要发表演说的话，那只能在另一个时间，而且是在他们一连串讲话之外。"

戴高乐断然拒绝了这一计划。并且拒绝法国的200名联络官员启程和英美参谋人员接触，他只派了少数几个观察员随军前进。

这时，丘吉尔正在为登陆计划牵肠挂肚，没有料到戴高乐在这个紧急关头"固执己见"，丘吉尔怒火万丈，大发雷霆，气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他大声叫喊：

"戴高乐应该让步，在指定给他的时间、地点讲话。"

11时30分，当进攻船队已经向法国启程时，法国大使维埃诺向英国大使艾登表示：演说一事有误会，法国联络官还在英国。

22时30分，在康诺特饭店的一间客厅里，戴高乐面对维埃诺的劝说，仍然消不下火，他说他不拒绝在广播电台讲话，他希望能在今晚利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对法国人民演讲。戴高乐激烈地抨击丘吉尔等人，并把维埃诺大骂了一顿。

6月6日凌晨1时，当盟军的第一批伞兵降落在法国上空时，维埃诺向丘吉尔转达了戴高乐的意见。丘吉尔愤怒地嚎叫、咆哮，甚至跺脚。首相表示他对戴高乐完全失去了信心，他确信，只要他领导法国事务，法国、英国、美国之间不会有良好的关系。他说将军是一个敌人，还说了其他一些类似的话。最激动的时刻，丘吉尔下了逐客令：

"……请戴高乐上飞机，如果必要，最好把他送回阿尔及尔。不应该让他回法国。"

多亏了两位大使的奔波，丘吉尔和戴高乐终于没有彻底决裂。再加上前线登陆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最后，戴高乐终于利用英国广播电台进行演讲，他终于"如愿以偿"。

6月6日下午6时，戴高乐发表了他的最精彩的演说：

“决战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战役，确实是法国战役！……对于法兰西的儿女来说，不论他们在哪里，不论他们是谁，他们独一无二的神圣职责是尽他们的所有力量打击敌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国政府及其任命的领导下达的命令……拨开我们用鲜血和眼泪凝成的重雾，就会出现象征法兰西伟大的太阳！”

在这里，戴高乐巧妙地把临时政府换成了法国政府。

法国和盟国之间的合作问题这时并没有解决，尽管双方都作出一定的努力，但成果不是太大。

戴高乐不是省油的灯，他一次又一次在人们面前显示他和他的政府的存在。

6月10日，他接见新闻记者，一方面指出盟国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价值，另一方面着重强调盟军与法国地方政权缺乏任何联络机构的局面是不合时宜的，是荒唐的。

同时，戴高乐为了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他注意和同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领导人加强联

系。

戴高乐这一工作成果显著，在6月8日至20日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等国家不顾英美的一再阻拦，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6月14日，戴高乐登上法国的“战斗号”驱逐舰，访问盟军攻克的第一站——诺曼底。

戴高乐大刀阔斧地干了三件大事，一是任命他的三个高级助手留在法国，组成解放地区戴高乐政权的核心。二是戴高乐随行带了大量的自由法国货币，将成为法国唯一有效的货币，盟军的货币将毫无价值。三是访问当地法国居民。

“我们步行，从这条街走到另一条大街。居民们看到戴高乐将军都甚为惊讶，随后是热烈欢呼，或泪流如注。他们走出家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跟着我走。孩子们把我包围起来。妇女们真是又哭又笑。男人们向我伸出手来。我们一起走着，又激动，又亲热。心头感到从苦难的深渊中又涌起民族的喜悦、自豪和希望。……于是，在四年来的恐怖日子里，这些法国群众第一

次听到一个法国领导人在人们的面前讲话：敌人就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的。事实上，这不就是民族革命吗?”

这是戴高乐在法国本土上受到的第一次群众洗礼，给了戴高乐以极深刻的印象，此后他一直沉浸在法国人民的爱国激情之中。

在整个战役中，尽管法国正规陆军队没有多少人，但法国内地军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4 年 2 月 1 日，戴高乐正式建立内地军，当时在法国境内的反德国组织非常杂乱，主要有秘密军、狙击兵和法兰西游击队组织、爱国民军、抗战军队组织等组织。戴高乐派驻军事代表，协调各组织之间的活动。

4 月，戴高乐任命柯尼格将军为法国内地军司令，并派他到英国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以便“使抵抗运动与盟国共同作战的战略配合起来，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与抵抗运动联系，供应抵抗运动以武器和必要的支援，从而最大限度地使抵抗运动发挥作用”。

其实，早在这以前，法国内地军就不停地进行战斗，“盟军在我国登陆以前，德军已经损失了成千上万的人。敌军内部充满了一种不安的

气氛，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士气，使他们的军官一筹莫展。特别是法国地方政权的职员和警察，有的情愿与抵抗运动通风报信，有的害怕以'通敌'治罪，因而对敌人的镇压措施拖延执行，不敢充当敌人的帮凶。

同时，法国内地军的情报网迅速建立起来，德国军队的任何活动都逃不出内地军的眼睛。"5月间，有700件电报、3000件书面报告从法国寄到伦敦。""在战役开始的那一天，关于德国军队、基地、物资仓库、空军基地、司令部等全部位置，我们都已准确地掌握，人数和物资都计算得清清楚楚，防御工事都拍了照片，地雷阵地也测出来了。……法国抵抗运动所提供的情报，使盟军对敌人了如指掌，所以能准确地打击敌人。"

5月16日，戴高乐制定了一个"卡伊曼"计划，命令各内地武装部队全面行动。配合盟军的登陆战役。

艾森豪威尔和柯尼格就盟军和法国内地军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

法国内地军有三个主要作战地区。作战地区，要求提供给盟军可靠的情报。敌后地区，内

地军要行动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敌军的一切设施，为盟军的进攻打好基础。在“非军事地区”，则主要任务是：毁坏交通，破坏电站，袭击油库、军火库等工作。

法国内地在整个战役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铁路交通和电讯是内地军破坏的首要目标。在6～7月间，铁路出轨的事件共发生600起，使1800辆机车和6000多节车厢陷于瘫痪状态。诺曼底和巴黎的通讯电路全部被切断。

“7月底，当美国第三集团军突破阿弗朗什时，内地抵抗武装已能给盟军作向导，看守俘虏和骚扰撤退中的德军。8月中旬，队伍发展到了8万人。当美军挥师向东时，他们在布列塔尼各省清除了顽抗的敌人，两个月之内抓了近2万名俘虏。”

“7月中旬，40个省全都起义。中央高地、利穆赞省、阿尔卑斯省以及上加龙省、多尔多涅省、德龙省、汝拉省等，正如利加塔尼各地一样，完全控制在游击队的手里。”

7月末，法国内地军有力地牵制住了敌人的8个师。“此外，德军司令部为了在48小时内参

加战斗而从别处调到诺曼底的3个装甲师，在途中也耽搁了很久。第十七装甲师在他们的纵队未能打开出路以前，在波尔多与普瓦蒂埃之间与我军接触，因而拖延了10天时间。所谓‘帝国’番号的党卫军第二装甲师，6月6日自蒙托邦开拔，由于不能利用铁路(所有铁路都被破坏)，只好绕道塔尔纳、洛特、科雷兹、上维埃纳等省，沿途都受到截击；直到6月18日才带着重大伤亡，精疲力竭地抵达阿朗松……”

如果说戴高乐的民族自尊心使得他坚持用法国部队登陆，那么他的愿望终于在“铁砧”计划中实现了。

8月15日，为了有力地配合诺曼底登陆，“铁砧”行动开始。法国第一集团军首批部队和美国第六军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登陆。

法国人民的第一支正规军终于和法国人民见面了！

这一次战役，是法国正规军和内地军密切配合的一个典范。在15日之前，法国内地军经过斗争，已经成功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战，并极大地牵制住了德国第十九集团军的三个后备师。18日，法国成功地占领了德国第十九集团

军的阵地——土伦。

这一次“铁砧”计划来势凶猛，使德国部队陷入了手忙脚乱的状态之中。

8月14日，美国先遣队以强大的海军、空军火力作掩护，在卡瓦莱尔和勒特鲁雅之间登陆，伞兵部队也成功地降落在卡尔努里、卢加、穆伊。法国非洲突击队也乘机在拉耶耳和拉旺达登陆。

8月15日，盟军和法军联合在布罗旺斯海岸登陆，兵分二路，美军以“拿破仑”公路为中心，向格勒诺布尔进军，法军则进占土伦和马赛，沿罗尼河谷胜利挺进。

16日，美军的部队和法军部队又在拉耶耳、卡瓦莱尔、圣特罗佩、圣马克西曼等地陆续登陆。

登陆的计划详细完备，登陆的地点扑朔迷离，德军一下子陷入了反法西斯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之中。

解放法国岂肯落人后　戴高乐圆了凯旋梦

凯旋门前仰起了戴高乐高昂的头，巴黎光复了。他要大喊，他要狂呼，法兰西从来没有失败过。

戴高乐最激动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

法兰西国家的首都——巴黎已在包围之中。

戴高乐一生奋斗的高峰之一就是解放巴黎，他想重温“凯旋门之梦”！

8 月 18 日，诺曼底的德军全线崩溃。

8 月 11 日，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全被打开了。

巴黎，像一座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德国人和他们的傀儡政府坐立不安，他们感到了死亡前的恐惧。

巴黎城内出现了革命的前奏：7 月 14 日，城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人们到处插上了三色国旗，高唱《马赛曲》，不断高喊“戴高乐万岁”！

这一天，被囚禁在桑德监狱的政治犯，在监房互通声气，冒着被野蛮镇压的危险在所有窗户上挂起国旗，并且赶走了看守人员，他们的爱国歌声响彻全区。8 月 10 日铁路工人举行罢工，15 日警察罢工，18 日邮务人员也罢工。

戴高乐对胜利充满着希望和信心。8 月 19 日，他乘飞机离开卡萨布兰卡，经直布罗陀海峡前往法国。

戴高乐的思绪已飞到了巴黎上空。“我认为，叫法国军队在巴黎比盟国军队先着手行动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动员人民协力打垮侵略者，使首都的解放具有军事行动和民族行动的特征。因此，我冒险鼓动起义，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发动起义的机会。必须指出，我相信我能够使这件事转向有利的方面。我事前在当地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并准备及时把法国的伟大团结带回首都去，我准备亲身在那里把解放了的巴黎的热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戴高乐的意图很明显，他是想让法国军队参与巴黎的解放斗争，证明是法国人民的力量解放了祖国的首都，这可以极大地鼓舞了法兰西人民的革命热情。

同时，他热情鼓励巴黎人民的反抗斗争，全体行动起来，内应外合，解放巴黎。

8月20日，戴高乐到达了盟军总部，会见了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

在这里，戴高乐又获得了巴黎的最新消息，“警察已经罢工三天，在19日黎明占领了警察厅，并向德国人开了火；游击队也几乎到处都向德国人袭击；政府各部都在代表团派去的各支队的手中；‘抵抗运动’方面已进驻市区和城郊的区政府，那里有时也有战斗。”

戴高乐对这些消息非常激动，巴黎已指日可待了，他磨拳擦掌，跃跃欲试，马上就想踏上巴黎市区。

但同时，盟军的进军计划大大地触犯了戴高乐异常敏感的神经。

盟军中佩顿的第三集团军已兵分两路，一个纵队在塞纳河北岸向洛林进军；另一个纵队向南推进直指默伦。但是，到此为止，盟军似乎没有一点进攻巴黎的迹象。

戴高乐大为不满，眼看胜利在望，巴黎即将解放，怎么反而停驻不前了呢？“从战略观点上看，我不了解为什么要从默伦、芒特、鲁昂以及

其它各处越过塞纳河，为什么单单不从巴黎越过塞纳河？况且巴黎是交通中心，而交通今后对于你们（盟军）是不可缺少的，尽快予以恢复是有利的。如果是别的地方，而不是法国的首都，关于我的意见，您（指艾森豪威尔）可以不受约束，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战事是归你指挥的。但是，巴黎的命运跟法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不得不进行干预，并请你指挥军队直下巴黎。当然，首先要派法国的第二装甲师担负这个任务。”

艾森豪威尔解释说，因为巴黎是文明古国，他怕强行攻击会破坏了这个城市的一切文明。

戴高乐反驳说，如果巴黎城内不发生任何事情，则等待战机无疑问题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巴黎城内的人民革命运动已发展了起来，“一旦爱国者在那里同敌人搏斗，各种各样的大动乱都可能发生的时候，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

艾森豪威尔最后说：“我不久就会向巴黎进军，并且指定法国的第二装甲师作为主攻队伍。”

戴高乐补充说：

“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解放的伟大事业，一定要做好。如果盟军迟迟不进攻巴黎，我将亲自率法国第二装甲师解放巴黎。”

23日，艾森豪威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下令进军巴黎。

由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担任了攻城任务。勒克莱尔是一个合格的法国将军，他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将一切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戴高乐非常欣赏他。“我注视着这个投身于战斗的年轻将领，而且看到已为他准备好各种非常顺利的条件，我对他说：‘你真幸运！’我还想：在战争中，将军们的幸运也是政府的光荣。”

24日傍晚，第二装甲师的主力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以后，进抵巴黎近郊。

25日，一切按计划顺利地进驻巴黎，巴黎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民手中。

接下来，则是看“凯旋”归来的戴高乐的一系列表演了。

戴高乐于25日下午乘车到奥尔良门，在奥尔良大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沿途等着欢迎我的人可多啦！房屋上下不知有多少飘扬的旗

帜啊！……在奥尔良门前，人山人海，简直是一片欢腾的海洋，虽然附近还不时听到枪声。奥尔良大街更是黑压压一片。”

下午4点左右，戴高乐到蒙特巴尔纳斯车站了解战争的进展情况。“巴黎战斗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首都没有遭到所担心的敌人那种破坏，居民也没有受到人们本来害怕的死亡，我们的军队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接着，戴高乐到了国防部。“我发现这些庄严的地方内部毫无改变，真感到惊讶。巨大的事件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我们的军队全军覆没，法兰西几乎灭亡，但国防部却依然如故。院子里一队共和国警卫兵照旧向我致敬。门厅、楼梯、军徽完全同从前一样。服务人员仍然是以前的那些人。我走进部长办公室，这是我同保罗·雷诺先生于1940年6月10日夜间离开的地方。这里连一件用具、一块地毯、一个窗帘都没有移动位置。桌子上的电话仍在原处。……除了缺国家政府以外，什么都不缺。……”

晚上7点钟，戴高乐到巴黎警察厅检阅全体巴黎警察队伍。“他们情绪激动，喜形于色，内心感到骄傲。可以看出，他们由于做出了战斗成

绩和榜样，已洗雪了长期屈服的屈辱，他们也没有放过提高自己威信和声望的机会。”

接着，戴高乐到巴黎市政厅，接见抗战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热情的群众。“我向会场环视了一遭，看到这个为兴奋、热情、好奇所激动着的会场，我立即感到我们是相互了解、心心相印的，我们都是为祖国而战的战士。在我们中间，有一条勿庸置疑的纽带。如果会场上还有一触即发的分歧和蠢蠢欲动的野心，那么，只要群众和我站在一起，就会使我们的团结战胜一切。另一方面，尽管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十分疲倦，尽管受到许多危险和变故的刺激，但我没有看到一点不合乎身份的举动，也没有听到一句不合乎身份的话。我们久已梦想的、付出若干努力、苦痛和生命而换来的团结，辉煌地重新实现了！”

戴高乐接着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讲，指出“巴黎是在它自己的人民在军队的协助和全法国的支持下解放的。胜利应归功于我们的人民及军队，也归功于我们的盟军……”

他号召法兰西人民再接再厉，完成全法国的统一。

最后，戴高乐重复他的名言：法兰西共和国从来没有不存在。

8 月 26 日，戴高乐精心地安排了他“凯旋”巴黎的仪式。他将原先的礼仪和习惯置之不理，将个人危险抛弃脑后，他将徒步走完从凯旋门到中心岛圣母院大教堂的大部分路程。“他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他认为，这与他所需要的群众欢呼相比，是值得的。”

这时，巴黎北面的防务相当吃紧，德军从巴黎退出后，陈兵在城郊，盟军命令第二装甲师向德军攻击，赶走德军。

但戴高乐身边可以检阅的只有这一个师，如果全部推向前线，那么他的欢迎群众活动会受到极大地限制。最后，戴高乐权衡再三，认为德国人再回头攻打巴黎的可能性很小，他从第二装甲师中抽调一部分会同内地军守卫北面防务，其余的则编成小分队，分别在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的圆点广场和大教堂前进行警戒。戴高乐和勒克莱尔的共同观点是对盟军的命令不予理睬。

下午 3 时戴高乐来到了凯旋门，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后来在

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在广场上从官兵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他们都站在车上向我注目，好象像是一个梦正在变成事实。我重新点燃碑前的火炬。为了向我们致敬，火焰愉快地升起来了。自1940年6月14日侵略者占领这里以后，谁也没有这样做过。随后，我离开了凯旋门和平台。参加的人让开了一条路，香榭丽舍大街呈现在我的眼前了！

啊！简直是人的海洋！也许有200万人。屋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窗口里密密拥挤着人，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旗帜。梯子和柱子上边甚至也爬满了人。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阳光灿烂、国旗飘扬下的人群的巨浪。

我下车步行。这不是一个武器闪烁、军乐嘹亮的阅兵节日。今天，是一个曾经沦为亡国奴、受尽压迫和摧残的民族，在欢欣鼓舞的景象和自由的气氛中重见天日。由于每个参加者都选择了戴高乐作为自己灾难中的救星和希望的象征，就让他们看见他在他们面前和蔼可亲，并使全国的统一发出光辉。……

我在群众无以伦比的欢腾中，在暴风雨般高呼我的名字的时候，激动而又镇静地走着，尽

力使我的视线看到这个海潮中的每一个浪头，以便所有人的形象都能进入我的眼帘。我的双臂时起时落，答谢群众的欢呼。这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是多少世纪来经常照耀着我们法兰西历史的一种民族觉醒的奇迹和法兰西的伟大业绩。在这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心情、一个呼声的整体中，分歧消失了，个人也不存在了。我先后在凯旋门广场、在圆点广场、在协和广场、在市府大厦前、在圣母院大教堂的门前，接触了无数的法国人。

要知道，你们是多么相似啊！你们，面黄肌瘦的儿童们手舞足蹈向我大声欢呼！你们，经受无数苦难的妇女们笑逐颜开，向我高呼万岁！你们，充满长期被压抑的自尊心的男人们，向我欢呼致谢！你们，流着眼泪的老年人向我致敬！啊！你们是多么相象啊！至于我，在这种激动欢腾之中，深深感到应该完成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任务，充当决定国家命运的舵手。……

我在世界最著名的中心每迈进一步，就感觉到往日的光荣同今天的光荣已经融合在一起。……”

最后的一个目标是大教堂。“将军不时地举

起长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他缓慢而镇静地朝着中世纪法国的哥特式大教堂走去。在他眼里，这个教堂是法国历史的象征。”

尽管大教堂里没有电，大风琴的美妙声音无法听到，但是，人们还是唱了一首动听的圣母马利亚赞歌。

戴高乐的“凯旋”之梦实现了。

他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一个象征，在度过了一个痛苦的斗争以后，现在终于“凯旋”而归，光复祖国。

戴高乐完全沉浸在一种兴奋和喜悦之中，尽管他在流亡国外期间忍受了许多委屈与不平，尽管他的军队作为偏师解放祖国……

但是，戴高乐“凯旋”了，他领导的法兰西的军队光复了巴黎，他领导的法国人民光复了祖国。

戴高乐，在扮演着法国历史上恺撒、拿破仑等伟人之后的又一重要角色。

治乱世大刀阔斧　厌党争将军引退

戴高乐满怀信心地致力于法兰西民族的振

兴。

经过艰苦的奋斗，他毕竟在法兰西“凯旋”了。

戴高乐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但是，戴高乐不久即发现，并没有他想象地那样简单的“凯旋”。

“凯旋门”前并不“凯旋”，戴高乐感到了压力。

1944年8月28日，在巴黎举行了群众大会以后，戴高乐开始了他的工作。

首先是使各个抗战组织认识到，现在法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戴高乐的政府，除了他的权力以外，不能有其他的中央权力存在。

戴高乐下令把巴黎游击队的20个主要领导人召集在他的办公室里。宣布对他们进行改编，他们的全部部队统一于法国正规军中。

接着，戴高乐召集了抗战运动的中央委员。这时戴高乐急于向这些委员们最后摊牌，因为“有些人正在策划把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权力机构，实际上也就是变成一个平行的政府，从而从抗战运动战士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爱国’民军便会强制推行他们的革命

秩序。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他们自己的旨在指导政府的立法草案。”戴高乐首先赞扬了抗战运动的巨大作用，接着便宣布，随着巴黎的解放，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已成历史了，再继续存在下去已无任何理由。现在应解散这一机构，合并到政府的临时议会中，一切的行政管理权必须由政府统一行使。

接着，戴高乐宣布了具体工作程序。把内地军合并到国家正规军中，由国家陆军部负责指挥。撤销行动委员会。由警察和宪兵来维持社会治安，必要时由国家正规军协助工作。立即解散所有的民军。

戴高乐的决定引起了这些委员们的极力反对，但戴高乐却不给他们发言的权利，宣布必须执行这一命令。

戴高乐此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现实，虽然他先发制人压服了抗战运动，在巴黎建立了他的权威，但在全国建立起同样的权威，却并非易事。

法国经济经过战争的折腾几乎达到崩溃的地步。人民正在挨饿，农田一片荒芜，工厂寂然无声，商店空无一人。粮食、原料、燃料和工业

品的贮存都完全耗尽。

交通运输遭到惊人的破坏。战前的1.2万台机车，只剩下2800台。3000座桥梁被炸毁了。从巴黎开往里昂、马赛、图卢兹、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等地的火车无法通行。过去有300万辆汽车，现在只有30万辆勉强使用；而且由于汽油奇缺，乘坐汽车成了最不可靠的事情。由于交通运输差，缺乏正常的传递系统，政府只能断断续续地行使职权。

戴高乐清楚地认识到任务的艰巨。“至于我个人，在风云变幻的夏末来到了悲惨的巴黎，我丝毫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到人们的口粮像度荒年一样，衣衫褴褛，凉锅冷灶，没有灯火；我曾在橱窗空空的商店、停工的工厂、死气沉沉的车站前面走过；我听到群众发的牢骚和团体提出的要求，以及造谣分子的兴风作浪；我清楚地看到，尽管各国人民都同情我们，但是各国都奉行一条铁的纪律：决不白白地赠送东西。所以，我们只有付出代价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我估计了为争取我们那一份胜利和完成初步恢复工作所应付出的代价。”

同时，这时期的法国还处于一种复仇的混

乱状态，原来和德军或“维希政权”有染的所有的人都视为“内奸”。各地游击队设立了非法法庭，不用法律程序就处死仇人。同时，许多私人谋杀事件在政治报复掩盖下层出不穷，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有人统计，到1945年初，被处死的和私人谋杀的达40000人之多，而长期关押不作审讯者十倍于这个数字。

戴高乐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建立起政府的权威。

全国只能有一个权威，是他领导的法兰西国家。

这个国家才有权力发行货币，制定并执行法律。

有权力判处死刑的也只有国家。

8月31日，戴高乐将临时政府从阿尔及尔迁到巴黎。

9月9日，戴高乐组成了新的政府。

戴高乐这个新政府可以说是兼容并包，一方面他极力想安置他在阿尔及尔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却又要容纳全国抗战委员会的一些人。不管怎么说，这一政府还是圆满地组成了，尽管有些是出于对戴高乐的忠诚，另一些则是迫不

得已。

9月12日，戴高乐在夏尔宫里举行了一个有8000人应邀出席的演讲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包罗万象，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市议会、巴黎大学、工商界、新闻界等等。戴高乐的演讲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掌声，但并不是怀有火热感情的拥戴。

在中旬，戴高乐决定出巡全国，肃清各省的反对势力。

戴高乐的主要政敌恐怕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戴高乐虽然三令五申各省要服从全国，只能建立一个代表各抗战运动组织的解放委员会，目的是协助巴黎委派的地方长官进行工作。但是各地共产党却号召人民继续革命，对戴高乐的委派长官并不服从。

戴高乐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他决定出巡各省，击败他的敌人。因为他“认为在这方面他有一笔谁也比不上的资本，就是他在群众中享有无可比拟的个人威望。……现在他所委派的人孤立无援，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这就需要把希望从群众的欢呼声中吸取的力量灌输给这些次要人物，以此来为他们撑腰打气。”

里昂、马赛、土伦、图卢兹、波尔多……处处留下了戴高乐干练果断的伟大形象。

在里昂，他下令解散了共产党设立的机构，把共产党组织的军队一部分运往前线，大部分则予以解散。

在图卢兹，他视察了武装人员，命令宪兵重返岗位，防止外国军队的捣乱。

在波尔多，抗战运动的不少武装部队拒绝服从戴高乐所设地方当局的命令，戴高乐毫不客气，指出这些首领的路是：或者服从命令，或者进监狱。

……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继续深入，在戴高乐没有巡视到的地方更加兴盛。各共产党组织正在加紧进行“爱国民军”的招募工作，尽管戴高乐严令禁止。

10月28日，戴高乐下令解散爱国民军，引起人民的抗议，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30日，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在巴黎发表演说，具有很强的火药味。

11月24日，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和斯大林就法国共产党问题作了商讨。

1月21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会议上宣布不赞成保留爱国民军，“这些武装组织在反抗希特勒占领军及其帮凶维希分子的起义过程中及起义以前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但是目前情况不同了，公共治安应由为此而建立的正规警察来维持了。市民自卫队，更广泛地说，一切非正规武装组织，都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了。”

共产党的态度使戴高乐安定了一会儿。

戴高乐旋即又陷入了一种麻烦之中，他的政府也经受了一次考验。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迅速崩溃，大约250万法国军人和背井离乡的百姓突然归国。如此众多的归国大军使法国政府手忙脚乱。

如何安置这些归国大军，确非易事。“要使这250万人有吃有穿，得到安置，还要防止他们一直梦想着过去所熟悉的法国、而在归来之后看到国家当前贫困的现实时出现的颓丧情绪——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但困难之大令人伤透脑筋。”

法国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设立了收容所、发放救济金和生活必需品。但往往是僧多粥少，如此众多的需要收容的队伍太令人头疼了。

某些地区战俘有了骚乱现象，并出现了“全国战俘运动”。

戴高乐火了，他把“运动”领袖召到办公室，警告说：

“我这是最后通牒，我坚决要求你们停止一切运动。”

“运动”领袖们回答：“我们无法制止这种运动，战俘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运动是他们自发的。”

戴高乐可不听这一套，他说：“必须坚决维持好公共秩序，你们马上给我写一个保证，马上停止一切骚乱。否则，你们就会被拘留，30分钟内给我答复。”

最后，“运动”领袖们答应不再骚乱。

戴高乐以军人的严厉方式制止了骚乱。

戴高乐有一句名言：圣女贞德如果结婚了，就不称其为圣女。

戴高乐以此表明他也反对个人专制。

戴高乐越来越深信“多党制”不适宜法国，对法国将是一场灾难。

抗战运动各组织都已开始分裂，成为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不同派别。“如果政权落到它们

手里，它们的领导人、代表和党员，肯定都要在政界大肆活动，成为职业政客。党派的力量完全耗费在争夺国家权力、重要位置和行政职务上，它的活动基本上只限于所谓的策略上，这实际上就是实行妥协或放弃原则。由于他们都是少数，为了爬上统治地位，他们就需要和对手分赃。从而产生出双重后果：在公民面前，他们势必自相矛盾，不孚众望；同时政府内部长期存在着对立的集团和个人，互相掣肘，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权软弱无能。”

戴高乐的观点是，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意味着国家元首不应当由某一政党指派，而必须由人民推选，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各部部长，有权通过公民投票或议会选举了解全国民意；最后，在危急时期，他有责任保证法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除总统必须公开干预的情况以外，政府和议会要携手合作，议会有权监督政府，也有权推翻政府，但国家最高领袖有权进行仲裁，并且有权请人民进行仲裁。”

但戴高乐权衡再三，分析原因，认为他的这一理想不可能实现。

"我清楚地看到我的计划同各党派的要求是针锋相对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各党派一定会根据各种理由，要求未来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直接完全从属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如果戴高乐不愿意当陪衬，就没有他的位置。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目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威胁，都丝毫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要求。"

政府决定实行全国选举。

7月9日，戴高乐拟订了一个选举和全民表决相结合的正式选举提案，在部长会议上通过。

7月21日，戴高乐在广播中向法国人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要恢复第三共和国的老样子，应该对立宪议会的权力和任期进行明确的限制。

7月27日和28日，咨询议会开始讨论戴高乐的提案，会议成了一场尖锐的舌战斗争。戴高乐后来记录说：

"我已经预料到一定会发生一场激烈、尖锐而又没有结果的争论。事实果然是这样。代表们几乎一致表示反对政府的草案，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有些议员极力主张实行旧宪法，把戴高乐

将军主张的公民投票比做波拿巴的全民表决。他们要求制宪议会有权独立决定一切事务，特别是国家制度，不同意对议会的权力进行限制。

戴高乐非常激动地为自己辩护。他后来写道：

“我着重指出很多人故意把我主张的公民投票比作拿破仑式的选举骗局，在我把共和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装出怕我扼杀共和国的样子，这简直太可笑了。1940年，各党派和议会都背叛和抛弃了共和国，只有‘我举起共和国的国徽，执行共和国的法律，保护共和国的荣誉’。现在我正准备把我的权力转交给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这同12月2日或雾月18日的程序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今后共和国必须有一个政府，而且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重复那令人痛心的老一套。”

确实，在过去的法国政府中充满着勾心斗争和阴谋诡计。从1875年到1940年这一段时间内，法国就更换了共102届政府。而和同时期的英国和美国比较来看，英国只换过20届政府，而美国只换过14届政府。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对戴高乐

说过这样一句话："请您想一想，我这个美国总统，在战前甚至有时连法国内阁总理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戴高乐警告人们："今后的情况比从前还要严重，国家的行动决不会有效，而且我可以断言，如果我们还恢复那种制度，法国的民主将不会有什么前途。……1940年的灾难、共和国的垮台和维希政府上台执政等事件连续发生，这一切也是由于全国人民对自己长期亲身经历的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荒诞把戏已经深恶痛绝了。"

咨询议会尽管知道戴高乐谈得句句在理，但却执迷不悟，以210票对19票否决了戴高乐的全部提案。

但是，咨询议会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可以取代的方案。

8月17日，戴高乐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公民投票和选举法令的最后条款。

10月21日开始了全民投票，结果是大多数同意戴高乐的观点，即不恢复第三共和国。

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但前景却不是令人乐观的。

在拥有586名议员的议会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302个席位占绝对多数。而这些人是要组成一个人民阵线政府，而不是组成由戴高乐倡导的“独裁”政府。

戴高乐大发感慨：

“战争已经结束了，动力消失了，伟大的行动不再需要了。一切迹象表明，旧制度又要复辟，虽然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适合国家的需要。”

11月6日，新立宪议会首次开会。

戴高乐深信他的退职不可能推迟很久了。

会议主持发表了一篇演说，对戴高乐首先表示了一下敬意，接下来却是对戴高乐推行的一些政策大肆攻击。

使戴高乐伤心的是，赞扬他的话没有引起议员们的多大反映，而对他进行批评时却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掌声。

多亏戴高乐早有打算，“他辞职时，决不能让任何阴谋诡计给他抹黑”。戴高乐让主持人宣读了一封他的信，表示制宪会议一俟选出自己的常务机构，戴高乐即行辞职。

议会最后选举了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吉安

为议长。

经过近一周的激烈争论，在11月13日，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但戴高乐信心不大：

“但是我知道，这次选举是对我以前的活动表示的敬意，而决不是对我的未来作出担保的诺言。”

果然，在戴高乐当选并着手组织的政府时，立即出现了政治危机。

共产党要求得到国防部、内政部、外交部三者之中任何一个部的部长职位。

12月15日，所有的公务人员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增加工资，就举行罢工。

1946年1月1日，社会党人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就提出国防拨款削减20%的建议。

这一系列危机使戴高乐彻底清醒过来。“当天晚上，我深入地研究了一下各党的心理，觉得事情已经十分明显：各党派都在为恢复自己的力量而玩弄着旧日的把戏，我再领导下去徒劳无益，甚至会有失身份。一句话，现在是我应该处理我个人下野问题的时候了。”

1月20日，戴高乐把所有的部长召集起来，

向他们宣读了辞职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戴高乐终于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热衷的政治生活。

戴高乐在法国最危急的关头站了起来，带领法国人民进行了顽强斗争，赶跑了侵略者，坚决维护了法国的尊严。

在“凯旋门”前，他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法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

使人陶醉的时光没有多久……

戴高乐发现在国内政治上他不是“凯旋者”。

他失败了。

国际舞台纵横捭阖　苦心经营大国梦难圆

一下，二下，三下……戴高乐的心被罗斯福和丘吉尔敲得快要裂碎了；幡然醒悟的将军明白了一切。

同样，戴高乐在国际上也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凯旋者”。

直到他回到巴黎之后两个月，美国和英国才承认他的法国政府。

欧洲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没有法国参加。

雅尔塔会议吃了闭门羹。

波茨坦首脑会晤被拒之门外。

同斯大林的会晤有一些成果，后来证明是毫无意义。

戴高乐所受的外部压力绝对不亚于他在国内所受到的一系列阻碍。

凯旋门前的英雄——能否恢复昔日法兰西的一切荣耀和地位。

戴高乐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已是法兰西民族的象征，“所到之处，是人们用掌声、热泪和即

兴表演欢迎他”。事实上，在法国不承认戴高乐的领袖地位已不可能。

罗斯福由于一开始就存在着个人的好恶问题，迟迟不肯表态。

丘吉尔则只是一味地选择“海洋”，他是忠实于美国朋友的。

戴高乐要以事实迫使他的政府被承认，他绝不会乞怜别人同情。

1944 年 6 月，戴高乐应邀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和新闻记者的对话大大提高了他的地位。美国人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问：“您是否把临时首都设在雷恩?”

答：“法国的首都在巴黎。”

问：“目前您相信美国决不打算得到法国的领地吗?”

答：“我相信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和人民毫无这种想法……”

问：“您认为（法兰西）帝国会完整无缺地归于你们吗?”

答：“我深信法国将完整无缺地收复属于它的一切，但法国宪法和法兰西帝国在未来的世

界中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问：“有人说法国将不是从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四大强国之一。法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吗？”

答：“空谈改变不了事实……很明显，如果不把法国摆在首要的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组织……”

……

戴高乐美国之行引起了美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的关注。随后，美国舆论便掀起了一场支持戴高乐的运动，最后终于迫使顽固的罗斯福让步。

1944 年 10 月 23 日，白宫体面地宣布：把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领土上的权力移交给戴高乐政府。尽管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在法国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权力。

戴高乐对此评论说：

“他们现在愿意用法国的国名来称呼它了，法国政府对这一点感到满意。”

但承认并不是意味着法国就有了一切和盟国同等的权力，戴高乐并未垂手得到平等发言权。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魁北克举行了会晤，协调双方的共同对内对外政策，但没有通知法国出席会议的必要。

罗斯福总统邀请了苏联、英国、中国于1944年9月和10月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筹备未来的“联合国”组织。法国没有被邀请参加。接着在讨论关于领导这个组织的“安全理事会”问题时，决定由四“大国”组成，同样也没有法国的份。至于原因，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分析是：

“这样很好！因为美、英、俄、中四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流出了自己的鲜血。至于法国，在这次战争中只是以一个小国的身份参战的。”

伦敦的欧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一年多，只有英、美、苏三国组成来讨论欧洲的前途、德国的未来等问题，戴高乐始终被拒之门外。

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携同他的外长艾登飞往莫斯科，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会谈。但双方都没有透露给戴高乐任何消息。

戴高乐对于这些举动是何看法呢？

“我们无法直接制止这种排挤我们的举动，

但也只有我们才能使那些排挤我们的人不再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关于欧洲的问题，首先是德国问题，任何不经法国同意而作出的决定都是无法付诸实行的。不久以后，我們将用一支坚强的部队向莱茵河和多瑙河进军。战争一结束，美国就要回到它的西半球，英国将回到它的岛上，只有法国仍然屹立在旧大陆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有法子打破我们的三个伙伴强加给我们并要我们消极认可放弃权益的局面。我们的国土解放了，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了，全国的秩序恢复了，所有这些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参加他们的行列。”

但似乎不管戴高乐怎么设想，事实总是证明法兰西在国际上地位恢复已非易事。

既然戴高乐的政府已经得到国际承认，那么政府就开始了它的一切活动。

10 月 30 日，戴高乐邀请丘吉尔和罗斯福访问巴黎。丘吉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后者则是婉言谢绝。

11 月 10 日，丘吉尔带着妻子和女儿玛丽及他的外长艾登来到巴黎，受到戴高乐政府的热烈欢迎。

丘吉尔下榻于外交部，睡德国陆军元帅戈林睡过的床，用他用过的浴室。戴高乐带领法国人民对他表示了极大地感谢，对丘吉尔在战争期间给予法国的帮助表示赞扬。

随后几天中，两国商讨进入了正题，丘吉尔的语气和态度疏远起来。

英国只准备给法军提供最低限度的装备，关于另外的要求，英国无能为力。

英国承认法国也应该在德国拥有一块占领区，但现在却不想确定下来。

丘吉尔安慰戴高乐不要太着急法国地位的恢复，"英国不会与法国分离……至于法国，因为有了你，它就要回来了。请你不要着急，大门已经打开了一道缝，以后就会为你完全打开。我们自然会看到你在管理委员会中就坐。到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我们共同行动。在这期间，一切都交给我办好了！"

丘吉尔这个外交家，模模糊糊的回答，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丘吉尔给戴高乐带来的一点安慰就是：英美苏三国联合邀请法国在同等条件下参加伦敦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工作的邀请书。但这远远

抵消不了戴高乐的失望情绪。

戴高乐在法国咨询议会上又表明了他的主张。

法国应该是一个外交大国，有权在联合国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准备再一次承担重大任务所要求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关于欧洲的任何决定以及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决定，只要我们没有同其他通过这些决定的国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讨论，我们将不受任何约束。”

戴高乐希望法国能和盟国一起参加统一的欧洲的创建工作。

11 月 24 日，戴高乐应邀到莫斯科访问，“像在战争中那些黑暗的岁月里那样，戴高乐又一次看到了一线希望，可以在莫斯科寻求他在伦敦不能得到的东西。”

经过反复协商，12 月 10 日，苏法签订条约，双方保证继续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不单独同德国订立和约，将来两国采取共同措施，以制止德国新的侵略威胁。两国将共同参加联合国组织。有效期为 20 年。

无疑戴高乐此次莫斯科之行意义重大。法

国得到了世界大国苏联的承认和肯定。斯大林风趣地说：

“您尽管相信我好了！假使您，假使法国需要我们的话，即使仅剩最后一口汤，我们也要分着喝。”

法国人民对于法苏条约的签订十分满意，都欢欣鼓舞，以为这是法国重新跻身于大国之林的标志。

戴高乐接着遇到的事情使他吞了“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这种事情使他终生难忘。

1945 年 1 月，英国报纸发表了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位先生即将在雅尔塔举行会谈的消息。会谈目的是讨论决定德国无条件投降、战后纳粹德国的前途、意大利的地位、对中欧和巴尔干的共同政策，以及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维持国际安全等问题。

戴高乐对这个事情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得到任何外交通报。

可以想象戴高乐得到这一消息后的愤怒：

“他们不邀请我们，无疑使我很不满，但我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不管法国在恢复自己的地位的道路上获得了多大进展，我还是

非常清楚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知道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目的。”

在这次“三巨头”会晤前，罗斯福写信给丘吉尔：

“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任何企图使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会晤的尝试，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愉快。”

罗斯福是坚决拒绝戴高乐参加会议的。

戴高乐也领会到是美国从中作梗。“老实说，在‘三巨头’中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参加。英国人和俄国人立即就通过半官方的消息、灵通人士使我们知道这件事。斯大林元帅知道我对波兰抱什么态度，而丘吉尔很想叫伙伴们让他在近东享有全权，我显然不相信他们会坚持要戴高乐出席会议。但我并不怀疑只有罗斯福总统坚决拒绝让我出席。”

这件事对戴高乐刺激很大，他决不会宽恕把他排斥在外的罗斯福。同时，他也对丘吉尔和斯大林决不会宽恕。

罗斯福为了不过于激怒戴高乐，采取了一系列友好的表示来安慰戴高乐，但戴高乐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哄骗的。

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发表了国情咨文，对法国进行了恭维赞扬：法国人民在1940年拒绝投降，进行抵抗；承认法国有权解决德国问题；美国打算让法国作为一个强国重返世界舞台……

1月27日，罗斯福又派霍普金斯出使巴黎，期望改善一下紧张关系。

戴高乐一见到霍普金斯，“答话很不热情，又寸步不让”。

“如果你们真诚地认为美国和法国的关系不应当是目前这种状况的话，为什么不做点事情改变它呢？你们本来应该邀请我们去雅尔塔的。”戴高乐对他说。

戴高乐不顾霍普金斯的辩白，继续列举了美国人抛弃法国的许多做法，指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一切矛盾分歧，美苏英三国无权解决。“法国人有这样的印象，你们再也不认为法国的强大对于世界和你们来说是必要的了。”

2月5日，雅尔塔会议召开，窝了一肚子火的戴高乐不甘寂寞，因为“他们太藐视法国了”。戴高乐公开发表了广播演说：

“关于缔结未来的和平问题，我们已经通知

我们的盟国，法国对于自己没有同其他国家以同等权利参加讨论和表示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我明确指出，法国认为：从莱茵河的这一端到那一端都要驻扎法国军队、莱茵河左岸地区和鲁尔矿区应脱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必须独立……法国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我们确信能够实现这些条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围，有一亿人口紧密地团结在法国的旗帜下。”

从2月5日到2月12日，“三巨头”在雅尔塔华丽的皇宫和别墅里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的结果多少缓和了一下戴高乐的怒气。

同意法国在德国有一个占领区。

同意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

在战后国际组织中，法国可以拥有一个常设席位。

毫无疑问，戴高乐对于这一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

罗斯福似乎想补救一下自己的“过失”，他派大使杰斐逊·卡弗里带给戴高乐三封信。第一封信正式邀请法国与三个大国一起参加对德

管制委员会。第二封信希望法国能签署欧洲解放宣言，尽管它没有参加会议。第三封信是三巨头邀请法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戴高乐权衡再三后，接受了前两封信。

同时，卡弗里还带来了罗斯福的私人信件，希望从雅尔塔返回华盛顿时，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会晤，请戴高乐确定一下日期。

这又触动了戴高乐敏感的神经。

戴高乐没有心思去会见美国总统。戴高乐有他充分的理由。

雅尔塔会议把戴高乐排斥在外，现在会议刚刚结束时，戴高乐还窝着一肚子火没处消，他当然不情愿见这个极力排斥他的美国总统。另外，雅尔塔会议该讨论的问题都讨论了，法国和美国单独间会谈不会有什么实质意义。而如果这个时候戴高乐冒冒失失地接受罗斯福的邀请，就可能给世界各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戴高乐同意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这和戴高乐的观点是相违背的。

还有一点使戴高乐生气的是：美国总统根据什么理由邀请法国政府主席在法国境内去拜

访他呢？在戴高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近于侮辱性的失礼行为。阿尔及尔是法国的领地，而罗斯福却不承认，不能不引起戴高乐反手一击。他指出："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能认为阿尔及尔不是法国的。那我就更有必要提醒他注意这件事。"

罗斯福在去阿尔及尔的途中，在他乘坐的"昆西号"巡洋舰上以主人的身份会见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总统，这两个国家都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现在罗斯福却向戴高乐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是要在接待中东国家元首的同一军舰上以同样条件来接待戴高乐将军"。这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戴高乐所不能容忍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不管目前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一个大国的主权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我应当对法国的主权和尊严负责。"

戴高乐报复的时机到来了。

1945 年 2 月 13 日，戴高乐在与他的部长们商讨后，向罗斯福表示了他的意见。"可惜，我此时不能无准备地前往阿尔及尔。……倘若此时他想经过阿尔及尔，希望他通知我们，尽管我

无法在那儿接待他，但我们能够通知阿尔及利亚总督，使那里的一切能符合总统的心意。”

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世界，使美国总统大失脸面。罗斯福的自尊心则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回到华盛顿就发表了公报：“总统得知戴高乐将军因处理国事不能前往阿尔及尔，感到非常失望。”“关系到法国和美国的一些重大问题正等待解决，我原想在回国之前与戴高乐将军会晤。”

国际舆论也大加谴责戴高乐“不识抬举”，但戴高乐的“铁石心肠”一点儿也不为所动。

接下来的是戴高乐又不愿意看到的痛苦的现实。

7 月 17 日，英、美、苏三国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法国又一次被无情地“抛弃”在外。

本来认为法国已彻底成为世界大国的戴高乐又受到了一次美英的沉重的打击。他后来回忆说：“联合国成立了。但是作为成立大会的会议，还不能考虑战争结束后产生的问题。美英两国又抛开我们，独自跑到波茨坦同俄国会谈，以便解决实际做法的问题。这个会议是 7 月 17 日开幕的。杜鲁门和丘吉尔希望取得斯大林的同

意，把在德黑兰提出、后来在雅尔塔决定的有关德国、波兰、中欧和巴尔干问题的议案加以定稿；盎格鲁撒克逊人希望能在实际上捞回他们原则上已经作出的让步。”

“三国首脑”还将就苏联最后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达成协议。

“让我们的昨天的盟友再一次去开没有我们参加的会议吧！——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这种做法只能使我们再生一次气罢了。其实，我们认为不参加这些讨论也好，因为从今以后，这种讨论只能是多余的。”

“我曾对未能出席德黑兰会议感到非常遗憾。……后来，我还曾对未能参加雅尔塔会议感到气愤，……现在木已成舟，即使我到波茨坦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戴高乐对自己被排斥在外极为愤慨，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自我安慰罢了。

此时，对戴高乐的一点安慰就是欧洲委员会的决定。

7月份，在伦敦的欧洲委员会几乎完全满足了法国对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界问题上的要求。除了英法竞争的科隆以外，戴高乐得到了他

想要得到的一切，并且同时拥有了一份对柏林和维也纳的平等管理权。

还有一点没有使戴高乐失意，法国被邀请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四大国外长会议，以便讨论他们各自的国家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可能基础。

9月11日，伦敦四大国外长会议召开。

各国外长（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外长贝尔纳斯、英国外长贝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23天中进行了激烈地讨论。主要是有关欧洲问题和意大利的殖民地问题。

这次会议的总的结果又使戴高乐大失所望，关于巴尔干半岛的问题讨论，只是英、美、苏三国的讨论，法国和中国又被“排斥”在外。

而事实上，四大国外长会议经过23天的争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东西，最后不欢而散。法国被正式邀请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戴高乐只好自叹命运不佳罢了。

这样，对于德国的管理，是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占领区。在东部，苏联在普鲁士和萨克森实行了苏维埃。在西部，英美联合成立了德国政府。英国希望法国占领区能与英美

合并，但戴高乐没有同意。

戴高乐所倡导的使德国组成一个联邦国家的天才设想也终于像肥皂泡似的幻灭了。

不知戴高乐对自己在国际上的一系列受挫有何感慨，但他自己是很清楚，在法国的凯旋门前他又成为不是凯旋的“凯旋者”。

他经过奋争，使法国的国际地位有所回升，但设想回到原先法国的地位，重振法国昔日的威风，谈何容易！

戴高乐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一些胜利是“回光返照”的法国还是“重振雄风”的法国。

戴高乐能否理直气壮地站到凯旋门前?!

第四章 尾声

1970 年 11 月 9 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而猝然去世。他仅差两个星期就 80 岁。

法国继任总统蓬皮杜发布了广播讲话：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 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 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 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中。”

1970 年 11 月 12 日为戴高乐举行葬礼，这一天在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地定为国丧

日。

尽管戴高乐遗嘱中要求不要举行隆重的葬礼。但巴黎的典礼却极其宏伟壮丽。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世界各地的人们汇集一堂，表示极大的哀悼。

“那天，几千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二十六年前他们的救星曾站过的地方，肃立致敬。”

在11月13日，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戴高乐——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凯旋的英雄，永远地站到了凯旋门前！